

• 585426

137-8
56382;3
F945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第 九 辑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五分册

(美)包华德主编

沈白敏译

瞿昭旗校

成都工程技术大学图书馆

基本馆藏

中华书局

1980年3月

8
82;3
15



585426

137-8
56382;3
F9.45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137-8
56382;3
F9.45

译 稿

第 九 辑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五分册

(美)包华德主编

沈自敏译

瞿昭旗校

(征求意见稿)

中 华 书 局

1980年3月

记

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第九辑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五分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

中华书局排印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中国书店代发

北京体育报社印刷厂印刷

•

1980年3月印刷

定价 0.90元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历史教学、研究工作参考。每辑字数不定。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七、译稿如引用，请核对原文。

- 6A3 14/03

目 录

达赖喇嘛 (十三世)	(1)
德 王	(6)
范源濂	(12)
费孝通	(14)
冯承钧	(17)
冯 至	(20)
冯国璋	(23)
丰子恺	(28)
冯自由	(30)
冯友兰	(33)
冯玉祥	(38)
傅斯年	(46)
傅增湘	(49)
傅作义	(50)
韩复榘	(56)
何成浚	(58)
何 键	(62)
贺衷寒	(66)
何香凝	(70)
何 东	(72)
贺耀组	(74)

何应钦	(77)
侯德榜	(83)
萧佛成	(85)
萧同兹	(87)
谢 持	(89)
谢洪赉	(92)
谢冰莹	(94)
谢婉莹	(96)
熊佛西	(99)
熊希龄	(101)
熊克武	(103)
熊式辉	(106)
熊十力	(110)
徐 谦	(112)
徐志摩	(117)
许崇智	(120)
徐新六	(123)
许广平	(125)
徐 谟	(126)
徐悲鸿	(128)
徐世昌	(131)
许世英	(135)
徐树铮	(139)

达赖喇嘛（十三世）

藏名：阿旺罗桑图登嘉错

达赖喇嘛（1876.6.26—1933.11.17），西藏的政教首领。他以改革西藏的政治经济，力求使西藏独立而闻名。

达赖出身在西藏东南部达布省的一个荒僻地区，有兄弟数人，上有三兄。他两岁时被带去拉萨，按旧例应由在拉萨的清廷驻藏大臣从金瓶掣出达赖喇嘛的名签以确定名分，这次未按此法办理，不过这得到清朝皇帝许可。这一破例的确定名分为日后拉萨与北京关系上的不祥之兆。清政府在十八世纪将西藏列为藩属后一直奉行闭关政策。达赖三岁时，母亲去世，他父亲贡格仁钦作为达赖的近亲住在拉萨，理所当然地在西藏（喀厦）政府中享有特别尊敬和政治地位。在他未成年时期由摄政代行职权。

达赖十八岁到坐堂之年时，一次神示揭露，在给达赖穿的靴底中藏有杀害他的魔符，此符用来召邪神毁灭穿靴者。摄政与首相均被捕下狱。

1895年，达赖二十岁亲政，以“西藏护神菩提萨埵”身分亲政。达赖十三世是十九世纪第一个亲政的达赖喇嘛，以前的达赖喇嘛都在未成年时就死去，由摄政掌权。面临着过去的摄政为首的丹吉林寺和哲蚌寺争权斗争，他马上树立了他的威权。

1879年达赖喇嘛确定名分时，忽视驻藏大臣的大权，表示拉萨向清朝皇帝的初步挑战。1890年，清政府于锡金，西藏划定边界会议中承认邻邦锡金的保护。1893年中英签订一项关于通过春丕谷的印藏贸易协定，规定在亚东开辟商埠。1895年达赖十三世掌权的那一年，中国被日本战败，西藏对北京政府的宗主权更加轻视。西藏政府不承认没有西藏参加的中英各项协定，严拒英人开辟通商路线及调整与西藏关系的行动。

达赖喇嘛的抗拒立场得到一个名德尔智的布里雅特蒙古人的支持，此人以德尔杰也夫之名布里雅特蒙古人所知。德尔智系俄笈，1880年来藏，在哲蚌寺以精研佛学闻名，成为达赖的导师之一，是深得信任的顾问。1898年回俄国

为喇嘛教筹款。圣彼得堡当局得知他的来意后任命他为驻拉萨代表，德尔智带着送给各大寺院的款项和礼物回到拉萨。德尔智劝达赖向俄国求助。1901年达赖遣使去圣彼得堡，与尼古拉二世朝廷取得联系。此时由于义和团运动爆发，清廷由北京出走，满洲为俄军占领，形势有利于实现达赖谋求脱离中国的希望。

清朝驻藏大臣强烈反对藏俄之间签订任何条约。德尔智着手在英藏关系上制造危机，以便使西藏倾向俄国。英国对俄国扩张的恐惧日增，印度英总督奎松认为俄国势力如在西藏确立，必将渗入喜马拉雅山麓诸国并危及印度本身。达赖的顽强态度，德尔智的阴谋策划，英国的疑虑重重，最后英国派遣了一支由荣赫鹏率领的八千人远征军。这次远征的目的是要迫使达赖执行1873年中英商务协定的条款，并对预期的俄国行动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

1904年3月，当英藏双方在贸易中心地江孜交战时，俄国因忙于日俄战争，无暇顾及西藏形势。月终，英军迫近拉萨，达赖在德尔智陪同下流亡外蒙。1904年9月，喀厦政府被迫签订条约，西藏实际上沦于被保护地位。荣赫鹏条约后来虽曾修改，但条约的签订削弱了达赖的权势。北京政府因达赖已逃离拉萨，召命班禅九世执政，班禅并未受命，在达赖出走期间，一般听命于清廷。

达赖仓促从拉萨出走，他仍以不失其身份的方式旅行，他带着随行人员约七百人于1904年11月到库伦（乌兰巴托）。他的东道主人是蒙古喇嘛教的大喇嘛，库伦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达赖在库伦时，经德尔智和沙皇联系，企图谋取俄国对西藏独立运动的支持。

1906年，达赖离库伦回到西藏东北的青海湖，住在一所喇嘛庙。达赖不在西藏期间，他要想从俄国方面取得援助对抗英国和清廷的希望日益减少。同年，中英新约重申，确认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1907年8月，英俄签订一项总约，俄国同意不干涉西藏政治事务，并承认英国在“保持西藏对外关系的现状上的特殊利益”。

尽管形势的发展不很有利，但达赖仍力求扩大西藏脱离中国的独立地位。1907年7月，清廷邀请他，召他去北京，但他却去山西五台山圣地了，1908年春抵达该地。1908年8月，清廷下令改革西藏内政，达赖仍在五台山逗留数月

之久，常常有来自北京的外交官员前往访问。1908年9月20日，达赖到北京，正在光绪、慈禧临死前一个月觐见了这两位清廷统治者。清廷册封达赖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借此表明清廷对达赖的态度，达赖无意接受此封号顺从清廷。达赖在北京时，俄、英、美、日各国使臣曾来探望。在会晤英使朱尔典时，达赖表示印藏和睦相处的愿望。由于朱尔典曾表示将大力满足达赖的要求，于是他希望取得支持以对抗汉族因而转向英国。美国使臣柔克义所撰《拉萨的达赖喇嘛》一文详述达赖在北京时的情况，此文发表于1910年的汉学期刊《通报》。

1908年12月21日达赖离京回拉萨。那时，清廷已派军入藏。中国将军赵尔丰，赵尔巽之弟，攻占巴东作为进入西藏东部的据点。达赖一行西返途中，清军更深入西藏。1909年12月，达赖到拉萨，一月后，赵尔丰的军队也到了拉萨。清军兵临拉萨城下时，达赖通过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与清廷商定一项协议。由于他对清廷的意图心怀疑惧，他决定再度由他的都城出走。1910年2月25日，由德尔智伴同离开拉萨。

达赖逃走后，清廷下令宣布废黜其西藏统治者的职务。北京再一次要求班禅出来行使达赖的职权，为班禅所拒。

达赖一行取道锡金的大吉岭前往印度。负责印度政府与锡金、不丹、西藏的关系的英国官员贝尔与达赖会见。达赖表示此来目的是寻求英国援助抗击清廷。1910年8月他去加尔各答，与印度总督明托勋爵讨论中国通过西藏对印度北部边境的喜马拉雅山诸邦的潜在威胁。但是1906年的中英条约承认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1907年英俄协定规定双方均不得干预西藏内政。英国当时的政策是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完全主权，但决不容许中国干涉尼泊尔、锡金、不丹。达赖及其政府在印藏边境的两年多期间内，贝尔和他相处极好，常有私人会谈。

达赖未能取得英国的积极援助，转而求助于尼泊尔。他又向俄国请求援助，所得答复却是通过英国政府转交，这使他深为沮丧。俄国的答覆和英国、尼泊尔的一样，含糊其词。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中国不久前对西藏取得的控制化为泡影。拉萨驻军发生兵变，杀死军官，在市内抢掠。清朝推翻后，1912年6月，达赖从噶

仑堡回西藏，因汉族军队仍占据拉萨而未能进城。1912年7月，北京袁世凯政府由四川派军队去拉萨替换原驻军，因为英国进行干涉，才终止了对西藏的占领，原驻军队取道印度撤回，1913年1月，达赖回拉萨。过去九年中，达赖在西藏的时间仅仅两个月而已。

达赖决心驱除西藏的汉族势力。1912年7月，派德尔智回库伦与外蒙商订条约，1913年1月，与库伦活佛订约，双方互相承认独立。达赖以中国不能保护西藏免受外国侵略为理由宣布独立。当袁世凯通知他已恢复他的尊号时，达赖声称他准备在西藏行使政教两方面的权力，不需要中国政府的职位。1913年所派的新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无法进藏，滞留在印度。

达赖用他的名义封官授爵，过去这是必须经清帝批准的。他还开始以藏族的名义宣称西藏应该在国际上占有自己的新地位。那时北京政府想占领西藏东部来维护它的权力。而英国政府为了稳定局势，确保其在西藏的利益，1913年英国政府召开由英、中、藏三方参加的西姆拉会议。达赖的代表强烈要求事实上的西藏独立，并恢复原有疆界。1914年4月，三方代表同意：西藏分为内藏（或东藏）外藏两部份，外藏有全部自治权。北京政府申斥了它的全权代表，对条约不予承认，而英、藏两方承认此条约有约束力。

达赖还想独揽西藏内政大权，他以不便办事为理由置喀厦政府于不顾。他提高行政效率，一度废除死刑，认为不合佛教教义，采取措施改革财政，逐步削减三大寺院的权力。他声称只有他才有封官授爵之权，可以分封土地并改变官爵的性质。过去这些官爵是世袭的，现在只及于本身。他作为西藏的最高统治者，所有官员和喇嘛寺院院主均由他任命。不听命的僧侣将处以极重罚款和教规的制裁，喇嘛寺院和贵族的经济特权均加以限制，增加的税收，一部分用来装备军队。1917年底，中国军队在西藏东部发动进攻，为藏军大败，被赶出前所占有的地区。达赖提出每年增募军队，藏军将增加一万一千人，总数达到一万七千人。

北京政府重新企图恢复清朝时代的中国与西藏的关系。为此目的，1919年和1920年先后派代表团去拉萨。看来主要由于英国给达赖政府以支持，代表团无结果而回。1920年秋，英政府应达赖及其政府之请，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拉

萨，这是第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代表团。代表团由贝尔率领，在拉萨住了十一个月。他向达赖重叙旧情，并表明英国政策的目的是：西藏应有国内的自治权，西藏的自主权将对印度的安全起防御的缓冲作用。

二十年代初期，达赖和班禅之间逐渐出现裂痕。他们都是被捧得具有唯我独尊的性格，平时很少会面。班禅于1904年、1910年两次受清政府的册封和邀请，达赖对此耿耿于怀。班禅虽然都未接受，但清政府两次提请却使他成为一个取得西藏大权的可能竞争者。1913年1月，达赖回拉萨后批评班禅在达赖流亡时期与汉人的合作，及他在辛亥革命后没有积极设法把汉人逐出拉萨。达赖是坚决反汉的，他愿意为了西藏的利益而亲英、亲俄。班禅虽然反对西藏的内部政策，但也不积极亲汉。双方的矛盾因为达赖要对班禅治下的日喀则、丹吉林寺增加税收而复杂化了。达赖为了要实现他的计划开辟新税源的办法使他与班禅发生了冲突，他建立一支西藏正规军的努力也遭到教内一些人的反对。达赖强向班禅逼索财物和粮食作为税款，班禅于1923年11月化装逃离西藏。班禅1925年初到达北京，北京政府热烈欢迎，并准备认他为西藏统治者的候选人。达赖曾多次抱有让班禅回藏的想法，但由于西藏内政方面的考虑而未能实现。

到1925年，达赖折衷主义外交政策的弱点表现得很明显了。他奉行一个以夷制夷的政策维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但一直没有能建立起一个牢靠的对外关系体系。他开始改变西藏的政策由英国转向中国。他任命了一个反英的军官为司令官，英国在拉萨的势力迅速下降。据说1927年和1928年曾有蒙古客人来到拉萨，英方查明那是苏联的间谍。1928年班禅派代表到南京致敬，并希望南京政府能全部管理西藏事务。1930年通过蒙藏事务委员会的汉藏混血种、年方二十二岁女译员刘曼卿，进行了一般性的礼节交往。拉萨方面于1922年派驻北京雍和宫的贡觉仲尼于1930年回到西藏，携有南京国民政府试探达赖达到和解的八项建议。达赖提出他的建议，其中有以承西藏自治换取过去的藩属关系的设想，以及恢复西藏旧日边界等项目。

经交换意见后，达赖派代表去南京，南京方面亦于1931年派代表团带着恢复西藏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的具体建议去拉萨。但在代表团在离拉萨一天路程时，国民政府代表谢国梁突然死亡。同时又发生了些新问题使拉萨与南京建

立关系的微妙情况趋于复杂，那是1930年的所谓大金寺事件。当时汉族军队与藏族喇嘛曾在江孜发生冲突，进而发展成为藏军和当地军事长官刘文辉的所部长期争战，拉萨派军增援以维持藏族的地位。1932年及1933年拉萨与被国民政府划入西康和青海的藏东两地区签订了停火协定。

达赖由于工作劳累、两次长期流亡的艰苦生活，西藏地区又缺少医疗条件，1931年神谕预示其不享天年。1933年12月17日，达赖死在拉萨。这一日恰好是藏历十月的最后一天，据西藏说法这是一种凶兆。1934年1月，热振寺主热振呼图克图被选为摄政。他就职后立即向南京当局报告，并请求其承认。这是辛亥革命以来西藏当局第一次提请中国政府的任命。南京方面马上同意。

达赖十三世是为数不多的亲临西藏行使权力的一个达赖喇嘛。在这一方面， he 可以与那位伟大的达赖五世罗桑甲错（1617—82）相比，他在十八世纪与中国合并之前统治着这个国家。尽管有过种种国内外的重大困难，达赖十三世靠着辛亥革命的间接影响，在排除汉族在西藏的影响上取得了成功，并在一个时期内给他的境内带来了实际上的独立。

达赖喇嘛的第十四次转世继承了十三世，但他在1959年逃亡了。因此，可以说达赖十三世是西藏最后的一个神权的统治者。贝尔自1920—1921年率领英代表团出使拉萨后退休，他对达赖曾有同情的叙述。贝尔（即后来的贝尔爵士）写了一本《西藏的过去和现在》（1924），献给达赖十三世。贝尔在临死前不久，写成了《达赖传》，于1946年出版。

德穆楚克栋鲁普 汉称：德王

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蒙古西苏尼特右翼旗郡王，汉称德王，领导内蒙自治运动。

德王为蒙古西苏尼特右翼旗郡王之子，出生于内蒙锡林郭勒盟。他在绥远一个中学读书，后到北京进蒙藏学校。1919年袭父爵为西苏尼特郡王，1921年为锡林郭勒盟副盟长。他还是一个称为蒙古青年党的民族主义组织中的主要人物。

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都在内地上过学，希望在中国民族体系结构中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自从外蒙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另一个内蒙民族主义组织，内蒙人民革命党于1925年成立了。它的目的是通过革命实行民族自决。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德王等人希望孙逸仙《建国方略》中所规定的少数民族民族自决权利得以实现。但是国民政府的对蒙政策并不给内蒙古的蒙族以更多的政治权利，而将内蒙改为所谓的特别区，分为察哈尔、绥远、宁夏三个新省。同时，又怂恿汉人侵占牧地。在这种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的情况下，内蒙的民族主义运动迅猛发展。

在蒙族各党所关心的地区中，察北的锡林郭勒盟受中国民族政策的影响最小，很少有汉族进入该地区。德王是内蒙古最有声望的首领。1930年前后，他在东自西满、西到绥远的鄂尔多斯地区、激起并加强反对汉族的活动。

1931年秋，日本侵占满洲，对内蒙来说也增加了一种新的外来武力威胁。当日本军队巩固在满洲的统治后，在那里建立了满洲国，将六个蒙族盟中的三个盟包括进去。国民政府无意反抗日本的侵略，德王等人准备保卫自己的领土。

宋哲元是当时察哈尔省主席，德王作为西苏尼特旗的郡王，成为省政府委员。蒙族人知道他们不能指望汉族的省政领导人会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因此，1932年冬，德王率领了一批王公代表去南京，要求国民政府改组内蒙的行政机构。蒙族代表在南京完全未受重视，他们一怒离南京并发表抗议书，后来又在由北平回内蒙时发表了另一份抗议书。他们的离去，促使南京重加考虑对策，1932年12月，任命班禅喇嘛为蒙藏事务委员，以西陲宣抚使的名义去内蒙百灵庙抚慰蒙族，使其继续向南京效忠。但班禅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对德王的内蒙自治政府的主张，任命德王为滂江守备委员，并予以训练蒙族军队的一定权力。

1933年3月，日本关东军侵占热河，4月底，侵占在锡林郭勒盟边境的察东多伦，准备把满洲西部或内蒙东部的蒙族纳入一个新行政区——“兴安”，名义上是满洲国这个政治结构中的一个自治单位。这对南京方面和锡林郭勒盟方面都带来了新的压力，但南京方面对此并无反应。日军侵占多伦后，南京取

消了原来同意德王一再的要求在滂江扩建蒙族军队的计划。德王除了是西苏尼特旗郡王之外，还是锡林郭勒盟最有势力的人物，该旗名义上的统治者云王，年逾六旬，身体衰弱。

1933年春，德王及其伙伴，采取行动实行自治。德王最亲密伙伴之一是乌兰察布盟长云王，他侄子是德王之友又是他的内蒙自治要求的坚决支持者。1933年5月，西蒙各领袖由德王、云王主持，在百灵庙开会，讨论内蒙形势。日军的压力不断加大，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察南也沦入日本势力范围，日本当局在多伦成立了一个自治县。察北的锡林郭勒完全陷于孤立，夹在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1933年7月26日，在百灵庙又召开一次会议讨论西蒙独立问题。大部分蒙古王公不赞成宣布独立，据说这是由于班禅施加了遏制的作用。8月14日，西蒙各王公电南京宣布他们打算成立自治政府，电报以索王领衔，在他之下即系德王。

内政部长黄绍竑和蒙藏事务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被派往内蒙制止自治运动。石青阳未能使各蒙族领袖平息下来，黄绍竑则连劝说蒙族领袖与他在张家口会见也未能做到。

1933年9月，蒙族首领又在百灵庙开过一次会，10月9日至24日，组成了内蒙自治政府，新政府仍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但汉族省行政长官不得干预。1933年10月22日云王当选新政权的首脑，德王被委主持政务局（委员会）。

百灵庙团体派出德王亲信之一包悦卿（赛音巴雅尔）去张家口，准备与黄绍竑会商。南京指派一个以黄绍竑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去内蒙，辅佐以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和一些专门技术人员去内蒙。1933年10月21日，黄绍竑离南京，在北京滞留了几天，10月29日到达归绥。那时百灵庙会议已休会。

黄绍竑派出了十人代表团去百灵庙和德王等人谈判。德王也派出代表去归绥，表明蒙古的立场，并说明实行自治的目的在团结蒙族共同抗日。两人多次电报往返，但在互相谅解上并未取得进展。德王认为问题相当重大而又复杂，双方实有会商的必要。

11月10日，黄绍竑去百灵庙会见云王、德王及其他蒙族领袖。云王是名义上的蒙族首席代表，主要发言人却是德王。据德王说日本人曾向蒙古人商洽准

备建立一个统治内蒙全境的“蒙古”国。他又提到有人指责他曾与日本方面磋商。倘以此而论，认为他曾这样做的话，那他就没有向南京提出申请这个问题的必要了。他又说，过去蒙古四分之三的地区已沦入俄国、日本之手，因此有必要考虑紧急措施来保卫剩余的四分之一的土地。尽管黄绍竑作了一些让步，但他断然说明，南京政府不容许建立内蒙自治政府。最后，班禅从中调解，蒙古方面放弃了要求自治的主张，并提出两种方案，黄绍竑接受了其中的一种。

黄绍竑、班禅回到南京后，1933年12月，国民政府对协议做了修改。1934年1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了百灵庙会议所商定的形式，而删除了实质部分，分歧再度出现。但这一次蒙古在讨价还价中较为有利，因为溥仪决定于1934年3月1日登满洲国皇帝之位，日方又与内蒙重新交往。蒙方要挟说，如果南京方面不接受其要求，那他们将不得不对满洲国和内蒙古的联合一事做认真的考虑。

南京取消了1934年1月的那项决议，2月28日，国民党中央政务会议决议成立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3月7日任命云王为委员长，德王为政务局局长（秘书长）。委员会于1934年4月23日成立，各级人员于5月1日就职。

这项协议不久便证明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日军对内蒙的压力不断增加，在其东部，满洲国察东驻防司令李守信把司令部从多伦迁到沽源。6月末，土肥原大佐率关东军进入内蒙，促使蒙族领袖们认识日本权力的不可抗拒和宽大。

土肥原的目的未能立即实现，蒙族人士仍希望和南京方面所签订的协议将使他们获得所想要的自治权。但国民政府既未按照约定拨给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经费，又拒绝装备蒙族军队。1934年9月3日，南京特工人员在北平绑架了德王的参谋长，并将他处死，说他是日本间谍。

此时，百灵庙方面对国民政府的盐运和商务通过蒙境加以阻挠。班禅继续充当调解人。早自1934年8月以来，德王就和日方公开谈判了。他对察哈尔省当局的一个代表团说过，蒙族之是否效忠南京，决定于南京之能否逐渐执行“明确的政策”，并采取“妥善措施以援助内蒙”。

国民政府这时正忙于剿共，它在日本的压力下，倾向于接受在华北建立一个“友好”政权，对内蒙则不加援助。1934年11月，云王、德王曾去归绥会见

蒋介石，蒋介石这时正致力于新生活运动和其它国内事务，对蒙族领袖不甚重视。

1935年，日军势力已扩大到天津——北平——张家口地区；12月，国民政府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事实上正式承认华北形势的改变。德王这时已完全倾向于日本方面了，日本同意他的政治自治，同时又在不引起剧烈社会变动的条件下，给他以有效的支持。德王并不是天真到不知道日本人有其自己的军事战略利益，但是到1935年冬天，他已经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了。

1936年1月中旬，南京方面指责德王宣布内蒙独立。1月21日，德王向南京正式否认这项消息。但是日本方面已向德王提出任务，叫他召集蒙族领袖开会宣布内蒙独立。1936年2月，他们在百灵庙开会，参加者都了解到，脱离中国而独立那就是完全投靠日本。

锡林郭勒盟紧邻热河，盟长索诺木拉布坦亲王在1933年10月的会议上支持德王的，但对德王说明，倘因此而发生“事故”，他将率全盟离去。索王此时带走了锡盟十个旗中的八个旗。随他而去的还有和伊克昭盟各旗（地处绥远，在省主席傅作义治下）及乌兰察布盟的两个旗。他们在归绥傅作义的庇护下，另行成立蒙政委员会。当时德王手下只有锡林郭勒两个旗，云王的乌兰察布四个旗及察哈尔的爱玛（部）。

德王迁到德化。1936年4月他和他的追随者在德化开会成立军政府与日本合作。6月28日，内蒙政府在德化正式成立，日方给德王和云王派有军事顾问代为训练军队，开始扩建军队。

1936年8月中旬，德王去百灵庙，办理政务会的结束事宜。8月13日有人行刺，次日即回滂江原来的驻防司令部，他对国民政府敌意更深。9月，他和他的部下及日本方面会商，准备进攻绥远。

1936年11、12月间，满蒙联军在日军顾问及装备的支援下，由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司令，计有兵力约一万人。但绥远的中国防御意外之强，11月19日，中方军队攻占百灵庙，卤获大批军械文件，据说以此证实了日方准备扩充其在内蒙的势力，并进而控制以伊斯兰教徒为主的西北及新疆等地区。1936年12月21日，德王宣布停战，国民政府经此次胜利，任命傅作义、阎锡山和伊

克昭盟的沙王在百灵庙另行组成政治总部。

国民政府宣布德王为卖国贼。1937年1月18日，德王自任在德化早已于1936年6月成立的内蒙政府主席。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德王的骑兵随同日军一起作战，很快就占领了绥远。1937年10月，日军在归绥召开会议，宣布绥远脱离中国独立。然后日本建立了一个绥远蒙族自治政府，与已在察南和晋北建立的蒙族政权平行。1937年11月，他们又成立了一个蒙疆联合委员会，总部设在张家口，作为日本包办的三个蒙古政府的管理和协调机构。

1937年12月，蒙疆联合委员会改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首府在归绥。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兼政务院长，李守信为军事部长。归绥政权采用新旗和新历，由成吉思汗即位起纪元。1938年云王死去，德王任主席。1939年9月，首府迁往张家口。德王后将骑兵指挥权交给了李守信，本人则专心致力于维护蒙古利益的事务。

内蒙政权名义上和当时北平的临时政府地位平行。自从1940年日本包办的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德王的政权就被置于南京政府之下，但事实上，1940年以前和以后，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要是听命于日本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方面一直把东西内蒙分别治理，东蒙仍属西满的兴安省。德王及其追随者并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独立。

1945年，国民党、共产党、内蒙蒙族和外内蒙蒙族在日本军事力量转让，及苏、蒙军队进入满洲及内蒙所形成的新权力圈中竞相争夺地位。德王逃到南京，他的妻儿为苏蒙军队俘获带走。德王会见蒋介石，和他讨论战后的内蒙问题，但他发现蒋对蒙族的问题，并不比他早先更为容易听取别人的意见。德王获准回华北，在傅作义的监护下在北平过着退隐生活。

德王在北平一直住到1948年底。在共产党解放北平之前不久，德王飞往宁夏省定远营，他和达王商议，准备动员阿拉善旗、额济那旗的蒙军抵抗迅速向西北推进的共产党军队。不久德王又飞往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广州，他提出为了加强达王和他本人的地位，给内蒙以自治，便于增强他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的地位。他和代总统李宗仁会商无结果，但他的要求将记入档案。

德王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用来号召全蒙支持反共的政治让步，不得已而回内蒙，他要抵抗共产党的意见未能得到支持。他纠集了几千人向绥远西部包头附近某地进军，但为傅作义的董其武部所阻。德王不得不退回他原居的百灵庙一带山地，部众在那里溃散了。

1949年后的几年中，德王的行踪不详。后来得知，他曾越境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他的家属在那里流亡，德王在乌兰巴托时期似乎享有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也许在1952年10月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之后，德王被引渡到北京作为战犯入狱。1963年元旦人民政府予以特赦，1963年4月9日获释。1964年据说他在呼和浩特内蒙大学教书。

范源濂 字：静生

范源濂（1875—1927.12.23），中国近代教育的创始人，历任教育总长（1912；1916—17；1920—21），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23—24），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长。

范源濂，湖南湘阴人，父母早亡，幼年由他伯父供给就学。1898年进长沙时务学堂，该校1897年由湖南巡抚陈宝琛创办，蔡锷也是该校学生，梁启超是该校总教席。梁启超和他的同事以君主立宪和人民主权等政治概念向学生灌输，因此引起湖南的一批思想保守的士绅们的反对。1898年春，梁启超因病离校去上海，是年秋初，百日维新失败，这个运动的领导人或被处死、或被迫逃亡。时务学堂亦被封闭，四十余名学生中包括范源濂在内的十一人逃亡到日本，梁启超也在那里避难。

范源濂在日本进了梁启超及东京的华桥商人创办的大同学校。范后又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他看到留日学生增多，而又大都缺乏必要的训练考入日本学校，范源濂向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建议，为中国学生专设一所学校，1902年创办了一所宏文书院。该校立即深受欢迎，因为不需要日语知识六个月就可以获得教育科文凭，八个月获得法律科文凭。范源濂为该校日本教师

充当翻译,很受中国学生的尊敬,他的名声传遍了中国。

1904年,范源濂回湖南,呼吁妇女到日本留学,不久,他组织了一批女学生护送她们去东京。1905年,他在北京任学部主事,协助一位日籍学者在北京创办一所法律学校。翌年,创办殖边学堂,训练青年从事边疆工作,有学生一百多人,讲授有关蒙藏及有关边疆生活的课程。

1910年,范源濂任学部参事,被指派拟订一套标准。辛亥革命期间,他担任斡旋人,奔走于清政府和共和政府之间。清政府被推翻后,范源濂加入了一个很小的政党、叫做国民协进会,以后又和其他小党派合并为共和党,1913年又改为进步党,范源濂和以梁启超为首的稳健派很亲近。梁在清政府时期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而在1912年后主张和北洋军阀合作。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范源濂任次长。1912年6月,蔡元培辞职,陆徵祥任命范源濂为教育总长,但他不同意政府的一些政策,1913年1月辞职,任中华书局总编辑部部长。

1915年秋,范源濂和梁启超及蔡锷共同反袁。讨袁军于1916年在肇庆成立军务院时,范在上海任该院代表。

袁世凯死后,1916年7月—1917年6月范源濂在段内阁任教育总长,1917年1月至7月又兼任内务总长。他从欧洲请回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5月,他与蔡元培、梁启超等人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

1918年,范源濂去美国,和天津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一起在美国考察教育制度。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和梁启超、林长民、张东荪等组织尚志学会,邀请西方学界名流如杜威、罗素到中国讲学。他们还主持出版了一些西方哲学著作的译本。

1920年8月,范源濂第三次任教育总长,1921年5月辞职后研究生物学。1922年春去美国考查乡村教育。1922年11月教育部决定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而为大学,1923年2月就任该校校长。他在就职之前,先到英国去与英国政府商洽将庚子赔款用于教育事业,一直到1923年11月他才从欧洲回国就任新职。在他当该校校长时,梁启超、蒋方震、黄郛等名流都被罗致来校讲学。1924年,第四次任命他当教育总长,他辞而未就。

1924年9月,北京政府任命他当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董事,该会基金

系来自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1926—1927年一直任董事长。他也是南开大学的董事。又是北京首都图书馆理事，后代理馆长。1927年12月23日死在天津，年五十二岁。1928年10月，尚志学会和中华基金会在北京建立了一个静生生物研究所，纪念他对现代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

费孝通

费孝通（1910.11.2—），社会人类学家，他在国内开创实地调查因而闻名，他把西方的人类学家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的资料。

费孝通生在江苏吴江，出身于仕绅家庭，但并不富裕。他还有两个兄弟费青和费振东。他童年的情况不详，仅知道他曾在在一个女子学校读过几年书。

费孝通进燕京大学后，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派克门下从事研究。当时，实地调查极少，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中国资料几乎一点也没有。来华的客座教授（如派克及《中国的劳工和工地》的作者泰纳）深以为憾，鼓励费孝通等人从事实地考察研究。费孝通就在吴文藻的领导下进行这项工作。1933年，他燕京毕业后，在清华大学跟随一名满族问题专家史禄国夫学习。1935—1936年，费孝通和他的妻子王桐维去广西研究瑶族。在野外考察中，费陷入虎阱，他妻子因设法拯救而落水淹死。他们的这一次研究成果《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6年底，费孝通去英国，跟随伦敦经济学院的马林诺斯基研究，获得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题目是《中国乡村的经济生活》，费孝通就马林诺斯基和雷德克利夫—布朗那里学会的如何在一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关键性相互关系，和该社会成员对一种文化的看法上着眼，他体现了关键门路的调查方法，并发现这些方法带来比卜凯和其他调查中国农村情况的人使用的方法所得结果有大得多的意义。费孝通运用的方法表现于他的《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一书中。

费孝通回国后，任国立云南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中英文化基金会研究员

(1939—1941)，燕京大学云南社会学研究站主任。1939—1941年间，费孝通和该站研究人员选定了昆明周围一些偏远地区的社会作了研究。1943年，他应美国国务院之请去美国，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太平洋关系研究所讲学和研究。1944年，他在芝加哥大学主办的哈里斯基金会议上宣读了一篇他与张志宜合写的有关云南的实地调查报告，《与土地分不开的中国》，比较了这三偏远地区中土地所有和租佃的集中程度。他推荐以土地所有权小但土地使用权大的方法举办农村合作工业。

这一期间，费孝通还翻译了马林诺斯基的《文化的理论》、费兹的《人类的种型》等书，均在1944年出版。1946年7月，费孝通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农民和士绅》，他认为中国是一种两个阶级的社会，以世族、住地、经济政治上的作用、观点和重要性，区分为多数的农民和少数的士绅。他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与士绅相互依赖，在皇帝统治之下的政治合作，和共同的社会道德观念的限度内保持其独立。

四十年代中，费孝通和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发生了冲突。1946年7月闻一多被暗杀时，他在昆明美国领事馆内避难。这一年，他任清华大学人类学教授，在中英文化基金会的安排下去英国。他于1946年11月到英国，呆了有三个月。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伦敦经济学院，但也访问过牛津大学，在牛津郡的柯克林顿村小住，研究乡村生活情况。

1947年回国后，费仍在清华任教。1947年发表了一篇《生育制度》，分析了养儿育女习惯和中国家庭制度之间的关系。他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把过去的中国视为一种农村型的社会，和现代社会作了比较。这本书概括了费孝通对乡村的观点。1948年发表了《美国人性格》、《乡土重建》、《绅权与皇权》。

这一期间，费孝通还在报纸上写了一些文章，批评过去中国，暗指国民党的政治社会政策。他在清华大学认识了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雷德菲尔德夫妇，他希望西方读者能理解他在报纸上发表的那些文章的观点，向雷德菲尔德的妻子口述了大意。她回美国后，重加校订整理，又增加了1943—1946年在云南永德州收集的大批中国乡绅的传记。此书由雷德菲尔德作序，以《中国乡绅》为名，1953年在芝加哥出版。

共产党解放华北后，费孝通参加了暂时管理清华大学的校务委员会。1949年11月至1954年他是政务院所属文教委员会的委员。从1949年开始，他还任中苏友好协会执行委员，1954年又任该会的执行理事。他所担任过的各种职务有：民盟中央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政治协商会议的民盟代表，人民外交学会执行委员。

1950年，他任少数民族慰问团副团长，去西南地区调查一些边远的社会。1951年任中国政法协会委员，6月任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1953—1954年任北京市文教委员，1954年8、9月，作为江苏代表及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5年7月，任人民外交学会三届执行委员，1956年2月，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10月，任国务院专家局局长。

1950年间，费孝通写了不少文章赞扬“新民主主义”。《我这一年》这篇文章中，他说1949年是他的“学习”年，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他批评有些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局限，承认他自己在试图攀登无产阶级觉悟高峰遇到的困难。同年，他在清华和另一些教授，如张东荪、曾昭抡、钱伟长、钱端升等不同意见政府沿用苏联路线实行教育改革。

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作了一次关于新的教育制度的报告，费孝通和许多其他学者认为这是一次“再解放”。在“百花齐放”时期，费孝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政策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发展，但是未能使学者们无顾忌或自由从事研究工作。他说，知识分子正面临着早春期间变化不定的气候，每天都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要求“一间书室两本书”，不受干扰进行研究的自由。由于这篇文章及其它同样性质的公开言论，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费孝通受到严厉的批判。他被认为是一个以章伯钧、罗隆基为首的右派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他又被指责支持所谓梁漱溟的唯心主义社会学派的谬论，赞同复辟资本主义。费孝通承认，他早期的一些言论反映了“对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并声明要对右派分子作斗争。1959年9月16日，摘掉了右派帽子。4月11日，以民盟代表任第三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费孝通在五十年代的《我这一年》一类著作中，收回了他以前对克服中国

人民对收入和资金积累太少、技术力量不足、人口过多等困难的潜力信心不足的意见。他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可以成为一个近代化、工业化的国家。他的《民主宪法人权》一文是为了想“正确”理解宪法、民主和人权意义的一般群众而写的。费孝通关于凉山彝族的研究，写在《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中。

费孝通于1942年再次结婚，有女儿一人。

冯承钧 字：子衡

冯承钧（1887—1946.2.9），史学家和翻译家，他翻译了一些西方学者的汉学和东方学著作，由此介绍了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

冯承钧生在湖北夏口，他在国内受了些旧式教育后，1903年十七岁时就到欧洲去了。1905—1906年在比利时列日大学，1906—1910年在巴黎大学，主修法律学。1910年毕业后，进法兰西学院。冯承钧在巴黎的业余时间，用中文指导法国的汉学研究者，因此认识了一些知名的汉学家，他们赠送他著作和论文。

冯承钧对中国的法制史感兴趣，开始研究中国文化与物质生活及中国制度演变发展中的外来影响。他认为对中国有影响的国外的制度和外国文化史的知识，是研究中国制度史的先决条件。例如，他认为中国在公元六世纪时，废除断肢酷刑，是受佛教轮回及因果报应教义的影响。

冯承钧在欧洲度过了八年后，1911年回国，任湖北外交司参事。1913年新国会召开时，任一等秘书，1914年国会解散，1914—1927年任北京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秘书，1920—1926年在北京大学，1928—192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课。

冯承钧虽然翻译了一些西方社会和政治哲学的书籍，例如，勒朋的《意见与信仰》、《世界之纷乱》、《政治心理》，但是，他的重要译作是西方学者的汉学和东方学研究著作，通过这些著作，给中国的历史研究介绍了西方的史学方法。其中第一部译著是沙腕的《中国之旅行家》，这本小册子介绍了自汉至清

初这一长时期内，到国外旅行的中国人。沙畹在巴黎赠送这本书的当时，冯承钧并未加以注意，认为这不过是转译中文资料不值细读。但当他从事教学与研究时，就发现了许多困难，尤其是中国文献资料中的很多非中国名称应该如何鉴定，在沙畹的著作中就鉴定出一些这种名字。因此，冯承钧认为西方学者的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并不单纯是翻译，而且是对中国的学术成就提供了一种新的训练方法。他决定将沙畹的著作译成中文，并加以评述说：“这是向学者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范例”。译本在1926年出版。

此后几年中，冯承钧继续翻译法文著作，特别是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及中国西北边疆关系的著作。1930及1931年，他翻译了费琅的两篇论文：《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苏门答腊古国考》。1928—1933年，翻译马司帛洛的《占婆史》，希梅勒的《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包伽兰的《中国西部考古记》，牟里的《东蒙古僚代旧城探考记》。冯承钧还校订注释了许多西方著述，并将其中已鉴定的非中国名称译成中文。

冯氏鉴定中国资料中的非中国名称，使他注意研究有关佛学的西方著述，其中有大量对阅读中文佛教专业名词有用的梵文名称。他指出欧洲和日本的学者通常以汉文的佛经作为别处无法得到的历史资料来源，而中国学者却并未注意及此。因此，他在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搜寻并核对材料后于1927年冬用了一个月译出了烈维的《十六罗汉考》和沙畹的《法住记及所记阿罗汉考》。冯承钧早期有关佛教的译著有普热吕司基、烈维、伯希和的《佛学研究》，1928年出版。1934年出版了《历代求法翻经录》，他以中文资料为据，又参照了西方著作，收集了自汉至唐的二百名佛经翻译高僧，还翻译了烈维的几种著作。他对中国的其它几种外来宗教的历史很注意，例如，对摩尼教、景教、耶苏会也写了专著和论文。

上述著述，差不多都在1929年以后出版，而他的原稿却早已完成。1929年，冯承钧忽然中风，无人帮助不能行动，无法教书。健康稍恢复后，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1932—1936年）拨款让他翻译有关中外交通史及蒙古史的西方著作。1930—1936年间，他译出了至少二十几种专著，例如，伯希和的《交广印度两道考》，鄂卢梭的《秦代初平南越考》，沙畹的《西突厥史料》，

格鲁赛著作中有关蒙古部分的《蒙古史略》，多桑的《蒙古秘史》，布哇的《帖木儿帝国》，伯希和的《郑和下西洋考》，沙海昂的《马可波罗行记》，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的前五十篇。他还写了两种蒙古史：《元代白话碑》（1933年），这是三十多种元代白话谕旨的碑刻资料，还有一本《成吉思汗传》（1934年）。其它有关中亚和东南亚的史地论著，收集在两本集子中：《史地丛考》（1931—1933年），《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934—1956年）。冯承钧的全部译著几乎全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6年后，冯承钧的翻译不多，而专注于校订中国古代国外游记的著作，这些是现在有关东南亚及南亚主要的、有时还是仅有的记载。例如，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这是两位随同郑和在1405—1433年下西洋的使者。这些都分别出版于1935及1936年。他还校订了十三世纪作者赵汝适的《诸蕃志》，这是宋代对外国及与海外进行贸易各种商品最详细的记载。还有谢清高（1765—1821年）的《海录》，此人曾在西方船舶上工作了十四年，到过许多西方国家。这些工作都是1937年前完成的。他还校注了《西洋朝贡典录》，这是来华朝贡使节的纪录，这些稿件都未发表。

冯承钧的一种重要著作《中国南洋交通史》，已于1937年出版，详尽记述了自汉至唐中国和东南亚、南亚诸国交往的历史资料。他还编了两本地名辞典：《西域地名》，列举从中亚、西亚到欧、非两洲的地名，曾于1930年由中瑞（典）考察团出版，1950年又修订出版。还有一本是《南海地名》，包括东南亚和南亚地名，未出版。这是他毕生从事的工作，把欧洲文字所记（国外）的地名与中国资料中的译音加以校订对比。

冯承钧由于身体不能行动，自1931年以后，他的译著都由他口授、而由他辅仁大学毕业的长子冯先恕笔录。此人因参加抗日活动，于1943年被日军逮捕，以后则由次子冯先祺笔录，冯承钧在1935年著作中提到的就是他。抗日战争期间，冯承钧的不少朋友和几个儿女都迁往内地，他本人因身体不好留在北平。这一期间，著述很少。1945年，各大学又从西南迁回北平，他任史学教授，但为期很短。1946年二月因肾脏病去世，年六十岁，遗有子五人，女五人。

冯至 原名：冯承植 字：君培

冯至（1906—），诗人，散文家，德国文学教授。民国后期最受人尊崇的诗人，他以十四行诗的形式翻译里尔克的著作和自己的写作闻名。1949年后，他曾对此都加以批判，而从事写作爱国诗歌，为共产党的文学理论和实践的热情的官方发言人。

冯至童年及青年时期的情况不详。他生在离北京西南四十五英里的河北涿县，他家从清初即为世家大族。1920年前后，他可能在北京上学，1923年进北京大学，除1927年曾去过哈尔滨外，1930年前他一直在北京。

冯至如何开始成为诗人，这一段历史不详，只知道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地发的萌芽白话诗运动很早就引起了他的兴趣，使他迅速成熟。他先随杨丙辰学德文，以后主修德国文学。此项兴趣将他引入那时受当代德国作家影响的文学界。特别是他，参加了一个以德国霍普特曼所写的《沉钟》剧本为名的“沉钟杂志”社，1925年任编辑。他早在1923年就写诗，写了十六首组诗《归乡》，写他1923年1月回涿县过年，舍不得离开城市的繁华而到农村去。这一组诗直到1929年才发表。1927年出版了《昨日之歌》，这第一本诗集里有一些情诗，如《满天星光》，《别K》，《你》，还有两首叙事诗：《帷幔》、《寺门之前》。他的叙事诗深受欢迎，尤其是《帷幔》一诗，根据民间传说叙述一对恋人因误会而双双遁入空门。1928年出版组诗《北游》，这是根据他1927年夏在满洲的旅行，这不用《帷幔》那种写法而真挚的用本人口气。此诗表露出诗人对大城市的糜烂生活的失望和韶华逝去的伤感。不过冯至的这次历程似乎全无作用，此诗以大雪中哈尔滨的阴郁景色作结束。多年来，冯至没有再写出一本重要作品。

1928年，冯至在北大德文系毕业，1930年秋去德国留学。他可能是乘火车经过西伯利亚去的。他在《驰泰西》的散文中报道了他的旅行片断，其中记下了他和两个苏联学生和一名德国教士对哲学和宗教问题的一次讨论。1930—1935年，他在柏林大学读书，也在海德堡大学呆过一些时候。1935年在柏林大

学获得博士学位。1931年他翻译了里尔克《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书信》，还写了《塞因河畔的少女》载于1932年《晨钟》。1932年他初次见到朱自清，这个前辈诗人的公正谦逊给冯至以深刻印象。1935年回国后，他在北大德文系工作，1935—1938年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德国文学。他翻译了尼采的六首诗，并加以论述，发表于1937年的《文学》杂志。

1938年中日战争打断了冯至学者文人的宁静生涯。他参加了知识分子队伍向西南撤退，年底到达昆明，在新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里教诗学。去昆明的长途跋涉，对他的影响很深，中国传统乡村生活的有伸缩性和一般老百姓的坚忍性使他深受感动。1939年他发表了《在赣江上》，生动地描绘了在渔火下打鱼的老渔民形象，这是他在战争改变了他的正常生活以前从未亲眼目睹而仅仅在书本上读到的景象。同年，他又写了一篇《忆平乐》，描绘了一位缝衣工的沉着自若的神情，从平凡单调的冷静按时将衣服缝好，这象征着中国人民在民族危机时英勇地各尽本分。这些文章和《北游》中的失望情调完全不同，结合了里尔克式的歌颂“平凡事物”，在艰难困苦中的泰然自若。

1938—1946年，冯至在昆明的几年中除了教书之外，还写了一些被公认为最好的诗篇。冯至在西南联大教德文，又曾在同济大学当系主任。他开的歌德的课程是很闻名的。他在柏林开始翻译《致一名青年诗人的书信》、1938年出版。1931—1939年间，冯至很少写诗，1939年或1940年间，他好像受到一次奥妙，几乎是神秘的灵感，使他那凝滞了的创作力脱颖而出。受这个灵感的鼓舞，他写了《十四行诗集》的二十七首诗，1941年出版。里尔克对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无论在诗歌的形式和创作的环境方面，都使人想起了这位德国诗人。他的《奥利费之歌》也是在沉默了将近十年之后而在短短时期内创作出来的。和里尔克一样，给自然界的精辟描绘以玄妙的联想。冯至诗篇中的马帮、河流、群山、独松、僻巷、孤灯以及断线风筝，都不是从这些事物的本身来描述，而是作为一种神妙预见的境界景象，只有诗人才能看到并道出它的美妙。十四行诗在技巧上说明了白话诗运用严格韵律的可能性。这种体裁对冯至的题材极为适宜，在诗篇结构中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曲折变化。这些诗轰动一时，青年诗人大加仿效。

1941年，日本空军开始经常轰炸昆明，冯至才真正认识到战争的严酷。轰炸的一种直接结果是夜间常常停电，冯只能在昏暗的油灯下阅读大字本的中国古籍。战争的后几年中，冯至致力于研究中国旧诗。1944年，他写了一篇关于宋代爱国诗人陆游（1125—1209年）的文章，此文中心问题是反复阐明一个读书人的责任感。他还研究了杜甫（712—770年），这位唐代诗人在国家危急时期写下了不少伟大诗篇。1942年，年卞之琳翻译的《里尔克的爱与死亡》，激励了冯至，他运用同样的体裁、重述公元前六世纪的伍子胥出亡向暴君复父仇的故事，1944年此书出版。冯至在序言中说道：这反映了中国人民战时的苦难及其最后的必然胜利。

1946年底，冯至回到北平重新教书，并编辑《现代文录》。1946年11月，他的一篇《沙龙》的文章在《观察》杂志上发表。文章内容只涉及欧洲文坛的沙龙，而实际上是对当时中国文坛的讽刺。这篇文章，就体裁和结构而论，都是冯至作品的一个新的起点。1947年，他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杜甫和论浮士德的长文。第三篇文章《决断》，也在1947年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在这篇文章里冯至按照基尔克加德的设想，检查了“决断”自觉存在的重大意义，预示着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彻底的大变化。1948年，冯至写了一篇《批评与论战》，进一步说明他对一个作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动荡时期的立场的日益关心。

这三篇文章，《沙龙》、《决断》和《批评与论战》，以及他对陆游的研究，说明他从一个学者和沉思冥想的诗人逐渐改变成为一个献身于鲜明政治观点的作家，并为他在1949年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作好了准备。冯至是什么时候参加新政府的工作不详，但在1950年，他作为共产党主办下的“文联”的成员，重访他三十年代旧游之地。这次旅行产生了他1950年出版的《东欧杂记》。他多年对杜甫的兴趣以1952年出版的《杜甫传》而达到高峰，这是一本学识渊博的作品，公认为近年来出版的最好的一本传记。1949年后，他出版了一些文体简练的爱国短诗和少数译作，特别是海涅的作品。他最有名的近作有《韩波砍柴》，说的是一个含冤的伐木工人韩波的鬼魂起而向木厂主复仇，1953—1955年他的《我歌唱鞍钢》，中国的钢铁被歌颂为新社会和永久和平的基础。1953年冯至任作家协会秘书，作为文艺界的官方发言人，他拥护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公开批判了他1941年写的十四行诗和里尔克的“颓废”作品。1953年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1954年被选为河南省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又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冯至对于社会主义韵文的意见，概述在他的《漫谈新诗的努力方向》，发表在1958年的《文艺报》上；《关于新诗的形式问题》，发表在1959年的《文艺评论》上。1959年出版了《十年诗钞》，以及他旧作的选集《冯至诗文选集》。

冯至的夫人是一位翻译工作者。

冯国璋 字：华甫

冯国璋（1859.1.7—1919, 12, 18），袁世凯北洋军阀系统中势力最大的人物之一，曾任直隶（1912—1913年）、江苏（1913—1917年）都督。袁世凯死后任北京政府副总统（1916—1917年），代总统（1917—1918年），直系首领，反对段祺瑞皖系。

冯国璋河北河间人，兄弟四人居幼。他和兄弟辈受旧教育，此外还学剑术骑术。冯家家道中落，产业卖尽供其兄上学。冯国璋不得不自行谋生，据说，他曾为一个戏班子拉二胡谋生。他和他一个哥哥曾进保定莲池书院，因缴不起学费而辍学。

冯国璋二十七岁时到塘沽，他有一个叔祖父在淮军一个营部中工作，冯国璋当了该营长的一名勤务兵。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办北洋武备学堂，冯国璋得到营长以可造之材推荐入学，在校学习成绩优良。1888年他请假参加考试中秀才，后因未能中举，又回武备学堂，1890年毕业，在原校任教官至1891年，后派往旅顺聂士成部下任职。冯国璋因职责所关，曾到东北各地视察，熟悉各地情况，这对聂士成于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时期很有用处。

1895年裕庚任驻日公使，聂士成推荐冯国璋充当武官，因此结识了日方不少军界人士，例如福岛安正，他后来成为士官学校校长；青木宣纯，他后来成了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冯国璋考察了日本军事的各个方面，记录了几册笔记，回国后交给了聂士成，聂又转交给了袁世凯，那时他正在小站建立新军。冯国

璋所记的日本军队训练方法甚为袁世凯重视，派他为管带。

1899年，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冯国璋随同前往，并参加了对山东义和团的镇压。义和团运动高潮时，冯国璋驻防在与直隶交界的德州，他受命阻止义和团侵入。八国联军镇压了义和团之后，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在保定另建新军，任冯国璋为保定将弁学堂总办。冯国璋依袁世凯的旨令办事，此后两年内在保定设立了一些军事学校，又在河北创办了一些陆军小学。

清政府最后的十年里，冯国璋在清政府整顿重编军队的工作上起过重要作用。1903年12月清政府成立一个改编军队委员会，冯国璋任教育处长。他负责使全国军队统一管理，使各省练军规划标准化，并为没有练军规划的各省制订规划。1905年秋，他去日本参观日俄战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演习，回国后，据说他协助筹备翌年在华北举行的一次北洋军军事演习。1906年设立陆军贵胄学堂训练满族王公子弟，冯国璋以中将衔任总办。1907年他被派到新成立的陆军部担任军谘府的领导工作，到1909年该机构改组为参谋部为止。

辛亥革命以前冯国璋的政治态度不详。但自1906年以来，特别在1908年，清政府力求控制军权，重要军事职位由满人而不由汉人担任。1909年，冯国璋的上司袁世凯被褫夺了军权，冯国璋对陆军部的满族上级军官表示不满，对袁世凯仍是忠心耿耿。因此，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前，冯国璋仍听命于袁世凯。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派两个镇前往镇压。陆军大臣荫昌指挥第一镇，冯国璋指挥第二镇。冯国璋率军沿京汉铁路南下抵彰德（安阳）时，停军不进，向袁世凯请示机宜，在袁世凯授意下，冯国璋滞留数日，使革命势力得以扩大，迫使走投无路的清政府向袁世凯让步。1911年10月27日，袁世凯取代荫昌，指挥全部湖北清军。并以冯国璋带领第一军，同日密令进攻汉口，几天后攻克。革命军和清军在武汉商谈约两周，战事重又发生。袁世凯当时在北京电令冯国璋进攻汉阳，经一周苦战，11月27日攻克汉阳。次日清政府授以二等男爵。这时，袁世凯认为他已有了讨价还价的本钱，命令冯国璋停止进攻武昌，并与革命军首领黎元洪谈判。1911年底，在武汉暂行停战协定签订后，冯国璋奉命把军权交给段祺瑞后回到北京。

袁世凯立刻撤掉了满族人在军队中的重要职位，逼载涛辞去禁卫军统领，

这是清政府最后的一点军力。冯国璋以前是陆军贵胄学校总办，和许多满族军官关系较好，乃由他来继任禁卫军统领，并利用他去劝说满族青年军官接受皇室逊位条件。冯国璋善于处事，他对满清皇室的退位深表遗憾，并表示支持他部下的要求在逊位条件中保证对清室的优厚待遇而赢得他部下的好感。此后数年中冯国璋一直任禁卫军统领，这就成为他私人军权的核心力量。

1911年12月，冯国璋任察哈尔都统。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冯任总统府军事处长，1913年9月，升为上将，并任直隶都督兼省长。1913年二次革命时，冯国璋统率了袁世凯在长江下游用以粉碎国民党抵抗的两支北洋军中的一支。他以江淮宣抚使名义，率第二支北洋军沿津浦路南下，进攻国民党据点南京，经五十天围城，南京由他名义上统率的张勋部队于1913年9月1日攻陷，张勋为江苏都督。三个月后1913年12月，冯继张勋任江苏都督。

1913年底，冯国璋是袁世凯手下最有力的部将之一。冯国璋之所以能升上显要地位，全由袁世凯的扶植。反过来，冯国璋军力的支持也是袁世凯在1911—1912年与满清皇朝及1913年与国会作政治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冯国璋任江苏都督，这是一个地大物博但并不在袁世凯直接控制之下的地区，这使冯国璋能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1913年后，袁世凯谋求加强对各省的控制，冯国璋和其他一些北洋都督，表面上虽仍效忠袁世凯，但暗中却抵制袁削减他们实力的企图。这种利害冲突，成为隐秘而又持久的磨擦根源。

冯、袁的关系到1915年由于袁世凯称帝的活动进一步紧张起来了。本年早些时候冯国璋结识了梁启超，他从梁启超那里得知这一消息，当即由南京去北京探听。袁世凯向他表明称帝谣言毫无根据。但冯国璋刚回到南京，筹安会就正式成立了。冯国璋认为他被袁世凯欺骗，又认为袁做皇帝后他个人前途也将岌岌可危，所以拒绝参加袁世凯的称帝活动。袁世凯想封他为公爵来争取他的拥戴，并准备把他调离南京，到北京来当参谋总长（1915年12月18日）。冯国璋表示如准许他留在南京就愿意担任新职。江西、湖北都督及江苏仕绅向袁吁请支持冯的立场。袁世凯不得不暂时勉强答应。

1915年12月底，蔡锷和其他云南军事领袖起而反袁。在这双方的斗争中，冯国璋并不支持袁世凯。1916年初，袁世凯命令冯国璋来北京任参谋总长兼任

征滇军总司令，冯国璋借口患病推辞。3月，冯国璋进一步试图联系其他北洋军阀一起反对帝制并反对袁世凯本人，待袁世凯觉察之前，冯国璋已取得长江各省的支持了。冯国璋同时还与南方各军事领袖取得联系，其中包括广西都督陆荣廷，此人于3月15日宣布独立参加反袁。其后，各省纷纷独立，冯也公开反对袁世凯了。4月16日，他致电袁世凯要求他停止南方用兵，并建议袁辞去总统的职务。为了保持他那若即若离的态度，他又在第二天的电报中说，袁世凯应任满总统的四年任期。

1916年春，冯国璋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想接替袁任总统和北洋系的领袖地位。冯一方面利用南方军人反对袁世凯的部属，另一方面又建立一个支持他为总统的军事及政治力量中心。五月初，冯国璋在南京召开全省代表会议，讨论袁退位及成立新国会问题。5月18日，会议开幕，冯国璋任主席。在会议中虽受到支持袁世凯的倪嗣冲和张勋的反对，但终于通过了劝告袁世凯辞退总统职位的决议。但冯国璋建议另选总统暴露了他想取袁而代之的野心，引起北洋军阀和南方军阀的反对。6月，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成为事实上的中央政府的首脑，任命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冯国璋的希望完全落空。

冯国璋的政治野心虽然受挫，但仍掌握南京的江苏督军和北洋军阀中的一名主要领袖的大权。他利用他的地位，常常唆使这一方攻击另一方，而本人则置身事外，袖手旁观。北京国会中的一些代表，采用了冯国璋本人惯用的伎俩，想用冯国璋的力量来对抗段祺瑞，提名他接替黎元洪为副总统。1916年10月30日国会联席会议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这个职务实际上只是一个空名而已，冯国璋继续当他的江苏督军留在南京。1917年2月，段祺瑞请他去北京讨论与德国断交的问题。在对德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上，段祺瑞与黎元洪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他们的关系变得如此紧张，以至3月初段祺瑞以辞职相要挟去天津。冯国璋在他们两人之间充当调解人，使总统与总理之间暂停争执。至于对德问题，冯国璋仍用一惯手法不明确表态，尽管他本人是反对与德绝交的，但他却给段祺瑞以他同意与德断交加入协约国的印象，3月11日冯国璋回南京，告知北京政府，他反对中国参加对德国作战。

1917年春，段、黎不和日益加剧，结果促成冯国璋当了代理总统。5月，

解除段祺瑞内阁总理职务及6月国会解散后，张勋企图清朝皇帝复辟。张勋想把冯国璋拉进这次冒险活动之中，但立即被拒绝；7月2日冯国璋由南京发出通电，斥责张勋，否认与张勋的复辟活动有任何关系。不久，黎元洪在军事压力下宣布辞去总统之职，据说黎元洪发出一封电报请代总统冯国璋行使总统职权。7月7日，北京仍在保皇派手中，冯国璋声明，他愿意服从黎元洪的要求在南京组成政府。但在段祺瑞等人击败了张勋于7月中旬重占北京后，冯国璋同意去北京就职。

冯国璋和段祺瑞原来都是袁世凯新建军队里的高级将领，袁世凯死后，两人互争北洋系的领导权。这一竞争的部分结果，北洋军阀就分裂为两个主要集团：直系（冯国璋是直隶人）和皖系（段祺瑞是安徽人）。1917年间，冯国璋的势力主要在江苏、江西、湖北长江诸省。冯国璋在离南京去北京就任总统时，就安置了他的心腹继任江苏督军。冯国璋的主要心腹，是他1911年出兵汉阳时的第一军将领；李纯任江苏督军；陈光远继李纯为江西督军；王占元为湖北督军。冯国璋仍亲率他的嫡系部队，包括以前的禁卫军，扩大为两师。十六师留驻南京，十五师随同开往北京作为总统府卫队。

1917年8月1日，冯国璋到北京任代理总统。刚一就任，他就和再任总理的段祺瑞发生冲突。争执的中心是北京政府对南方广州军政府的对策。段祺瑞主张镇压广州军政府并用武力讨平南方各省，冯国璋则主张和解。1917年10月、11月，北洋军先后在湖南、四川失败，段祺瑞辞职，冯国璋得以暂时推行他的和平统一政策。但段祺瑞纠集他的支持者，1918年2月能对冯国璋施加压力，迫使他放弃对南方的和解政策。3月，段祺瑞取得了张作霖的军事援助，立即坚持再任内阁总理。

由于段系的实力占优势，冯国璋同意在1918年10月任期满后即离去总统职位。作为面子上的让步，段祺瑞也同时辞去内阁总理职务。不过，冯国璋的退位会造成他全部权力的丧失，而段祺瑞的辞职，则对他控制中央政权毫无影响。冯仍有足够的威望和军力，使他不受北京政敌的干扰。1918年10月10日，在第一次举行的民国成立纪念会上，冯国璋把总统的职位让给被选出的继任者徐世昌。冯国璋退出政治舞台后，安安静静地住在北京。1919年12月28日死于肺

炎。

冯国璋曾两次结婚，他的发妻情况不详。他的继室周直（字道如）是江苏宜兴人。1914年她和冯国璋结婚前，是袁世凯女儿的家庭教师。冯国璋有五个儿子、四个女儿。长女与陈之骥结婚，他是河北丰润县人，是一个老同盟会员，1913年二次革命时任第八师师长，在南京做过短期的高级军官。他的长子家遂是直隶省的国会议员。

丰子恺

丰子恺（1898——？），艺术家，散文家，书法家，以用毛笔描绘抒述当代景象而闻名。

丰子恺：浙江崇德人，兄弟姊妹十人。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长。他在读过小学后，进杭州第一师范学堂。受教师李叔同的影响很深。李叔同是一位知名的诗人、画家和书法家，曾在日本学画，鼓励他学生的艺术兴趣。1918年李叔同出家为僧，丰子恺离杭州到了上海。1919年，丰和同县人结婚。

丰子恺在上海和另一名李叔同的学生刘质平创办了一所艺术大学，专门培养绘画音乐师资。丰子恺后来说起那时他们既缺乏经费，更缺经验，竟然胆敢搞起这样一个事业。当时在上海与此同类的学校，只有1920年刘海粟创办的一个美术学校，他是学西洋画的一名青年画家。丰子恺在此期间阅读并讲授西洋美术，还在夜校学习日文。

丰子恺自知专业知识狭窄，迫切需要扩大他的经验，1921年去日本留学。他由岳家供给费用，在日本住了十个月。他在桥川西画学校学习，同时又学日文、英文和小提琴。他对西洋音乐和戏剧很感兴趣，努力增加对这方面各种体裁的知识。他用了不少时间参观画展和博物馆，他还经常去剧场和影院。

他回国后，在浙江上虞崇汇中学教美术。1926年，他在沪江大学当美术教师，又在一些中学里教艺术、音乐、美学等课程。此外，他又参加了开明书店的编辑部。1928年出版了《西洋美术史》。

二十年代中，丰子恺的一些素描刊载在上海的报章上。他早期作品的风格是当时一些西方儿童读物插画常用的工笔点画法。不久，他就以较粗放的笔法描绘他所观察到的生活情态而别具特殊风味。他有一套描绘淘气儿童的连续组画，这是以他本人儿时的经历为蓝本的。这些作品使他开始为人所知。他漫步在上海街头时经常作一些简单素描。他将这些素描发展成为反映日常生活的图画：例如在铁路候车室的一家人，全家候车的情景、或税吏检查一对青年夫妇的行李等等。开明书局出版了他的两本关于儿童的素描集：1925年的《儿童漫画》、1927年的《子恺画集》。两年后，开明书店又出版了他的《子恺漫画集》。《人间相》和《子恺漫画全集》，先后于1935年，1946年出版。

早在1929年，丰子恺就和他的老师李叔同（他那时已是一名有声望的僧人，释名弘一）合作，丰子恺画了一些有关佛教教义的素描，叫做《护生画集》，大都由弘一法师题词。第一集有画五十幅，第二集有画六十幅，1940年开明书店和佛学书局联合出版。第二集绘画大都取材于广西宜山，那时，他在战时迁到广西的浙江大学教书。当第一集出版时，弘一法师年已五十岁，而第二集出版时，他年已六十岁了。绘画的篇幅，恰与他老师的年龄相同。1940年，弘一法师给丰子恺写信，希望他能继此不断，每十年出版一册。1942年，弘一法师死去，但丰子恺继其老师的遗志，1949—1950年在厦门出版了第三集，计有图七十幅。

丰子恺以名僧弘一的得意弟子，同时又是画家、书法家而知名。丰子恺除了他的画册以外，又写了一些有显著风格的散文。1932年，他还出版了屠格涅甫的《初恋》译本，同年又出版了斯蒂文逊的《自杀俱乐部》译本，以及其他日本作家作品的译本。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他不再作漫画但据说他继续准备为“护生画集”作画。1955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北京重印了他1929年的《子恺漫画集》。1956年，丰子恺对日本画家雪舟（1420—1506年）的研究，《雪舟的生活与艺术》一书在上海出版。两年后，又整理编订了弘一的作品《李叔同歌曲集》。

丰子恺对中国艺术界的贡献，在于他用毛笔画出他对周围人物生活的直接观察。他带着佛家的安详微笑来评论人世间的缺陷。他的绘画的最大优点是

笔简练。他的代表作是1927年出版的《子恺画集》中一幅三岁幼儿和他所画的漫画《阿Q正传》中鲁迅名作里的人物阿Q，这是他为开明书店所作的插画。

冯自由 字：建华

冯自由（1881—1958.4.6.），早年就和孙逸仙合作，是兴中会和同盟会中的知名人物。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他的政治事业就结束了。他写了不少有关革命运动的历史。

冯自由原籍广东南海，出生在日本。他父亲冯镜如，在那里从事文具印刷业。冯镜如本人出生在香港，因系英属殖民地，所以取了一个洋名叫金赛尔，他在长崎的商号也就称为金赛尔公司了，进口一些文具商品，出版一些儿童读物。他在长崎华侨中颇有声望。

孙逸仙在檀香山组织了兴中会，1894—1895年冬途经日本，散发会章，囑爱国华侨，在日本成立支部，这时冯家开始与反满政治活动发生联系。翌年，孙逸仙又来日本，他和冯家的来往，结果在长崎组成了一个小规模的支部。冯镜如选为支部负责人，十四岁的冯自由（他当时叫冯懋隆）也加入了，是年龄最幼的会员。兴中会成立后的几年中，拥护孙逸仙政治主张的一派和拥护康、梁的一派经常发生争论。冯镜如并不介入，而冯自由因为受到兴中会秘密印刷并散发的反满历史文件的影响，对兴中会的主张日益坚决支持。冯自由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的那一年，进了东京早稻田大学。此后数年，他积极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1901年，他结识了王宠惠等人。他帮助在广东成立广东独立协会，以反对法国势力侵入该省。一年后，他和章炳麟、马君武为明代崇禎皇帝开了一个逝世纪念会，由于日本军警干涉，不能在东京举行，迁到长崎开会。冯自由还致力于传播孙逸仙的纲领政策，于1901年创办了《国民报》，1903年又担任香港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和旧金山《大同日报》的驻东京记者。

1905年秋，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冯自由那时才二十五岁，他早已是兴中

会会员，并与孙逸仙相识有十年了。由于他原籍广东，又在香港、日本有家族联系，所以决定派他去香港、广州、澳门地区进行组织工作。1905年底，他到香港，建总部于陈少白主编的《中国日报》社，冯自由集中力量从事组织宣传。第二年，他任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并主持《中国日报》。当时，反满运动虽屡遭失败，但由于冯自由的坚韧不拔，工作仍照常进行。

1910年，冯自由离香港去英属哥伦比亚的温哥华任《中华日报》编辑。反满活动的屡遭失败给孙逸仙造成严重经济困难，冯自由希望在加拿大华侨中为孙逸仙筹募资金。1911年夏，孙逸仙在美国募捐，派冯自由去旧金山主编《大同日报》，并取得致公党的合作，那也是一个反满的秘密组织。致公党本是支持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主张的。在旧金山势力很大的致公党倒底支持君主立宪派还是支持孙逸仙，成为华侨、特别是北美洲华侨的一个重要议题。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改变了中国政治形势。冯自由被派往协助建立南京新政府。1911年底，他到上海，带回来不少华侨捐助革命事业的款项，以及以募捐组织名义所发的空白金价券。这些都交给了同盟会长孙逸仙。孙任临时大总统后，冯自由在他的任职期间一直当他的机要秘书。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冯自由任稽勋局长。他之所以担任这样一个不太重要，却是他一生担任过的唯一正式官职，是因为他熟知辛亥革命前反满活动。冯任此职仅一年，二次革命后，他不得不逃离北京。

1914年成立中华革命党后，孙逸仙派冯自由去美国负责党务。冯到旧金山出版党的机关刊物《民国杂志》。1917年他以华侨代表当选为参议员。此后数年中，冯自由似乎在政治活动上逐渐停止活动。1923年任广州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参加了准备翌年国民党改组的讨论。1924年1月，他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坚决反对孙逸仙的联共政策而未被选入较高级的理事会中。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他和邓泽如等不同政见分子在广州另行开会，起草一项决议对李大钊等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企图控制党权发出警告。在此决议发布之前，冯自由等人就被廖仲恺、李大钊、鲍罗庭在孙逸仙面前指控他

们违反党章，制造国共不和。冯自由后来声称，这些指控为孙逸仙所驳斥，但其中详情仍属暧昧不明。

孙逸仙死后，冯自由于1925年底在北京建立的一个“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中起主要作用。据一些材料记载，这个团体与北方的军政界人士交往甚密。西山会议前夕，冯自由曾和两个来京参加西山会议的国民党要人戴季陶、沈定一之被攻击和绑架有牵连。

冯自由不为国民党首脑人物所赏识，从此他无论在党内和政府中均未再占重要地位。虽然他在1932年曾任立法委员，1943年任国民政府委员，这些职位毫无政治上的重要性。1949年，国民党搬到台湾，冯自由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一直到1958年春中风而死，年七十七岁。

二十年代中期，冯自由的兴趣从政治转到历史，他对国民党史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28年，他就开始收集报导，通讯、私人文件和当时党内人士的回忆录。他利用这些资料，并根据他对民国成立前重要人物和事件的广泛知识，撰写辛亥年革命前的革命党史及其活动。1928年11月，《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一卷出版。第二年出版第二卷，1944年出版最后的第三卷。鉴于中国历史上有正史野史或逸史之别，冯自由想把这部书写成为一本正式的革命党史，以补他以后撰写的逸史之不足。他利用私人文献多于官方实录，例如有关革命运动初期的人物及事件的私人回忆录、轶闻等，写成《革命逸史》五卷，于1939—1947年出版。他还写了三本革命史：《华侨革命开国史》、《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华侨革命组织史话》，先后于1946、1948、1954年出版。

冯自由是一个多产作家又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他是认识到孙逸仙的“民生主义”和西方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的最早期的革命家之一。1906年，他在《中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在这篇文章里，他要求同盟会会员特别注意孙逸仙的经济思想，如土地国有化、单一税等问题。1906年5月1日，该文重刊在《民报》第四期上。1920年，冯自由又出版了一本《社会主义与中国》，研究了各派社会主义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冯友兰

冯友兰（1895—），知名的哲学家，他的《中国哲学史》是很闻名的，他的哲学体系是综合了程、朱理学和西方的实用逻辑及道家的思想。1950年后，他公开表示要以马列主义理论来重新探讨中国哲学。

冯友兰河南唐河人，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幼年时，由父母（特别是其母亲）和塾师授学。1910年进开封中州学堂，受到教师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思想的教育。后来，他取得省官费去上海中国公学读书。当时，通过严复翻译的一些西方政治社会思想已传入中国。中国公学是当时的一所较有进步思想的学校，开有逻辑课，用严复翻译的耶芳斯《名学浅说》为教材。不过，教师是不能胜任讲授此课的。据冯友兰说，一位教师只是让学生一字一句的背诵，而另一位教师则因解答不了书中的问题而辞职了。1915年，冯友兰听说北京大学设有西洋哲学系，他申请入学。但是教西洋哲学的教授去世了，他就进了中国哲学系。

1918年，他在北大毕业后，到开封办了一份时事双周刊。1919年，他获得教育部公费出国深造。1919年12月到纽约，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在两名当时美国最杰出的哲学教授杜威、伍德布里奇门下受教，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为《人生理想的比较研究：从东西哲学思想试释升降的原因》。

1923年，他回国后在开封任中州大学教授。是年冬，他在山东第一省立中学给学生作了一次演说，讲《人生观》。这篇演说后来印成小册子，其中涉及到当时知识界所争论的一些主题。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添加了一些他1923年那篇讲稿中的内容。《人生哲学》的出版正与国内知识界对东西方文明的价值进行比较，对科学、玄学人生观何者优越的热烈辩论。一般说来，保守派如张嘉森、梁启超、梁漱溟等人认为东方文化远为优越，因为它主张人们的精神文明，而反对西方的物质文明。自由派人物，例如舒新城、丁文江、胡适等人，则认为道德观念必须有物质基础，科学的重要性在于使道德生活具有不可缺少的基础。而冯友兰此书是对中国的生活方式的

正确性这一普遍关心问题的又一次说明。

冯友兰在这本书里说，物质世界是现实的，宇宙的存在并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自然的规律是不变的，可以通过科学实验和逻辑推理来发现。人类的规范和作用是相对的，要视其对各种互相抵触的人类欲望的协调能力而定。人类社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改变。冯友兰主张传统的中国观念，能否取得社会协调是判断某一社会制度的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他在这一方面论述如下：“举例来说，现在我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优越。为什么呢？正是因为许多人类的欲望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则得不到满足。资本主义制度下可得到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相对优越性确定无疑地在于其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和谐’”。

1972年，冯友兰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当年，他和同人办了《哲学评论》杂志，一直出版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才停刊。1933年，冯友兰任哲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两年后，又创办了中国哲学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举行。

冯对哲学史的主要贡献是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第一卷于1931年在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从开始到公元前一百年左右，那是中国哲学思想最光辉的时期。第一卷于1934年又由商务印书馆重印，并出版包括从公元前约一世纪至二十世纪的哲学论题的第二卷。1936年又出版了一份补编。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以其系统的完整性在中国受到读者的赞扬。一个名叫德克·博德的人在1934—35年听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课程，不久他将此书译成英文，通过这个译本，此书在西方也有了名气。译本第一卷由昂利·维奇1937年在北平出版。

冯友兰在序言中说，他对中国哲学史的写法是受了近代西方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他断言一直到清末，中国实际上只有上古和中古哲学，而近代哲学思想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公元前三世纪秦帝国建立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基本稳定不变。他称秦以前的哲学为“诸子百家时期”，秦以后则为“经学时期”，其哲理议论的基本精神是属于中古性质的，因为这些哲学家的观点看法都没有超越出上古体系之外，不过，冯友兰认为历史是由简而繁在前进的。

经学时期的学者并没有创造出全新的哲学理论，不过将旧的概念进一步深入、发挥并修改而已。二十世纪的中国在知识和社会方面之变化是如此巨大，古代哲学已远不能适应近代人的需要，因此，经学时期至此而告结束。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完成于中国的历史研究方法正在发生变化的时代。传统的断代史以褒贬和记述人物事迹的写法已为人所不取。因此就出现了人类社会的连贯发展和政治、经济、知识各方面趋势之相互影响的历史以代之。有些历史学家对古代文献进行批判并考订其真伪，另一些历史学家根据近代考古发现重写中国古代历史。政治的改革、经济的重建，战争、革命等问题日益引起全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历史学家就卷入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战。学者们往往从过去为现在找论点依据，冯友兰也在为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寻求启发，他希望这种哲学可以使处于民族危机中的中国人民作行动指南。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北平不久即沦陷。三个北方的著名大学——清华、北大、南开由敌占区迁移到湖南长沙，三校联合起来。文学院设在五岳之一的衡山。他在衡山的四个月期间起草出《新理学》大部分，初稿于1938年在昆明完成，1939年出版。《新世论》、《新世训》出版于1940年，接着《新原人》出版于1943年，《新原道》出版于1944年，《新知言》出版于1946年。这些著作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作为他对中国有能力度过现代最严重危机的信念，他称之为是《民族复兴时期丛书》。

战争使冯友兰深受影响。他亲爱的祖国遭受敌人蹂躏，1943年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萨尔温江前线。1944年，他回到河南老家将他的母亲葬于一个敌占省份。

四十年代中，冯友兰的战时丛书曾多次再版。《新理学》中的哲理特点由冯友兰自己在《中国哲学的精神》末章中作了概述（E·R·休斯所译的《新原道》英文本，1947年伦敦出版）。这本著作主要是程朱理学的新发展。理学成分与西方的现实主义及逻辑，和道家的否定主义及先验论结合了起来。在某种意义上，冯友兰的哲学体系仍属于中国哲学传统主流的范畴，但他为了适应现代的需要而加了一些修正。特别有意思的是，由于后来信从了马列主义，他断言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它的道德作用。因此，他认为在国家工业化之前，无

论是议会民主还是共产主义，对今天的中国都是行不通的。他的结论是把精力用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上，还不如用在经济建设为好。

战争结束后，洛克菲勒基金会聘冯友兰去美国，1946—1947一学年中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1947—1949年，他在夏威夷大学度过1947—1948年。1947年4月他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二百周年校庆的中国问题座谈会。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他在费城的那一年，和博德合作将《中国哲学史》第二卷译成英文。在博德的协助下，他决定为西方读者写一本他的著作的简写本。这本书还包括了自原著在中国出版以来所得的一些结论和解释。1948年《中国哲学简史》在纽约出版。虽然这并不是一本客观的历史概述，但对《中国哲学史》却作了有启发作用的解释。对宋朝理学及精神发展的儒家思想的过分强调是与冯友兰所说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是对寻求“内圣外王”的不断努力这一论断是一致的。

1948年夏，冯友兰回国后仍在清华教书。1948—1949年博德教授得了富布赖特研究基金资助来中国，不顾国民党在华北统治末期的紧张时局，他和冯继续翻译《中国哲学史》第二卷（此卷的英译本于195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该社又再版了第一卷译本）。1948年12月，共产党第四野战军到了北平西郊清华校园，冯友兰在清华接管后仍留在该校。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要求知识界的拥护。早在1949年10月11日北京政府就对高等院校文科教学颁布了一些暂行规章。按照这些规章，哲学科教学应引导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应按照马列主义理论来解释。冯友兰以及其他党外知识分子就要接受思想改造。

共产主义革命以毫不含糊的勇气和干劲去解决中国的战后问题，这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吸引力的。土地改革对冯友兰的印象特别深刻。1950年他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说“他不愿在这个伟大时代成为一个旧社会的渣滓”，要求进行改造他的思想。毛主席立刻给他复信，对他的决心表示欢迎。接着，冯友兰去农村参加土地改革。

1950年，冯友兰为苏联《大苏维埃百科全书》写了一篇中国哲学之发展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试图用马列主义解释中国哲学史。文章结尾推崇了毛泽东

《实践论》，他说《实践论》是在马列主义体系内解决了“知”和“行”的关系这一个多年来的中国哲学问题，从而给中国哲学当前和未来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调整了高等院校。清华成为综合性理工科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冯就在那里教书。1956年任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为了保持百花齐放的精神，冯友兰被派去日内瓦参加讨论现代世界的继承和革新问题的知识分子会议，然后又去维也纳参加欧洲文化协会召开的一个会议。在这两次会议的报告中，冯友兰认为西方知识界对“文化危机”的关心反映了西方国家先进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社会制度的矛盾。

百花齐放运动和放宽对意识形态控制为时不长，当共产党开始看到尽管经过了这些年的教育和对言论的控制，但是对共产党政策的反对程度仍如此之大，1957年便展开了反右运动。冯友兰虽未被定为右派而流放，但是正统政治观念的官方保卫者认为他对过去思想错误的检查不够深刻，因此，他过去的著作受到猛烈批判。

1957年1月8日，《光明日报》上刊载了他的一篇《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他对北京当局以中国哲学传统属于唯心主义和封建主义为理由，否定其大部分的关联，这会使中国哲学史的讲授感到困难。他争辩说这样的教学达不到毛泽东要重新评价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要求。冯友兰因此认为某些传统哲学观念及提法，照过去中国社会公认的具体及实际意义加以提炼，也可以说是正确的。换言之，他认为某种观念和提法是超越时代和阶级界限，对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同样适用。一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认为他的这种论断和他在《新理学》中所提出的基本未变，他是企图在新的伪装下复辟中国传统的唯心主义哲学。1957—1959年间，冯友兰的哲学思想再次成为批判对象。

1960年，反右高潮已过，知识界的气氛渐趋缓和。可能就在这时，冯友兰开始以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重写他的中国哲学史。1962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资料初稿》，对哲学史资料作了评价和批判。1964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起自商代而迄于东汉。

1961年，他的《中国哲学史》再版，也许这次的再版是由于当局认为到目前为止，尚无与之并驾齐驱的著作，而且还认为作者在思想上还是可靠的。不管怎样，冯友兰在这一版的序言中说，这本书是用资产阶级观点按照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错误写成的中国哲学史的错误的实例。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运用了近代的史学方法，系统地叙述了从古代到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的演变过程。他的哲学体系，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在现代复活理学的最成功的努力。在一个各种意识形态竞相为中国人民效忠的时代，一位无党无派的哲学家的意见被听取并受重视，这对冯友兰说来是极大的荣誉。

冯友兰的弟弟冯景兰，是一个科学家，他的妹妹冯叔兰（1902—），以冯沅君之名更为人所知，她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生，得了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与陆侃如结婚，同在山东大学教中国文学。1935年，夫妇合作出版《中国诗史》。冯沅君在四十年代中的主要兴趣是旧剧，1947年出版《古剧说荟》，1957年出版夫妇合写的《中国古典文学简史》，1958年由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文出版。

冯玉祥（冯御香） 原名：冯基善 字： 焕章

冯玉祥（1882—1948.9.1），以基督将军之称而闻名的军界头面人物。他建立了一支强大的私人军队叫国民军，在1930年以前他曾控制过华北极大的地区。

冯玉祥原籍安徽巢县，他出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他父亲冯有茂在那里当一名低级军官。冯玉祥兄弟五人，他行二，他只上过约十五个月的学，十岁时就在淮军的一个营里补了一个士兵名额，以便得到一点收入补助家用。1894年第一次中日战争爆发，冯有茂的那个营开到塘沽，冯玉祥同去。1896年该营回保定，冯玉祥成为淮军的一名正式士兵，开始接受正规军事训练。

冯玉祥虽然差不多一字不识，但他非常重视学习而开始执行一个自学计划，此后一直坚持终生。他渐渐能阅读白话文艺作品，读完了大部分著名的中的

国小说，还读了一些历史哲学书籍，但苦于文字深奥未能尽解其意。

1901年李鸿章死去，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并开始扩充兵力。冯玉祥投身袁的警卫部队，他在那里结识了几个文化较高的军官，陆建章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袁军警卫部队（后改编为第六镇）的军官。大约在1907年冯与陆建章的甥女结婚。自此次后，一直到1918年陆建章被害，冯玉祥受到陆建章的多方面保护和影响。

冯玉祥在部队里提升得很快，不久就成了管带（营长）。1907年调往东北，在徐世昌部下驻防新民。这时，他结交了几个反满的军官，1909年加入了所谓武学社。该社的另一成员张之江和冯玉祥共事多年。冯玉祥后来说到武学社的宗旨是要推翻清朝。

1911年武昌起义后，冯玉祥和一些北洋军官准备秋操时在河北滦州起义，其中有鹿钟麟、韩复榘、张之江等人。冯玉祥因在起义前利用部队印刷机印刷革命宣传品而被监禁和革职，虽然其他同谋者在1911年12月举行了起义，后因被告发，有些人被捕处死，而冯玉祥却得到陆建章的说情和担保得以释放。

1912年，冯玉祥由陆建章推荐重新进入北洋军，在陆手下当营长，并被派往直隶中南部招募并训练新兵。他的部队稳步扩充，1913年扩大为团。1914年10月，冯部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该独立旅直属中央政府指挥，但在重大战役中则听从总司令指挥。

1914年冯皈依基督教参加美以美会。他的军事声誉日高，被称为基督将军。

第十六混成旅成立后的四年中，冯玉祥和他的部下短期内无所活动。1915年12月，西南方面蔡锷、唐继尧誓师讨袁反对帝制。冯玉祥的混成旅正在四川剿匪，受命协助将军陈宦维持治安，阻击蔡锷军入川。冯玉祥虽和讨袁军有过几次交锋，但对之开始发生同情，1912年5月22日逼陈宦宣布四川独立。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冯玉祥受命驻军于京津间的廊坊，他在那里整训军队一直到1917年春，后因反对段祺瑞拆散第十六混成旅的计划，冯玉祥被免去旅长职务派给他一个挂名差使。该旅的军官起而反对，北京当局终于允许十六旅保留原状不变。

在北京、总统黎元洪和内阁总理段祺瑞之间的冲突引起了张勋复辟。段祺

瑞调十六混成旅为讨张军的先头部队。只有冯玉祥才能调动指挥该旅，因而官复原职。第十六混成旅最先进入北京，并击败张勋的军队。

1918年初，段祺瑞取得了北京的控制权后，打算用武力统一全国。冯旅奉命去湖北作战。2月，冯玉祥到了湖北武穴，但他拒绝接受北京方面下一步的命令，公开宣言倡议南北停战进行和议以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当时的总统冯国璋下令褫夺了他的兵权，并将此事交曹锟查办，经曹锟代冯说情，冯国璋方准许冯玉祥留任并受曹管辖。

1918年6月，段祺瑞恢复冯玉祥原职，任常德镇守使。冯玉祥在那里呆了约二年，训练教导他的部队。他当时的训练原则和方法内容虽然不详，但仍具有他毕生事业的练兵规划的特点。他强调通过艰苦的军事训练和体育竞赛以提高官兵的体质，部队的急行军训练更是他的军队的特长。他不容许在他的军队中有贪污和徇私。军官根据才能选拔，要和士兵同甘共苦，在战斗中尤应起表率作用。冯和他部下的官兵保持密切联系。尤其重要的是他使士兵受到深入细致的道德教育。直到1926年后期冯玉祥加入国民党以前，他对他的军队的教育方针是：强调每个人对于社会、对冯玉祥本人以及对上帝的道德责任，这是一种基督教与中国旧道德的大杂烩。1926年，他的教育规划中的基督教义由孙逸仙的三民主义代替，但是变化并不太大。1926年前后，冯玉祥总是教导他的部下要作老百姓的公仆，道德的标准就是以这方面的个人行为来衡量。什么事情是对人民有利的，什么行为是符合道德的，由冯来做最后的决定。他用这种办法，牢固地控制了他的部队。

冯任常德镇守使时，也负责这一地区的民政。他的改革措施反映出他的民政方针包括严惩盗匪及其他不法分子以维持地方治安；改进公共教育；禁赌禁娼和禁烟；创办社会福利机构如乞丐收容所、戒烟所、孤儿院；禁止传统陋习如缠足；要求士兵修城墙、筑路、植树等。

1918年到1920年之间，皖系的段祺瑞、徐世昌等和直系的曹锟、吴佩孚经常发生冲突。冯玉祥早在1918年春就加入了直系。1920年直皖战争，段祺瑞等人在北京倒台，因此各省行政机关也有不少变化。7月，冯玉祥所部离常德去豫南，他在豫南一直呆到1921年春。北京政府指令冯旅去陕西协助新任督军阎

相文，把拒不离任的原督军陈树藩赶走。冯以此立功，他的十六混成旅乃于8月5日扩编为第十一师。阎相文不久自杀，1921年8月25日冯玉祥被任为陕西督军。

冯玉祥在陕西一直呆到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中他支援吴佩孚进驻河南。冯的部下由李鸣锺率领的一个旅在河北作战，在击溃张作霖的胜利中极为得力。冯玉祥本人又率军平定了河南督军的叛乱，5月10日成为该省督军。冯扩充实力，补足全师，又增编了三个混成旅。10月31日冯玉祥被召去北京任陆军检阅使。这一新的任命，名义上似为提升，实际上则剥夺了他在地方上收取赋税的地盘。冯的调职主要是由于他和吴佩孚之间的矛盾。1923年春夏之间，冯玉祥联合了拥曹反吴的势力，迫使总统黎元洪退位，他和吴佩孚的关系也就在1923年春夏之间更为恶化。10月5日，曹锟当选为总统，冯玉祥由此得以掌握北京的货物落地税，从而他的财政收入大为好转。

同年末，冯玉祥的个人生活有一大转变，他的妻子于1923年12月去世。1924年2月19日冯和李德全结婚，她与冯玉祥的元配不一样，有文化、热心基督教会工作，在社会教育事业方面对冯玉祥很有帮助。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尽管谣传说冯玉祥不拟介入，吴佩孚仍命他负责热河前线。为了确保冯不生异谋，吴佩孚同时又任命了胡景翼和王承斌两人去监视冯玉祥的行动。但是，胡景翼、王承斌、北京卫戍司令孙岳等却和冯玉祥联合了起来一同反对吴佩孚。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和他的同谋者占领了北京，曹锟被迫免了吴佩孚的职，呼吁停战。吴佩孚的华中援军被阻断，又在山海关被张作霖所大败，但是，吴佩孚还是带了少数随从仓促逃到天津。吴失败了，战争也由此结束。

此次政变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立即将其部队编为国民军第一、二、三军，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

1924年11月2日，冯玉祥逼总统曹锟辞职，由黄郛成立过渡政府。11月5日，冯逼清朝最后的皇帝溥仪离宫，11月10日，冯玉祥、张作霖、卢永祥在天津会面并与段祺瑞多次会商成立新政府。段祺瑞成为临时执政，但冯玉祥的支持者一个也没有进入内阁。

1925年初，冯玉祥设立司令部于张家口，他的亲信张之江、李鸣钟是察哈尔、绥远的都统，8月，冯玉祥进而控制了甘肃。这一期间，冯玉祥和张作霖争相控制北京政府。华北沿海地区在张作霖手中，冯玉祥的地盘没有通海之道，冯只能从苏联取得军事接济。当时苏联顾问正在帮助国民党，冯玉祥无法拒绝苏联和国民党方面的建议。另外，徐谦是冯玉祥的一个政治顾问，此人是孙逸仙事业的多年支持者。1925年4月，冯玉祥同意国民党在他的军队里搞政治工作以换取苏联的教官和武器供应。但是冯玉祥对俄国和国民党在国民军中的政治活动严加限制，而大力开展基督教宗教教育。

张作霖决心把他的势力扩充到北京和华北，并远及长江各省。因此，早在预料之中的是以冯玉祥为一方、张作霖与吴佩孚为另一方之间的战事，在1925年终于爆发。冯玉祥和奉军重要将领郭松龄有密约，他对郭叛变以推翻张作霖的地位期望甚殷，但是1925年12月郭战败并被处死。同时冯军在夺取天津一战中损失重大。冯玉祥腹背受敌，谋求让步妥协，宣布下野，并表示将出国旅行。

双方并为因此休战，1926年3月8日，冯军布雷封锁天津大沽口以防张作霖的海军。此举立刻受到日本的抗议，谴责北京政府违背辛丑和约。日本还纠集北京使团联名于3月16日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解除封锁。第二天，北京各界代表及学生团体，在国民军与共产党的共同领导下，向段祺瑞请愿拒绝外国的最后通牒。请愿代表为政府军警所阻，开枪击伤数人。3月18日，在紫禁城南面的天安门前举行了一个群众抗议大会。示威群众游行至段祺瑞公署，在那里与政府卫队相峙，据说有示威群众四十余人被卫队杀害。第二天，段祺瑞下令逮捕四名重要的国民党党员：徐谦、李石曾、顾孟余、易培基及共产党领袖李大钊。他们被指控制造3月18日事件和进行共产党宣传。

徐谦等人在当时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的保护下暂时免于被捕。但在一个月之内，张作霖与吴佩孚加紧进攻，鹿被迫于4月15日撤出北京。徐谦逃往张家口，然后在库伦与冯玉祥相会。

冯军在天津被击溃后，冯玉祥去绥远，1926年3月底离绥远去库伦等候徐谦。他在那里和徐谦、鲍罗廷商谈后，最后同意加入国民党。他和徐谦一起由

陆路去莫斯科，1926年5月9日到达，留在苏联约三个月，参观了许多单位，会见了一些苏联领导人，得到给他的军队以军事装备的许诺，也接受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

1926年7月，徐谦听说北伐已经开始，他就离开了莫斯科。冯玉祥于8月17日由外蒙回中国。一个月后，他到达五原，重任国民军总司令。1926年9月16日，他就自己的政治立场发表了长篇宣言，正式加入国民党，表示愿接受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强调对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立场的支持。

当冯玉祥正式公开宣言效忠于国民党的时候，国民革命军正由广州出发向北顺利进军。冯玉祥率部进入陕西，1926年底前巩固了该省的控制，进而又向河南进军。部队虽已疲惫，但在冯玉祥亲自领导的鼓舞下，一举攻克河南省会郑州。他在1927年春巩固了豫北的控制。

当武汉政权和南京政权争斗的时候，冯玉祥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双方都争取他的支持。1927年6月10日至13日，他和武汉的代表汪精卫、唐生智、谭延闿、徐谦、孙科、于右任等人在郑州会商。他们答应给冯玉祥以河南的地盘，并许以其他条件，冯未表态。6月19日到21日，他又与蒋介石在徐州会商，决定把自己的赌注押在南京一边。从徐州回来后，他开始在他的控制区域内清除共产党政治工作人员。冯玉祥的联蒋决定和随之而来的行动破坏了武汉政权的政治计划，结束了俄国顾问在中国的作用。

1928年开始的北伐第二个阶段，冯玉祥的队伍构成第二集团军（当时约有三十个师），冯为总司令。在北伐的最后军事行动中，冯玉祥的部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的部将如孙连仲、鹿钟麟、韩复榘是卓越的战地司令官。

1928年6月8日攻克北京后，裁军的问题开始出现了。7月，四个集团军的总司令，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冯、阎不同意裁军的原则，这个问题就留待国民政府改组之后再来解决。

1928年10月，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任命冯玉祥为军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他控制了河南、陕西、甘肃和山东的一部份，继续保持着地方势力。

1929年1月，裁军会议召开，军队编遣工作达成了正式协议，但是决议并没有实行。冯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了。冯玉祥认为蒋裁军的目的不过是要把军权

集中在他的亲信手中。4月，蒋接管山东，切断了冯的海上通路。冯指责蒋包办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分配军费时偏向他的嫡系部队。1929年5月20日，冯实际上已脱离国民政府而独立了。国民政府解除了他的党政各职，并下令讨伐。

冯在河南、陕西集中部队，他计划用河南的韩复榘部队为对蒋作战的主力。1929年5月末，双方刚摆开了阵势，而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和他们手下的几万士兵倒向国民政府一边去了。冯玉祥失去了他最精锐的一些部队和对河南的财政、战略地位的控制。

1929年10月10日，国民军高级将领致电冯阎，斥责国民政府的政策并请求他们重整局势。蒋介石下令讨伐国民军，10月中旬战斗在豫西开始。阎锡山并未参加这次战争，战事以11月底国民军撤出河南而告结束。

1930年2月，阎锡山终于表明了他联冯反蒋，组成所谓的北方阎冯联合行动。他们得到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的支持，这些人商定和北方联盟配合的军事计划，为了向武汉进军而放弃广西。5月10日，冯玉祥下令总攻，第二天战斗就打响了。广西部队迅速进军，但6月中旬在衡阳被击败，就退出了战斗。冯、阎还得到汪精卫和所谓改组派及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支持，他们于7、8月间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另成立反对派政府。当时，激烈战斗已在山东、河南发生。

1930年9月初，北军失去山东。在此关键时刻北军的唯一希望就在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的介入了。在整个战役中，双方都拉拢张学良，他却保持中立。9月18日，张学良却以中立者的身份出面干涉，进兵华北，使北军受到致命的打击。10月初，战争结束，冯被迫放弃军权，他的部队后改编为国民政府军队。

北方联盟的瓦解，部队的改编，这对冯玉祥来说，是他军事和政治力量的结束。从1931年直到他1948年去世，他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虽然仍有职位，但再也没有实权了。

1931年12月，冯再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政府委员，1932年2月任内政部长，但未就职，两个月后就辞职了。10月，冯去张家口，一直呆到1933年春日军占热河后进逼察哈尔。1933年5月26日，冯自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

他强烈谴责国民政府不能抗击日军入侵，急速集结军队。但是，东京、南京两方面都反对他，8月初被迫下台，去山东在泰山隐居约两年之久。

1936年1月6日，他接受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任命，移居南京。他多次演讲呼吁全民抗日。中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他担任水利部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不过他始终未被准许在领导战时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1946年9月，国民政府宣布冯将率领代表团去美国考察水利灌溉。他由夫人伴同在9月间离开上海。美国政府为他安排了全面水力管理及其它工程设备的参观，他按计划路线进行了三分之一就停止了。从1947年中开始，他通过翻译专门从事公开演讲抨击蒋介石，认为他是应对目前的危机负全部责任的人。不久他就接到召他回国的命令，理由是他在美国的水利考察已经完成。他提出反对，并在公开演讲中宣称说，他倘回到国民政府治下一定会丧命。

李济琛等人在香港以公开反对蒋介石控制下的中央政权机构为目的而建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初，冯被选为中央委员。1月7日，南京国民党监察委员会以叛党罪名正式把他开除出国民党。4月，冯玉祥在美国司法部登记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驻美代表。7月，他和夫人乘俄国“胜利”轮从纽约到奥德赛，9月1日，该轮将到奥德赛时，船上失火，冯被烧伤而死，也许由于窒息或心脏病发作而死。冯的致死情况当然引起了不少议论和怀疑，但是除了出于意外事故之外，找不出其它证据。1953年10月15日，为他举行追悼会，他的骨灰葬于山东泰山。冯的寡妻李德全在奥德赛上岸，经苏联到东北。

据知冯玉祥有儿女十人。二男三女系他前妻所生，他和李德全结婚后，生有二男三女。

冯玉祥的主要出版物有1947年出版的《我的生活》，这是他1928年前的自传，还有《我所认识的蒋介石》，这是他严厉谴责蒋介石的回忆，此二书分别于1948及1949年在上海出版。他早年的著作有1932年出版的《冯玉祥日记》，日记时期由1920年11月20日到1927年底。冯在1936——1937年的演说、报告有几本，《冯在南京讲演集》，《冯在南京报告集》，《冯在南京第一年》，《冯在南京第二年》，他在1938——1939年的演讲集编成一册，1940年出版。

名为《冯副委员长抗战言论集》。冯还写诗歌。1933年他隐居泰山时，为1934年出版的赵望云的《农村写生集》题诗。《冯玉祥诗歌选集》1957年上海出版。詹姆斯·依·谢里登写了一本相当详尽的传记，叫做《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1966年出版。

傅斯年 字：孟真

傅斯年（1896.3.26—1950.12.20），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后来成了历史学家和史学奖学金的支配者。他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所长二十多年。中日战争期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台湾任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的一个书香世家，这个家族以清代第一个状元、后任大学士的傅以渐的后代而自豪。傅斯年八岁父母双亡，由祖父抚育成人。祖父是硕儒，曾任教官。傅于1905——1908年在聊城小学读书，同时又在其祖父教导下学习古籍。1909年进天津县立中学，1912年毕业。1913年进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因成绩优良，进中文系，1919年在北大毕业。

1917年秋，他和同寝室同学顾颉刚、徐彦之等商议出版一本杂志，支持新思想和新文学运动。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帮助下，他们得到了经费和在北大图书馆开会。胡适是他们的导师。1918年10月13日开第一次筹备会，罗家伦定杂志之名为《新潮》，徐彦之建议另加一英文名《文艺复兴》。参加新潮社的学生通过一项纲领，强调对概念和事物的分析批判、科学思想和革命的语言——即白话的讨论。1919年元旦该杂志创刊号出版。直到1922年3月停刊以前的期间内，俞平伯、叶圣陶、冯友兰、朱自清、毛子水都写过文章。在第一期中，傅斯年撰文同意罗家伦的意见，认为二十世纪的“新潮”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他还认为不久俄国将“吞并”全球，不是在领土上，而是在思想上。傅斯年的看法是新潮社社员的典型代表，他当时比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更为激进。因此新潮社不仅是一个文学俱乐部，而且是一个活跃的政治团体了。罗家伦是五四运动时到美国使馆递送抗议巴黎和会对于山东问题决定的备忘录的四名学生

代表之一，傅斯年则是这个有历史意义的示威运动的“统帅”。他的兄弟傅斯炎是首先打进曹汝霖住宅的五名学生之一，以此而为人称道。傅斯年用白话文写文章捍卫新文学运动，并且仿效胡适写新体诗。他是最早发现毛泽东才华的一人，认为《湘江评论》是全国最好的六种杂志之一。傅斯年和“新潮”的关系于1919年终结，那时，他以山东省公费去英国留学，俞平伯、罗家伦也出国留学了。新潮社中的其他人物也离开了北大。新潮社的全盛期为时不长，它的社员也从未超过四十人。但是其中不少人，例如傅斯年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对五四运动以及在后来中国的思想和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傅斯年在欧洲七年，他于1920年1月到英国。俞平伯不久因思乡而回国，傅曾追到巴黎和马赛去劝阻，但未成功。1920——1922年，傅斯年在伦敦大学研究历史，还听数学和实验心理学的课程。1923年9月到1926年10月，傅斯年在柏林大学学哲学和历史，他所学各科均未获得学位。他认识了俞大维，俞将俞大彩介绍给他，后来他们结为夫妇。

傅斯年回国后，192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任中文及历史系主任，后又一度代理文学院院长。1927年夏，他在中山大学里设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一期间，傅斯年不但是—名教育行政工作者，而且也是一名非常活跃的学者。他在欧洲时就开始和顾颉刚长期通信讨论中国古史，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周刊上发表。

傅斯年在学术上的声望和教育工作上的成就使他在1928年担任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他担任此职达二十二年之久。那时，该研究所分为三部，历史由陈寅恪负责，语言由赵元任负责，考古由李济负责。傅斯年有幸拥有这样三位助手，而且在协调他们的工作和取得政府的充分支持上做得极为成功。1928年10月，他主持了该所新出学报《历史语言所集刊》第一期的出版。在这一期中，傅斯年仿效德国的《历史年报》（1859年创刊）阐明研究所的目的是通过对原始资料的调查、通过发现与调查新原始资料以扩大调查范围和通过发展新调查工具来取得研究方面的进步。傅斯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此后二十年的工作中成绩是很显著的。研究所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工作可能是安阳的发掘，从而建立了商代（C.1523—1028 B.C.）的信史。该所又

在山东城子崖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黑陶文化代表所在地。语言学部对各方言，包括西南少数民族的方言，进行了一系列的宝贵调查。历史学部出版了一套明清史料的研究。1929年，傅斯年把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北平，建立图书馆，到1937年止收藏书籍达十五万册之多。1936年1月，傅斯年代丁文江任中央研究院秘书长，在院长蔡元培患病期间，他实际上成了中央研究院的实际负责人。1937年，为了保障研究所的收藏品，特别是中央博物院的安全，傅主持将其迁往南京。1938年他组织中央研究院的撤退，经长沙及桂林迁往昆明。1941年他又将该院迁往四川。

1930年傅斯年任北京大学历史教授时，他有关史学方法的文章《史学发凡讨论讲义稿》在集刊第六期上发表。他对殷周历史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很有贡献。1930年他发表了《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以实物考证殷、周各国之间的关系及楚国的起源。1932年，日军占领东北后，他出版了《东北史纲》第一卷，作为提交国联满洲问题李顿调查团的备忘录。这一仓促写出的著作受到史学家缪凤林等人的严厉批评，因此傅斯年就此置笔。1937—1938年，他准备发表《性命古训辨正》，1940年出版。1932—1936年，他为《独立评论》，及天津《大公报》写过不少时论文章。

1938—1948年，傅斯年是国民参政会中的重要人物。他参与了国共协商。他访问延安归来后，对共产党的幻想彻底破灭。但是，对国民党政权的弊政也敢于直言批评。1945年，他代理北大校长。在他的任职三年期间，他在原有的文、理、法学院之外又增设了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1946年，他又主持把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四川李庄迁回南京。1947年，他由于战时和战后的活动过于劳累，又患有慢性高血压症，去美国休养治疗，在纽黑文住了一年。

1948年，傅斯年缺席被选为立法委员，并授以中央研究院院士称号。八月回国后，他应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之请，组织该院迁往台湾。由于理工研究所的设备过重，无法迁移，而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数学研究所则安全迁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大批珍贵资料运往台湾未遭重大损失。

1949年1月，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当他正向台湾省参政会汇报台湾大学的工作时，高血压病突然发作而死去。为了纪念他对台湾大学

的贡献，傅斯年的遗体葬在台湾大学校园内特建的一座希腊式陵墓中，他的文集六卷《傅孟真先生集》，1951年在台北出版，由胡适作序。

傅斯年两次结婚，他1911年结婚的前妻是丁福翠，于1934年离婚，然后与俞大彩结婚。

傅增湘 字：叔和 号：沅叔

傅增湘（1872—1950），学者官吏，藏书家，在清政府的最后十年期间他在河北实行教育改革并创办新式学校。1917—1919年任教育总长之后，他就退出政界，成为著名藏书家。

傅增湘出生在四川江安，幼年情况不详。1872年，他家迁居华北，1888年中举，三年后他迁往保定，在莲池书院从吴汝纶学习。此后六年，他在杭州求实书院劳乃宣手下工作。1898年中进士。

傅曾任袁世凯的幕僚。清末任直隶提学使，对河北教育颇有改革。1903年，他和英敛之、姚锡光一起创办了华北最早的一所女子学校。傅斯年1885年同年举人卢木斋，曾在1929年给天津南开大学捐过图书和资金，此时也在该校共事。1905年，袁世凯派傅增湘在天津建立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由吴鼎昌和王致民（音）的妻子负责校务。1908年6月又派傅增湘在北京也办一所京师女子师范学堂，以后来在上海、无锡等地办学的胡毓仁（音）为校长。傅增湘任直隶提学使时在视察全省后建议在保定、天津、滦州和邢台等处办一些初级师范学校。由于辛亥革命爆发，他的计划未能实现。

辛亥革命后，傅增湘任唐绍仪的顾问，唐代表袁世凯和孙逸仙的南方临时政府进行谈判。1917年他应邀出任王士珍内阁的教育总长，任职到1919年5月。1922年，他被委派给北京政府写一份有关内外债款的报告书。这一工作他做了一年多，写出五卷完整系统的报告。从此以后，他退出政界，致力于版本目录研究并在国内各地旅行。

傅增湘有一部祖传的《资治通鉴》兴文署珍本。他从端方的藏书中又得到

一部这个著作。他因拥有两部不同版本的《资治通鉴》，就将他的藏书室名为《双鉴楼》。傅增湘早期就认识缪荃荪、董康、曹揆一等名藏书家。1911年后，他又遇到张元济、杨守敬及其他一些藏书专家。傅增湘能在市肆购得一些私家藏书，其中名贵的有宝熙和盛昱的家藏珍本。二十年来，他收藏了六万六千多卷善本，宋、辽、金刻本三千六百多卷，元刻本二千五百卷，明刻本三万卷，以及名人稿多种，1918年，傅增湘将他的藏书楼增建一翼称为“藏园”，他对藏书的大部分校勘整理工作都是在这里进行的。这方面的最重要的著作作为：《双鉴楼善本书目》及其补遗发行于1919年，《藏园群书题记初集》及其补遗分别发行于1938年及1943年。日本汉学家收购京津中国古笈都来向傅请教。桥川时雄为日本当局搞教育文化活动，以傅为他的顾问。他曾为桥川时雄所编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写了一篇序言。此书收集了教育文学艺术界民国元年以后还健在的四千多人的传记。该书于1940年出版。

傅增湘常把他的藏书与其它版本校订。和其他藏书家不同，他乐于把私藏的珍本刊印，其中有《永乐大典》原手写本第2610、2611两卷。他还刊印了《刘宾客文集》，《周易正义》、《方言》、《困学纪闻》。傅增湘还很注意道藏，将他珍藏的一部份刊印。当他在北京做教育总长时，把北京白云观所藏的《道藏》由商务印书馆影印。1924—1926年在徐世昌的支持下完成了这一工作。

他又编印了《宋代蜀文辑要》，收文二千一百篇，作者三百八十人。1933年出版《清代典试考略》。

1915年，傅增湘任直隶提学使时，与他的副职袁观澜合写了一本游记，后来的著作大都出版于三十年代，记录了五岳（特别是山东泰山和湖南衡山），和陕西及其它古迹的游程。1931年，他写了《藏园居士六十自述》，这是他六十年来的一篇自传，由傅增湘亲笔撰写影印。

傅增湘晚年过着退隐生活，死于1950年。

傅作义 字：宜生

傅作义（1895—— ），军官，1947年作为华北的最高统帅，商定投降

协定使共产党得以于1949年进入北平。他从阎锡山的部下开始发迹，1931——1947年任绥远省主席。1949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长。

傅作义生于山西荣河。辛亥革命时，进太原山西初级陆军学堂，武昌起义后曾被短期录用为山西学兵排长。清朝推翻后，他回校学习。1913年到北京，进清河军官预备学校。后又进保定军官学校，1918年毕业于第五期。

傅作义回山西加入阎锡山的部队，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26年，驻防天镇时，他的那一团受到冯玉祥国民军一支队伍的进攻，其兵力虽三倍于傅军，傅作义终于固守天镇，然后一次侧翼攻击，击败敌军而解围，因功升为旅长。1926年6月任晋军第四师师长。

1927年，阎锡山宣布效忠国民革命军，他从侧翼攻击奉军，使国民革命军能沿铁路由长江流域向华北推进。傅作义的第四师受命夺取京汉铁路北京保定之间的涿州，1927年10月12日攻克涿州。傅作义虽提前完成了他的战斗任务，但北上的国民革命军却未能及时到来，傅作义在涿州陷于孤立。面临强大的奉军万福麟部队和作为支援的张学良在保定的后备部队，傅作义向阎锡山报告此情况并求援，但无回音。第四师在战斗中受到一些伤亡后，傅作义将所余兵力退守涿州城内。

作战形势对守方有利，第四师曾多次击退敌人进攻。一个月后，敌军准备用围困办法使傅军粮尽投降。数周后，城内军民粮食吃完，阎锡山和国民政府对傅的英勇作战多次致电赞扬，但未派援兵。守军靠吃腐粮维持。当一切粮食吃尽后，他们发现只能靠吃酒糟再维持数日。1927年12月25日，阎锡山给他电报说，国民革命军即将到达。28日任傅作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傅作义召集部下开会商量突围。他们断定士兵因吃酒糟而营养不足、四肢浮肿，突围已无能为力。

傅作义要求部下坚守十五天，1928年1月5日到期后傅别无他法，只好投降。1928年1月12日，第四师残存的七千人撤出，万福麟进占涿州。傅作义在保定由张学良看管，第四师改编。傅作义坚守涿州整整三月，被困孤城又无解围之望。举国上下认为这是优良军事传统的一个突出成就。

奉军在华北的势力垮台，傅作义重获自由。他答应张学良不参加最后阶段的

华北军事行动,于1928年5月获释。1928年6月8日,阎锡山进北京,任命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最后一批奉军于6月12日撤出后,傅作义率第四师进入天津就职。他继续在阎锡山部下带兵,1929年任晋军第四十三师师长。1929—1930年,他参与阎、冯、汪反蒋介石的同盟。1930年他任晋军第三集团军第十军军长。5月10日,北方同盟向南京方面全面进攻,傅作义沿津浦铁路南进。6月25日攻克济南,国民政府从别处调来军队,于8月1日以十个师的力量来对付在济南的傅作义较小兵力。8月15日国民政府部队重占济南。傅的军队在撤退时因黄河发水不能渡河。这次失利对北方的失败影响很大。

傅作义于是与在华北举足轻重的张学良合作,1931年8月,傅军改编,任第七军军长。7月,又任三十五军军长、兼七十三师师长。8月,他在张学良的默许下,帮助徐永昌代商震而为山西省主席,他自己代理绥远省主席,同年底,正式任命为绥远省主席。

1933年2月,日军向热河进逼。热河战争前夕,傅作义到太原见过阎锡山后,到北平宣称晋绥部队将阻击日军的侵略。但是热河很快失陷,等不及晋绥部队的援助。造成这次溃败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张学良辞职,他的东北军改由何应钦指挥。重行安排后,傅作义任察哈尔防守司令,兼绥远省主席。

1933年4月底,日军占察东的多伦,准备利用蒙族将势力由满州国向西扩展而进占察哈尔、绥远、宁夏、甘肃和新疆。傅作义在绥远不久即看出他与内蒙自治运动的德王处于对立地位。

在南京政府的同意下,1934年4月,在绥远百灵庙成立了由德王领导的内蒙政务委员会。傅作义不赞成蒙古的独立运动。他认为汉族的统治是符合蒙族的要求的,而所谓独立运动,不过是日本侵略者的一种手段而已。

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德王出于种种原因和日方建立了密切关系,日方对蒙古的独立运动的支援日益增加。傅作义起用吐默特蒙族共产党人乌兰夫发动伊克昭盟蒙族来反对德王等人。1936年2月德王的政务委员会分裂,在归绥另成立了一个在傅作义指导下对抗的政务委员会,双方争斗在1936年11月绥远部队攻占百灵庙而达到顶峰。傅作义不顾日本的多次抗议,继续把德王的势力赶回到察东。国民政府在1936年予以表彰。1935年他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保卫绥远的部队有傅作义个人指挥的三个骑兵师，一个国民党的师，以及其他满州国在热河内蒙的军队投诚过来的几个部队，还有马占山东北挺进军的一个骑兵师。

日方显示了对察哈尔、绥远的强烈兴趣。他们一旦夺取了这一地区，那末他们就能控制西北平原，保持了威胁蒙古人民共和国侧翼和苏联的力量。他们用由一支日军分遣队支持下的满蒙联军向这个方向前进。华北的阵地迅速崩溃，张家口也失守了，大同不战而退，进入内蒙的通道已畅通无阻，傅作义在绥远的防御准备已无作用，双方力量悬殊太大。日伪军于1939年10月13日占领归绥，然后向包头进军。

傅作义转移到晋北，日军很快就打破了山西东部和北部的防线，11月，攻占太原。在1939年以前，傅仍在第二战区，以后调到第八战区隶属于朱绍良。

日方希望与国民政府以政治解决来结束战争，所以在占包头后未再向西推进。1939年冬，傅任战区副司令长官后，调动军队进攻包头日军，但未成功。日方增军后，于1940年向西攻占五原，又继续向临河、陕坝进军，在那里遇到中国军队的阻击。3月，再度进攻，但受挫。1940年4月初，傅作义军夺回五原，并继续前进想恢复原有阵地。傅作义因此又受到国民政府的表彰。

1945年7月，国民政府将绥远、宁夏改为第十二战区，以傅作义为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受命在日军投降后收复绥远。8月11日，傅军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占领了包头、归绥，10月，在绥远的日军武装解除完毕。

傅作义抓紧行动，其动机不仅想恢复他在绥远的统治。他在绥远、陕西、宁夏地区的战时任务之一是对以绥远为根据地的共产党军贺龙部队采取军事和政治行动。共产党在察绥地区的目的是要保持一条通道，由此从西北和华北进入东北。只要这个目的一旦达到，共产党就会放宽对绥远的压力。

1946年夏，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开始。傅作义失去了平绥路上的几个据点，但后来又收复了，解除了大同之围。10月11日，傅作义收复了张家口，这一行动成为共产党多次指责国民党进行“挑衅”的根据，但傅作义仍据有张家口，1946年11月被任为察哈尔省主席。1947年8月，第十二战区改为张家口绥

靖公署，傅作义为主任。1947年8月，任华北剿匪总司令。

华北还比较平静，共产党大部分兵力集中于东北和其它地区。1948年9月24日，国民党济南守军几乎不战而降，这就切断了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和南方徐州方面据点的联系。国民党命傅作义增援辽西走廊的锦州。11月初东北全部为共产党所占，国民党失去了本来可以用来加强长城防线的军队和军用物资。1948年11月初，淮海战役开始，南京国民政府顾此失彼，已无力支援华北的傅作义了。

傅作义控制了一个东起山海关、塘沽、西至宁夏的战略地区。在此地区有不少重要城市，如天津、北平、张家口、大同和承德，他又控制着古北口，傅作义手下有五十万部队。1948年11月5日，共产党军占领东北港口营口后，林彪和聂荣臻两军开始威胁傅作义的阵地。傅作义理解到东北战争已完全失败，大规模的淮海战役可能标志国民党在大陆上有组织的武装力量的末日。因此，他并不阻击共产党部队的进军，而采取了拖延战术和有计划的撤退。

1948年11月9日，聂荣臻部攻克承德，11月18日，林彪攻占山海关。12月2日，共产党军队攻下了古北口，然后，林彪的部队从塘沽到张家口发动全面进攻。12月7日，第四野战军已离北平不到三十哩。共产党军粉碎了傅作义的防御，将北平、天津、张家口分别围困。12月中旬，二十五个步兵师守卫的北平被包围。共产党军队于12月23日占领张家口，切断了傅作义与他的绥远根据地的联系。淮海战役于1949年1月初结束，国民党军大崩溃，1月15日，天津经激战后失守。军事上已土崩瓦解时，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首领会议。这次会议，明白表示了国民党的协调军事行动已全不可能，各地军事长官只能各自尽力奋战了。傅作义认识到国民党全盘皆输，所以没有去南京开会，开始独自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早在1948年12月间，傅作义就已与进攻的共产党军队的野战军司令部有过非正式的接触。秘密联络员据说是冀朝鼎，他与傅是山西同乡，在北平当傅作义的经济顾问，还有一个是民盟的著名人物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傅作义还保持有相当强大的讨价还价的资本。他的部队大部分未受损失，分在北平绥远两地，从绥远可以与西北回族首领联合。仅北平的防守军队就有二十万人以上，

有强大炮兵支援，而且傅作义是以在强敌面前有决心坚守据点而闻名的。共产党人希望和平进入北京，以免历史文物和国家财产遭受损失。

一项傅作义名义上已完成了他这国民党军官的职责以保全他的面子的协议达成了。1949年1月22日，蒋介石辞去总统之职的那一天，傅作义就和他的共产党华北对手签订了协定，他交出了北平的防御。1月31日，共产党第四野战军开进北平。这个协议使傅作义保全了北平的财产，并保证了各国外交人员的安全，同时也保全了傅作义个人的地位，后来渐为人所知，协议规定傅作义保留他在绥远的部队，由其部下两位将军董其武和孙兰峰保留其一部分军队的指挥权，并以董其武为绥远省主席。国民党对此协议的反应是立即褫夺了傅作义的职位。

傅作义是与共产党单独媾和的一名国民党最高级将领，他在1949年10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担任了高职，任水利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北京政府1954年改组时，傅仍任水利部部长，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9月，获得一级解放勋章。他于1956年春访问欧洲，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他又率领代表团去苏联考察水利。1958年2月，任水利电力部长。

傅作义的夫人是刘芸生。

韩复榘 字：向方

韩复榘（1890—1938.1）1929年投效蒋介石以前，他是冯玉祥部下，1930—1938年任山东省主席。日军侵占山东未抵抗，被捕后处决。

韩复榘出生在河北霸县。早年受旧式军校教育，然后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辛亥革命期间，他和北洋军人冯玉祥等参加了在滦州的起义。起义被清军镇压后，韩复榘回霸县老家。1912年，冯玉祥回到袁世凯北洋军中任营长，韩去找冯玉祥重叙旧交，被安置在冯部下工作。

韩复榘从勤务兵逐步升到排、连、营长。此后数年中他一直在冯玉祥所率

领的十六混成旅与冯密切共事，他也与冯玉祥部下的一名上尉，即后来很有名的宋哲元关系很密切。1924年，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兵变，韩复榘在冯玉祥的新国民军中任旅长。1925年去日本参观演习，不久即回国参加冯玉祥争权夺利的战争，任第一师师长。

1926年，冯玉祥势力被逐出北京，韩脱离了国民军，到山西去参加商震所领导的一个师。商震任绥远都统，韩复榘以晋军第十三师师长驻防绥远。

1926年9月，冯玉祥从莫斯科回国，宣布支持当时由广州向北进军的北伐军。韩复榘立刻又回到老长官冯玉祥的部下，在冯玉祥的领导下积极供职。1927年，冯的部队改编成第二集团军，韩复榘当了一名司令官。他在北伐的第二阶段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部队参加了徐州、漳河、进军河北，最后进逼北京的战役。

1928年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冯玉祥任军政部长。韩复榘任河南省主席，1928年他带领了自己的军队到任。国民党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他被选为中央委员。

韩复榘是一个有能力的将军，当时又取得了重要地位。冯玉祥在河南集中兵力，抗击蒋介石自1929年以来日益增长的势力时，他把希望寄托在韩复榘身上，但韩复榘却投倒国民政府一边，还带走了石友三、马鸿逵等三个师长和数以千计的军队。冯玉祥与蒋介石之间的战争在秋季打了起来，这次冯玉祥军被打败了。

韩复榘得到蒋介石的奖赏，任第一军军长，并奉命稳定河南、山东两省的局势。1930年他和在山东的晋军作战，并破坏了冯、阎的所谓北方同盟。1930年9月，阎锡山军和北方同盟瓦解后，韩复榘被任为山东省主席。

韩复榘治理山东比张宗昌有显著的改进。他减免苛捐杂税、并将相当大一部份税收上缴给国民政府。他加强行政和军队纪律，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举行公正的考试选送山东学生出国留学。在私生活方面，他保持了从冯玉祥那里学来的作风：服装俭朴，吃与士兵同样的食物，睡木板床。

1931年7月，韩复榘从前在国民军的伙伴石友三起兵反对国民政府。蒋介石、张学良要求韩复榘施加影响消弭这场叛乱。韩并无动静，石友三最后被张

学良、刘峙、阎锡山联合击溃。刘、阎是河南、山西省主席。1931年8月，石友三宣布辞职，将部队交给韩复榘“改编”。此举触怒了南京国民政府当局。韩复榘遇到了山东省的内部问题。他当省主席后，有一个张宗昌旧部刘珍年仍统治着鲁东一大块地方，刘在山东拥有军队，这至少表面上是得到南京国民政府准许的。1932年9月，韩复榘和刘珍年的军队发生冲突，韩复榘致电蒋介石指控刘珍年横征暴敛任意勒索，纵容盗匪。经韩复榘和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商谈之后，1932年11月1日宣称山东问题已告解决。月底，刘珍年“奉命”调往浙江。

至此，韩复榘控制了山东全省。为了保持这个局面，他拥有七万五千人的部队。他处于华北中日关系上的关键地位，12月27日在北平召开了一个以张学良为主席的华北军事长官重要会议，韩复榘积极参加了。

1933年初的热河危机没有直接对山东发生影响。日军占领了热河，控制了长城各口，战争即以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而告终。韩复榘虽仍在山东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反对日本，但一般认为，日军倘若一旦转向山东，韩复榘的兵力是不难击退其入侵的。

前国民军将领宋哲元于1935年冬在北平上了台。他和韩复榘联合起来挡住日本策划的华北五省（包括山东）自治运动。日本川樾大使于1935年8月与华北日本官员开会后去南京，中途在济南下车，据说曾对韩复榘概述政治局势并提出日本对韩的要求。1937年春，喜多诚一少将任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武官，他一到任，就去华中，华北巡游，并访问了韩复榘。

韩复榘和宋哲元均未参加7月初在庐山举行的高级官员特别会议。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爆发，韩复榘派了一名代表去庐山见蒋介石。他与胡宗南、刘峙在徐州会晤后去南京与蒋介石、冯玉祥会商。1937年8月回济南。

8月14日，日本海军在青岛登陆，10月初，日本地面部队从北方向山东进军。韩复榘对战争的态度引起了中日两方面的怀疑。1937年10月3日，日军攻占了由宋哲元二十九军和韩复榘一师防守的德州。然后，日军向济南进军。韩复榘以各种形式公开表白其爱国热忱，10月10日下令所部抗击进犯日军。但在

严峻时刻，被认为一支坚强力量的韩复榘部队竟未对日本军作什么抵抗。12月25日，日军以很小的伤亡占领了济南。韩复榘在泰安集结大军，然而日军终于又在1938年1月2日攻占了这个据点，1月5日又攻占济宁。

1月6日，蒋介石命令韩复榘不准擅自再行后退。但中国军队在山东的撤退仍在继续。负责防守徐州的李宗仁在那里集中大量部队准备阻击日军。那时，日军已在海州登陆。1938年1月11日，李宗仁受蒋介石之命，以玩忽职守的罪名将韩复榘逮捕。

韩复榘被送到汉口，在那里由以何应钦为首席法官的军事法庭对韩进行秘密审讯。其他法官是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和北伐时韩的老上司鹿钟麟。其公开的罪名是：多次违令擅自后撤；强迫山东百姓种鸦片；征收苛捐杂税并侵吞公款；私发公债；没收山东民间武器。其中大多数罪行虽无确证，但终于被判死刑，1938年1月24日在汉口和其他九名玩忽职守的军官一同被处决。

韩复榘的妻子高芝珍，也是霸县人。她是1894年举人高步瀛的孙女。高步瀛在民国初年担任过北京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曾编过一些文集。

何成浚 字：雪竹

何成浚（1882.6.20—1961.5.7），军官，原是黄兴的旧部下，在各派军人、国民党内各对立派系的谈判中担任主要调解人。1929—1932年、1937—1938年先后任湖北省主席，1939—1946年任蒋介石武汉行营主任和军事法庭法官。

何成浚、湖北省随县人，他的家庭背景和幼年生活不详，仅知他出身富裕家庭。十四岁时报考湖北陆军预备学堂，因年幼体弱未录取。十九岁时，在县学考试列首名，湖北提学使推荐他进清心书院。1905年，废科举后，清心、两湖书院合并改为新式学校，何成浚为该校学生，受到黄兴的影响。黄兴从日本回国后，争取学生和军官从事反满革命活动。

1907年，何成浚获湖北官费去日本留学，进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进第

五期士官学校步兵科。他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

1909年毕业回国后，拟投吴禄贞部，吴当时任延吉边防使。根据当时规定，回国官费留学生应回原籍工作，于是他去武昌的湖北督练公所供职。1910年，吴禄贞任第六镇统制驻保定、邀何成浚前去任团长，何未就而去北京任陆军部人事司职务。在这清政府最高军事机构的重要机构任职时，他与华北的反满势力取得了新联系。

辛亥革命后，何成浚在陆军大臣荫昌指挥的第一军中任职，他原想脱离清军职务，但为他的朋友所劝阻，说此举会被认为是想去投效叛军。他不得已重回北京，在那里得知吴禄贞已任山西巡抚，决定前去投奔，正准备启程时传来吴遇害的消息。何害怕自己安全不保，立即去天津，后去上海投效黄兴。黄兴派他去南京协助革命军，筹建临时中央政府。

1912年元旦，孙逸仙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为陆军总长，黄任何成浚为副官长。袁世凯任总统后，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黄兴任留守，负责南京的革命军队队伍，何仍为黄兴的主要助手。留守办事处于6月撤消，何成浚去湖北。11月，黄兴任粤汉、四川铁路总办，派何成浚去北京当他的联络官。1913年1月黄兴辞职后他仍留在北京。

1913年8月，何成浚离华北去上海，在二次革命中任黄兴的参谋总长。反袁失败，他与多人逃往日本。1914年夏，孙逸仙改组革命党为中华革命党。何成浚秘密回国重组反袁起义，他到了上海，陈其美不久也到了上海，两人密切合作。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黎元洪任总统，邀请黄兴来北京，黄派何成浚先去北京观察情况，但在几周后于1916年10月回上海时，黄兴已去世。

1917年，孙逸仙在南方组成军政府，何成浚去广州。孙派他发动长江一带的支持力量。他秘密到了湖北沙市，但为湖北督军王占元所阻，未能完成任务。何率军到常德，与防御湘西的警备司令李书城会合。1918年8月，北洋军进入湖南，湘军司令程潜吁请李书城和何成浚的协助，他们都承允了，但何成浚为北洋军击败。1918年5月，何离湖南去广州，又去上海会见孙逸仙。

在1920年10月北洋军被逐出湖南之前，何成浚一直留在上海。孙派他去湖南，他在那里取得谭延闿的政治支持。谭不久被赵恒惕赶下台。1921年中期，

何又去湖南，参加把王占元赶出湖北的军事行动，但因吴佩孚赶来援助王占元，此举未能成功。

孙逸仙为加强南方政治联合计划，派何成浚为特使去争取对国民党的支持。他先去云南，何在日本时的同学唐继尧自1922年来已巩固了在该省的控制。他虽在昆明滞留三个月，但仍未能取得唐对孙的支持。他在福建比较成功，为国民党在福建建立临时根据地打下了基础。1923—1924年间，何成多次在许崇智、谭延闿部队中任职，1925年8月，孙逸仙去世后，他去广州协助蒋介石东征陈炯明，攻占陈炯明粤东基地惠州后，他回到上海。

1926年7月北伐开始，蒋介石派何成浚去上海联络控制长江下游的孙传芳，何与孙是士官学校的同学。何希望孙传芳与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一致进攻一度曾是上级的吴佩孚。孙传芳认为他的地理位置离北军太近，易受攻击，因此不肯与蒋介石联合。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蒋介石令何成浚筹建湖北政务委员会。何曾任该会委员和鄂北绥靖主任，但与湖南军人唐生智发生了冲突，被迫撤出该地区。蒋介石和武汉政府破裂后在南京成立政府。何成浚任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高级顾问。

1927年夏初，何被派去争取山西阎锡山的支持。当时京汉铁路北段为奉军控制，他仍设法到达天津，经士官学校同学奉军将领韩麟春的帮助，得以在北京见到张学良等人。张学良用他的专车送他到太原去见阎锡山。阎锡山对张作霖的联合原已有动摇迹象，所以何成浚这次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何阎会商后不久，阎锡山就担任了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他们听到蒋介石暂时下野的消息后，何成浚回华中时，在北京停留与张学良、韩麟春商谈了东北承认国民党领导的可能性。

1928年8月北伐又开始，作为蒋介石徐州行营主任的何成浚、利用他和孙传芳、张宗昌部下的关系，对国民革命军在徐州的战役起了很大作用。

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于1928年5月在济南事件中与日军发生冲突，蒋介石派熊式辉与日方谈判，但无进展。5月9日，何成浚继熊与日方谈判，日军司令提出不能接受的条件后，将何扣留至5月12日才获释放。他到兖州和蒋介石

商谈后，回到徐州。

北伐军绕过济南，何成浚奉命从徐州由海路去天津及北京。他与王士珍、熊希龄、阎锡山及奉军代表商谈，使北京能免于战祸。奉军撤回东北，撤出后由阎锡山维持北京治安。

1928年7月8日，何成浚陪同张学良的代表去会见蒋介石，商谈东北接受国民党领导事宜。协议达成后，1928年12月东北挂起国民政府旗帜。

1928年，蒋介石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何成浚任军事总参议。他劝四川的刘湘和贵州军人支持国民政府，但没有取得什么成功。

当桂系军阀威胁了蒋介石的权力时，蒋介石命何成浚去北平，桂系军阀白崇禧当时在该地。何劝华北的一些师长效忠南京。张学良命令于学忠的部队对白崇禧施加压力来协助何成浚。白崇禧被迫退出华北。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何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4月任湖北省主席。新的危机出现了，何不得不与华北及东北的政治变动作斗争。阎锡山认为何成浚、唐生智的势力出现于华北地区是他发展势力的一种障碍。何成浚于1929年8月去太原访问阎锡山，在山西、河北的人事安排上满足了阎的要求。在东北，中国和苏联为了张学良夺取中东路而发生争执。张学良邀何成浚去东北会商以便与南京方面协调行动。何成浚经蒋介石同意，于8月17日去沈阳，与张学良会晤两周后回北平。但他未能改变东北的局势，苏联采取军事行动恢复了中东路的原状。

1929年9月，何成浚去山西向阎锡山报告东北情势。阎锡山对他的态度不甚明朗。10月间阎冯联盟已公开，情况就很清楚了。何成浚去郑州争取唐生智，并向南京的蒋介石报告。10月20日到开封指挥对冯玉祥军的战事。冯军失败后，唐生智又于1929年12月5日宣布反对蒋介石。何成浚由开封逃出，经徐州、青岛回到南京。

1930年2月，他终于去武昌就十个月前已任命的湖北省主席之职、兼武汉行营主任。两个月后，李宗仁参加了阎冯反蒋联盟。蒋调何应钦代何成浚为武汉行营主任，派何成浚负责指挥京汉路战事。他担任该地区的几个军的全面指挥。这些军队归属蒋介石为期不久，他们对蒋的忠诚尚不能肯定。但因何成浚

与这些将领都有老关系，所以能将这些军队控制在蒋介石的一边。何成浚的使命是击败冯玉祥军而与其它国民党部队在郑州会师。何的军队于1930年5月开始进攻，起初小有胜利，不久双方相峙不下。8月中旬，国民党军队攻下济南后，使蒋介石能把军队调到京汉线。何成浚为总指挥，国民党军于1930年9月11日发动总攻，月终，阎冯军队撤退。

当时，共产党趁机扩大了长江中游各省的根据地。当何回武昌的省主席原任时，共产党已控制了全省七十个县的大约半数。1930—1931年反共战争在湖北没有取得成功。1931年湖北发生水灾，何成浚负有民政、军事两重职责，他要求解除其中一项职务。1932年3月夏斗寅接替他任湖北省主席。6月，华中军事机构调整，何成浚任湖北绥靖公署主任及鄂皖剿共总司令，他担任后一职务一直到1937年，在湖北、安徽、湖南、江西剿共。

1933年8月，日军攻长城各口，蒋介石派他去保定，主持该地行营。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后，何回武昌。1935年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豫、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1936年冬，湖北绥靖公署改组为委员长行营，何仍任行营主任。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10月，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往武汉，11月，长江各省改组，何仍任湖北省主席。1938年6月由陈诚继任。1938年国民政府被迫从武汉撤退，武汉委员长行营撤消。1939年1月，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何成浚任军法执行总监，他在战时始终担任此职。

1946年，何成浚年六十四岁，辞去军职回湖北，当选为省参议会议长。1948年冬，他跌伤后在上海治疗。1949年春去香港，12月去台湾。1960年3月，他被指定为陈诚授副总统当选证书。1961年7月死在台北，他的《八十回忆》于1961年在台北出版。

何 键 字：芝樵 号：容园

何键（1887.4.10—1956.4.25），湖南军事领袖，1929年3月到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

何键生在湖南澧陵，幼年在本村小学读书，后进湖南省立中学。辛亥革命时他参加了南京学生军。1912年进武昌第二陆军预备学校，后去华北入保定军校第三期，与白崇禧是同期同学。1916年毕业于骑兵科，在湖南军第一师见习。1917年任排长，后升第二团第九连副连长。

1918年，北洋军阀张敬尧任湖南督军。湖南部队被迫撤往郴县。何键被派往浏阳澧陵地区负责扰乱北军后卫部队。次年，他扩充自己的部队为两部。1920年，赵恒惕、谭延闿同时起兵反张敬尧，张因此倒台，由段祺瑞的亲属吴光新任湖南督军。

在反张敬尧战役中，何键任湘军第一师骑兵团长，后又任第九团长。1924年，他陪同唐生智去洛阳和吴佩孚会谈。1926年6月，唐生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长，何键任第二师师长。1926年10月，何键参加了攻占武昌的战役。1927年4月，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和南京的蒋介石右派分裂后，唐生智任第四集团军司令，何键任第三十五军军长。

在武汉管辖的地区，尤其在湖南，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运动，分田地、杀土豪。尽管何键指出分田地过激做法的危险，汪精卫和唐生智在1927年4月22日还是同意这种做法。4月底，唐生智率军北上去打北方军阀。何键的三十五军除一小部份外，都奉命留在湖南作为后备。何键在离武汉前，命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等人指挥留守在湖南的部队。

1927年5月19日，湖南的三十五军人员和总工会在长沙发生冲突。何键的住宅为工会“纠察队”抄家，何键的父亲被抓了起来。5月21日，许克祥对工会、农会和共产党采取行动，次晨就把他们的武装解除。这就是“马日事变”。唐生智下令将缴获的工人农民枪支发还。何键那时在河南信阳，也同意了。6月5日，他通知武汉方面说，他在湖南的军队正等待政府派人员去调查处理此事。

1927年6月25日，唐生智回到长沙。当汪精卫、冯玉祥在郑州开会后，他的军队已撤出河南。唐生智发现他在湖南的部属和拥护他的人都强烈反对共产党，他本人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何键和他的三十五军开往武汉。6月28日，李品仙的第八军解除了武汉总工会纠察队武装，何键的部队占领了汉口、阳工会

总部。7月16日，武汉政务会议决定清共。两天后，李品仙、何键置汉口、汉阳于军事管制之中，并立即镇压工会、农会、共产党的各种组织。张发奎、朱培德、唐生智那时对南京用兵。1927年9月，何键的部队开到安庆、刘兴的三十六军开到芜湖。经唐生智推存，任命何键代理安徽省主席。

这时，宁、汉国民党双方正在谈判联合。1927年10月20日，南京当局宣布讨伐唐生智，并撤消其各种职务。一周后，何键的补给线受九江的朱培德威胁，不战而撤出安庆，立刻被李宗仁所部占领。11月11日，南京军事委员会的代表和何键在团风会见，何键答应回武汉并要求唐生智下野。第二天，由于唐部下将领拒不接受他的命令，他的前线部队又不肯作战，唐生智宣布下野。

11月5日，南京方面的军队开到汉口，何键、刘兴、李品仙撤往湖南，打算在那里巩固势力。1928年1月3日，李宗仁在南京表示，希望蒋介石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何键等人也致电蒋介石请他复职。但这种姿态并不能保全他们的地位。南京方面的部队，由白崇禧、程潜率领向湖南进军，1月21日至23日的一场战斗中击败湘军。1月25日攻占长沙，何键撤往湘西。5月23日，国民政府任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及清乡主任。1929年元旦，何任湘赣剿匪司令，司令部设在萍乡。一月底，他的军队曾占据井冈山的共产党根据地。

当时，蒋介石和桂系的白崇禧、黄绍竑、李宗仁的冲突达到高峰。1929年2月21日，由桂系军人控制的武汉政务委员会分会派叶琪去湖南驱逐鲁涤平，并宣布湖南省政府改组，任何键为省主席。南京政府暂时默认何键为代主席。他于1929年3月2日就职，又接替了鲁涤平清乡主任的职务，叶琪为副主任。国民政府正在调兵遣将，何键在3月11日申请辞职。他和桂系有联系，并在桂系军队中任重要职务。

国民政府对武汉地区的桂系采取行动后，3月29日，何键告知黄绍竑脱离桂系，并派代表到南京表示支持国民政府。他被任为讨伐军第四路军总指挥，并得到湖南省主席的正式任命。4月底，桂系在华中的势力被击溃。

1929年8月，他到南京参加裁军会议。这次会议不过增强了地方实力军人对国民政府当局的反对而已。9月，当时在宜昌的张发奎要求安全通过湘西和

他在华南的友军会合。何键奉命中途阻击，但当他发觉张发奎的前线司令部在长沙西南不远的邵阳时，他就让张发奎未遇重大困难通过湘西而去广西。

那时国民政府正在应付河南的威胁，河南是冯玉祥势力所控制。唐生智参加了反冯战争。1929年12月，唐生智宣布反对国民政府，而且提出何键是他的支持者。但何与南京代表刘文岛商谈后，决定仍效忠国民政府，于是唐生智的活动失败了。

1930年，冯、阎和桂系达成协议联合对国民政府采取军事行动。5月底当桂军和张发奎军向北推进时，何键不战而撤出衡阳、邵阳。蒋介石命令何键力战，并从武汉、南京派兵增援。6月3日、6月6日桂军终于先后攻占了长沙、岳州。广东出兵截断桂军后路，桂军回师解救，但在衡阳被击败，何键重占长沙，然后向衡阳推进。

何键受命和粤军追击桂军，但1930年7月，共产党军司令彭德怀由湘赣边境向长沙进军。何键立即返回长沙。7月5日共产党军攻下岳州，围困长沙。何键用四个团防守，还从湘南调兵增援，但是共产党军仍在7月27日攻下了长沙。国民政府派出由何应钦指挥的军队去湖南，美、日炮艇轰击长沙。8月5日，共产党军撤出长沙。何键因长沙失守而受到申斥，但继续任湖南省主席，而且还成了国府委员。

何键当湖南省主席首先注意的是维持治安。他主要依靠警察力量，加强保甲制度，将地方军事组织，特别是“爱护团”置于省政府控制之下。他对改革教育制度和发展湖南公路网也做了一些事情。

1933年中，国民党军队包围封锁了赣南共产党主力。10月，对共产党又一次进剿，何键任西路军总司令。共产党在湖南唯一的强大部队在湘西北，何键开始和他们作系统的战斗，把他的作战地域分为四区。1934年10月，赣闽根据地共产党军队打破国民党封锁开始长征。何键受国民政府之令，以十个师阻击共产党军通过湘南。但以一日之差未赶上行动迅速的共产党军队。

1935年，何键任所谓“剿匪”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同年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任长沙绥靖主任，负责另一次新战役。两广联盟已不成为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一支独立势力，何键的地位也大为降低，不再能在国民党政

府与广西广东领导人之间讨价还价了。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中央集权的政治改革措施。1937年11月20日，长江一带各省改组，何键的湖南省主席由蒋介石的亲信张治中继任，而调任为当时在武汉的内政部长。在他任职的十八个月中，拟订了一份新县政方案，把一些地方和中央的官吏对调。从1939年5月起，他一直当了六年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主任。

1945年，何键因病辞职，退居中国五座圣山之一的湖南南岳。1949年，共产党迫近长沙，他去香港。1950年去台湾参加国民政府，任总统府战略国事顾问，1956年4月25日死在台北，年六十九岁。

在民国时代的湖南著名军人中，何键与贺耀祖、鲁涤平、唐生智等人资辈相仿，比赵恒惕、程潜等人小几岁。何键自1929年8月到1937年11月一直任湖南省主席，可见其作为一个政治将军的才能，其任期之久，除了山西的阎锡山和新疆的杨增新之外，再没有别人超过他的了。

贺衷寒 字：君山

贺衷寒（1900.1.5—），1931—1938年主持国民党部队的政训工作，1942—1947年任社会部劳工局长，1950—1954年在台湾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会主任。

贺衷寒生在湖南岳州（岳阳），1916年去武昌进一所为湖南同乡办的学校。1917—1919年他在武昌一家通讯社当见习记者，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参加了学生运动。1920年冬，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昌组织共产主义学习小组，他也参加了。

1921年春，贺衷寒去上海学俄文，同年9月，贺被选为东方劳工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张国焘同去莫斯科参加大会。他在苏联逗留了约七个月，但并未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2年春贺回国，成为武昌民众通讯社的通讯员。1923年，通讯社被封闭，他回长沙另办通讯社。那时，谭延闿正准备驱逐湖南督军赵恒惕，谭初获

成功，赵恒惕撤出长沙，贺衷寒得以传布民族主义的宣传。但是为时不久，吴佩孚插手这一地区，又扶植赵恒惕上台。赵恒惕封闭了通讯社，贺衷寒仍积极从事长沙的青年工作，并成为上海一家报社的特约通讯员。

1924年春，贺衷寒投入黄埔军校。1924年5月他入该校第一期。11月毕业后，派在新成立的广州分校政治处工作。他的同期同学李之龙也做同样的工作。

1925—1926年，国共双方争相从政治上控制黄埔学员。1925年1月，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共产党人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使学员受共产党的领导。贺衷寒主编《国民革命周刊》，反驳青年军联合会在孙中山死后的出版物上对孙的批评。他建议青年军官对孙逸仙的思想应比对马克思、杜威、罗素等人的外国思想有更多注意。他和缪斌等人倡议成立孙文主义学会，蒋介石和负责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高级国民党代表廖仲恺都赞同这个主张。

学会的成立延搁了一些时间，因为贺衷寒和缪斌都参加了东征陈炯明。尽管在筹备期间存在着个人意见与政治主张的分歧，学会终于在1925年12月25日成立起来，总会设在广州，会长是贺衷寒。

贺衷寒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后来，他在黄埔军校经考选派去苏联留学。孙文主义学会和共产党支配下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不断发生冲突，贺衷寒还是在1926年初去莫斯科进了伏龙芝军事学院。8月20日，由于中山舰事件蒋介石采取行动反对共产党和苏联顾问，李之龙被卷入。1926年5月21日，蒋介石下令，将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一并解散。

贺衷寒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1928年1月回国。蒋介石任命他在杭州主持军官训练班，那是为了安置1927年末的动乱之后，由广州逃出来的那一批黄埔军校较晚各班的学员。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贺衷寒离开杭州的职务，调到国民党南京市党部。1929年春，他向蒋介石申请去日本学习军事、政治，经蒋介石批准后去东京。他除研究日本的发展外，还写了两本书，批评汪精卫及其所谓的改组派，那是国民党内坚决反对声势日大的蒋个人权势的一个组织。

1931年2月，贺衷寒应召回国，任南京的国民党军队政治宣传处长。继

1927国共分裂后，1929—1931年又经历了国民党内部的连年战争。共产党趁这时机，向国民党的政工人员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贺衷寒将他的那个机构叫做“剿匪宣传处”，并将此名规范化，从此把一切反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都称之为“剿匪”。在蒋介石的命令下，中央军校成立一个特别训练班，高级学员二百人受训两周，以后分派在贺衷寒的机构里。

1931年冬，剿匪宣传处改为剿匪军政治训练处，隶属于军训总监部。1932年6月，国民党庐山会议决定把豫鄂皖、赣粤闽两个剿匪指挥部的政训处分别成立。前者于6月28日在汉口设立，贺衷寒任处长。他在汉口办了一所电影制片厂，并把自1931年在那时剿共军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创办的国民党军方报纸迁到汉口，这就是众所周知强烈反共的《扫荡报》。这份报纸甚至在中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时期仍继续用此名出版。此报后来迁到重庆，由黄少谷主持。

三十年代初，贺衷寒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那时国民政府的政治工作的组织结构相当混乱。那两个专为反共前线设立的政训处，实际上是独立于南京的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之外的。1933年2月，两个地方政训处和南京的中央政训处合并，由贺衷寒以南京政训处长的身分全面负责。从此，他控制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军队、政府机关、学校中的政训工作。

1933年5月，贺衷寒在南昌召开一个政训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政训章程，明确了军队中政训工作人员的任务、职责和权力。该会议还拟订了一个“剿匪”战争中开展政治工作的方案。贺还兼任军委会南昌行营政训处长。

1933年春，日军进逼华北，政训工作任务加重了。4月，成立一个华北宣传特别总队，对华北的非南京嫡系的军队进行政治工作，8月1日改组为军委会北平分会政训处。

1934年3月，贺衷寒再次在南昌召开政治工作会议重行调整工作计划。10月，共产党从江西根据地突围长征。为了配合对共产党的追击，军事委员会成立重庆参谋团，下设政训处，作为在四川及西康地方军队中扩大南京政治影响的手段。贺衷寒的副手袁守谦去重庆负责此项工作。

1935年，贺衷寒再次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并成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委员、军队党务组组长。

1935年4月，贺衷寒召开第三次政治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在汉口举行，会议要使政治机构与军事委员会提出的军队改编计划相配合。国民党的政训工作应以扩大南京对中国西部及西北各省地方军队的控制并阻止日本势力前进为目的。

日本方面反对扩展国民党在华北的政训活动，他们正在设法使华北脱离南京的直接管辖。1935年6月，军委政训处北平分处进行一个对学生施行军事训练的计划，日方对南京施加压力，要求把它的党政机构撤出河北和察哈尔，特别要立即把政工人员撤走。1935年6月24日，国民政府答应了日本的要求，把华北的国民党政训人员撤到武昌。华北小组安排到西安，1935年8月，那里成立了政训处西北分处，其任务是防止东北军张学良的部队受共产党宣传的影响，当时那些宣传是号召成立全国抗日联合战线。

1936年，贺衷寒又增加了一些兼职：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秘书长，中央通讯社新闻检查局局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常务委员会书记长。

1937年7月，蒋介石批准贺衷寒去欧美考察军事政治形势。6月22日他在庐山向蒋辞行时，提交了一份改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计划，此计划后来实行了。1937年7月7日他去欧途经孟买时，芦沟桥事变发生。他行程未变仍前往欧洲，在德国呆了四个月，那时中日战争已扩大到上海。8月14日蒋介石召他回国，10月，在南京任政训处处长。

1938年2月，军事委员会成立政治部，加强政训处及政府机构的工作。陈诚任主任，周恩来、黄琪翔任副主任。贺衷寒只当了第一厅厅长，他的权力缩小并受到限制，虽然他仍负责国民党军队和中央军校里的政训工作，后来又兼任了政治部秘书长。1939年4月，他以西北慰问团长的身分去战地呆过一段时间。他到过共产党的战时首都延安，曾和毛泽东谈过话。

后来，陈诚继贺衷寒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贺任政治部主任，但他仍保持在该团中央执行机构中的职位。1940年初，贺衷寒、陈诚之间矛盾加剧，贺衷寒不得不辞去政治部主任。

1941年春，贺衷寒任全国总动员会人力处处长。1942年任社会部劳工局长。在他任职的五年期间里，遇到很多棘手问题，主要是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

涨引起的工资控制和解决劳工纠纷问题。他曾努力根据孙中山的著作制订并实行一个义务劳动的规划。他于1947年在武昌对劳工人员特别训练班的讲话出版成书，名为《中国的病根》。贺衷寒一直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职务，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他再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44—1947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处书记长。

1947年，贺衷寒任社会部政务次长，他被选为岳阳代表出席国民大会。1949年1月蒋介石辞去总统之职，贺衷寒也辞去了社会部的职务，专门就国家的危机等问题作讲演或写文章。在国民党撤出大陆以前他未再出任政府官职。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恢复了国民政府首脑的职位，贺衷寒任交通部长长达四年多之久，当时陈诚任行政院长，又成了他的上司。1954年5月，陈诚被选为副总统，他的阁员其中包括贺衷寒，全都辞职。1962年贺衷寒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长。

何香凝

何香凝（1880—），廖仲恺夫人，是1905年第一个参加同盟会的妇女。1926—1931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后来离开国民党，协助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何香凝原籍广东南海，幼年时住在香港。她的家庭是一个茶商，她幼年时的情况不详。1897年在广州和廖仲恺结婚，何家出资，他们夫妇得以去日本留学。

1902年，何、廖到东京。廖仲恺进早稻田大学，何香凝进东京女子美术学校。他们遇到的其他中国留日学生中，许多人是同情孙逸仙的反满活动的。1903年夏，他们与孙逸仙见面，成为他的革命计划的积极支持者。1905年，他们都参加了同盟会，何香凝是第一名女会员。为了避免日本警方的怀疑，他们在东京的寓所成为同盟会的总部。何香凝操持家务，这对富裕家庭出身的中国

妇女是不寻常的。

1911年，何香凝毕业一年后，她和廖仲恺回广州，物色献身革命事业的妇女。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何、廖继孙逸仙之后去日本。此后十年中，她和两个孩子住在东京。廖梦醒于1903年出生在东京。在东京上学。廖承志于1908年出生在东京，也在东京上小学，1919年后才回广州上中学。

1923年，廖仲恺与何香凝、廖梦醒一起回广州。何香凝在广州积极从事政治工作。她是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名妇女之一；孙逸仙夫人宋庆龄、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何香凝任妇女部长，1924年，孙逸仙北上时，她也随行，她是孙逸仙1925年立遗嘱时的见证人之一。

1925年3月孙逸仙逝世后，廖仲恺成了在广州最有权力的政治人物。他们夫妇积极支持孙逸仙的联共、联苏、统一中国的政策。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却加以反对。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去世，当时何香凝在他身旁，未受伤。

1926年1月，何香凝、宋庆龄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也是最早的两名女委员。1926年冬，何香凝去武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曾当过何香凝的助理。

1927年，蒋介石和共产党破裂，在他统治的地区内展开一个激烈的清共运动。妇女部解散，在那里工作的不少妇女被捕、受酷刑、处死。何香凝辞去国民党中的职务，迁居香港。二十多年来，她反对蒋介石个人操纵下的国民党。1931年，她虽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但她并未参加国民党的活动。她和宋庆龄提倡公民自由，保护被国民党下狱的政治犯。何香凝和她的女儿平静地住在香港，间或外出旅行。中日战争期间，她从事救济华西难民和士兵的工作。

1948年，她参预建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这是反对国民党、间接支持共产党的一个规模较小的政党，李济深是主席，何香凝是常委。

1949年4月，何香凝离香港回华北。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她被选入中央人民政府、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及人民检察院成员。她担任侨委会主任直至1959年，但其主要工作都由她的儿子副主任廖承志承担。1960年8月，她已是八十高龄，被选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并任妇

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何香凝是当代最早致力于妇女从中国传统保守思想和迷信中解放出来的一名妇女。六十年代中，她在北京的照片，看她剪的是短发，和她四十年前在广州时一样，这种发型是一个社会激进主义和有危险思想的明显标帜。

何香凝还以旧诗、国画闻名。她的绘画《何香凝画集》已出版。1957年，她写了一本回忆录名为《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北京举行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会时，何香凝是主要发言者，并写了一篇长文，在1961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对孙逸仙的去世作了很生动的叙述。虽然不一定全都翔实。

何 东 字：晓生 洋名：罗伯特

何东（1862.12.2—1956.4.26），国际知名的实业家、慈善家，他是香港最大的房地产持有者，香港的一名巨富。由于他对英国的忠诚捐献，被英王乔治五世封为爵士。

何东出生在香港距德忌笠街不远的一所小房子里，何东的少年景况并不美妙。他是一个小康的大家庭中的长子，有着非常英俊的欧洲人相貌。他先在私塾读书，十二岁时，进香港英国政府办的中央学校（皇仁学院的前身），这个学校是用英语教学的。

1878年何东参加了广州的海关招考，被录取，在那里工作了两年。由于这个职位没有什么前途，他又回到香港。后通过私人关系，进渣甸洋行当职员，这是在中国沿海各地有名的第一流大洋行。1882年他当上了香港火险公司和广州火险公司的中国代理人，这两家都是渣甸洋行的子公司。1888年他辞去此职，由他的兄弟继任，他本人作为渣甸洋行的中国顾问，与该行积极合作两年。他虽于1900年辞职，但他一生与渣甸洋行都有联系，后来成为渣甸洋行所办的很多企业的董事，有些是他曾在那里当过职员的。

在他和渣甸洋行直接共事的二十年的后期，他开始搞起自己的事业。他在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经营糖业，后逐渐扩展到香港和长江各埠。他经营香港的房

地产业并大有发展。到1896年他已成为一名百万巨富。1898年被选为香港华人慈善机关东华系统各医院的主席。1899年香港政府任命他为治安官，这表明他已跻身香港的英国上流社会之内。

1898年，康有为因变法失败逃到香港。康的亲友们都避而远之，但何东却保护了他，把他视如上宾，并给康有为的家属和随从者以资助。

1900年，他在香港办了九龙英国学校，开始在香港公益事业露头角。这是为香港的欧洲人子弟设立的学校，后改名为乔治五世学校。同时他给皇仁书院设奖学金。他是香港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到1941年止，他为该大学的捐款达二十六万港元之多。

何东在香港拥有大量房地产，被认为香港的首位巨富。他是很多公司的总经理和股东。他在汇丰银行、香港黄埔船坞公司、香港电灯公司、香港电车公司、香港地产公司、以及其它船舶、保险、交易、制造等行业都有投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给威尔斯亲王战时基金捐了十万港元并向英政府捐献救护车和飞机。当香港征收战时紧急附加税时，何东不仅照纳其本人名下部分，而且连同他的房产租户的税款也一起交纳。由于他的慷慨行动，1915年英王乔治五世封他为爵士。

1920年，何东任香港政府成立的经济计划委员会中国工业组主任。1922年他充当香港陷于瘫痪的大罢工的调解人。同年他取得了华文报纸《工商日报》的多数股权。该报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曾一度停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复刊，以其顽固反共的立场而著称。

尽管何东爵士主要效忠于英国政府，但对中华民国亦真心关怀。他不介入中国的政治，但在1923年，他曾建议召开圆桌会议解决中国各派系之间的争端。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他捐了三万港元供建中山陵附加建筑之用。

1935年，为了追念他的妻子连觉，在香港愉园建了一所最精致的佛教庙宇叫东连觉院，该庙宇还附设了女子职业学校和贫儿小学，一切费用都由何东供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庙宇成了一处主要佛学研究中心，经常有名僧居士讲说佛法。

1941年12月，何东在香港举行金婚礼后去澳门，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不在香港。香港的日本占领当局多次邀他回香港都为他所拒绝，而在战争期间一直留居澳门，他的继室马格丽特住在香港，1944年死去。战争结束后，他和香港总督哈尔柯特海军上将一同回香港。1948年他个人捐献一百万港元给香港大学建何东夫人楼作为女生宿舍。

1947年，何东八十五岁时访问美国。1949年去欧洲，受到英国、瑞典、丹麦王室和法国总统的接待。他在英国时，拜访了萧伯纳。萧伯纳曾在1935年到香港时拜访过何东。何东送他一套中式长衫，这使萧伯纳非常高兴，马上穿上与何东合影，那时何东八十七岁，萧伯纳九十三岁。1952年，何东九十寿辰时，渣甸洋行为了该行与该行的克斯威克家族和何东的三代交谊向他祝贺。香港当局向它的一位最杰出的公民致颂词。除英国政府的祝贺外，还有中国、葡萄牙、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安南各政府的祝贺。

何东的长子何世永，原是他过继的侄子，曾任汇丰银行买办，战后不久死去。他的次子何世山幼年夭折。何东身后还健在的两个儿子，长子名何世俭，是一名有成就的商人。另一子何世礼是英国伍尔德里奇军校第一个中国学员，曾在国民政府军队中任要职。一度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委员会的中国代表。何东有八个女儿：罗夫人（港名律师罗文锦之妻），戴西（适欧阳）、玛丽（适黄）、绮华（医生）、艾苓（适郑）、琼（适吉腾斯）、格雷斯（适罗）、弗洛伦斯（适姚）。

1955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他为高级爵士，他虽已年老体弱，仍飞往伦敦前去接受这种殊荣。这是他最后一次的露面了。他在临死前受洗皈依基督教，三年后周寿臣也仿效此举。何东死于1956年4月26日。

贺耀祖 字：贵严

贺耀祖（1889—1961.7.16），湖南籍军界领导人，经历过1928年5月3日的济南事件。在蒋介石部下曾任以下各职：1934—1936年驻土耳其公使，1938

-1940年任驻苏特使，1941—1942年侍从室主任及重庆市长。1949年后，他住在北京。

湖南宁乡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县份，民国期间，出过不少有名的军界领导人，贺耀祖即其中一人。他的家庭和幼年情况不详。他起先在湖南陆军预备学校，后去湖北武备学堂，以后又派去日本进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在湖南军界里，士官学校是特别有名的，在那里留过学的较易提升。

谭延闿是湖南军界前辈，在他以下，有赵恒惕、程潜。论资排辈，贺耀祖与何键、鲁涤平、唐生智、叶开鑫等人并列。民国时期，湖南各派军人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二十年代初期，这个省的主要对立面是吴佩孚联盟的赵恒惕和支持孙逸仙事业的谭延闿。贺耀祖是赵恒惕的部下，被提拔为师长。

1926年北伐前夕，唐生智脱离赵恒惕系投向广州国民政府，任第八军军长，率部进袭赵恒惕、吴佩孚。贺耀祖任护湘军前线总指挥阻击唐生智。不久，他发觉自己处于失败一方。国民革命军的前锋部队于1926年8月进占长沙，贺耀祖立刻请求湖南国民党当局替他向蒋介石说情。他的请求被接受后，他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独立师。

蒋介石在两湖取得迅速胜利后，1926年秋把注意力转到江西，国民革命军在那里和孙传芳的部队相遇。1926年11月5日，贺耀祖调往赣北前线，攻下九江，使国民革命军能在三天后攻下南昌。由于这次胜利，贺耀祖升为第四十军军长。1927年初，他率部到达南京附近，3月24日，从孙传芳部手中夺得南京。南京发生国民革命军杀害外侨，抢夺财物的事件（后来据说是渗入程潜所部第六军的共产党分子所为），贺耀祖、何应钦、鲁涤平、程潜被派负责恢复南京秩序。

1927年夏，孙传芳、张宗昌联军突然反攻，危及南京，国民革命军严重受挫。蒋介石于8月中旬辞职去日本以促成宁汉和解。1927年底，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南京国民党领导人要求蒋介石再任总司令。贺耀祖当时任京沪卫戍司令，全力支持蒋介石。贺耀祖在这个紧要关头所表示的态度，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1928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进攻北方的张宗昌和张作霖。何

应钦指挥的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军团，直属蒋介石，陈调元、贺耀祖及刘峙任军长。4月，贺军在泰安击败张宗昌的鲁军，进而攻下济南。5月2日，蒋介石到济南作渡黄河的准备。但日本利用其在济南的强大兵力，决定采取行动维护权益。这样就发生了5月3日的济南事件。在当日的冲突中，中日双方均有死亡，其中包括中国方面的外交专员，并损坏了不少财物。五·三事件引起了中国全国的愤怒。蒋介石面对日本的军事优势，力求避免发生国际冲突。贺耀祖的部队直接参与了这次事件，因而被免职，国民革命军绕道沿京汉铁路北伐。

1929—1934年间，贺耀祖当了蒋介石的副官长这一闲职。1931年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又再度当选直到1949年），1932—1934年任参谋次长。

三十年代初，蒋介石对土耳其的兴起很感兴趣。贺耀祖向蒋介石上条陈，估计土耳其形势，认为两国应建立密切关系。据说此条陈出于贺的同乡王芑生、何凤山之手。1934年11月贺出任土耳其公使，在安卡拉住了两年。王芑生、何凤山随去当他的顾问。

1937年，贺耀祖任甘肃省主席。中日战争发生后，国民政府想加强与苏联的联系。1938年驻莫斯科大使蒋廷黻回国，派贺耀祖为特使去俄国，认为他对战时中国的军事需求比文职或职业外交家更为了解。他在莫斯科任职的成就是签订了一个商务协定和几件换货协定，大大有助于抗战。1940年贺应召回国，邵力子继任驻苏大使。

1941—1942年贺耀祖在重庆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这是一个最受信任的职位，他成为蒋介石的一名最有势力的僚属。国民政府的各种重要情报、计划及呈报蒋介石的文件，都要先经他的手。他还担任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1942年底，吴国桢调任外交部次长，他继吴任重庆市长一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日本投降后，贺耀祖回到南京，他利用战时蒋介石所领导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王芑生的关系，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新亚洲协会，出版分析亚洲国际问题的月刊，其他主要成员有：前交通部次长擅长写宣传小册子的作者彭学沛，日本问题专家邵毓霖，1949—1951年任国民政府驻南朝鲜大使。新亚洲协会认为中国在国际上的正确作用是作美、苏间的桥梁。自从共产党发生内战后，国民政

府的军事、经济情况每况愈下，贺耀祖对蒋介石及其政策渐多不满。

1949年，何应钦任行政院长，贺耀祖任国民党在大陆上最后一个内阁中的不管部长。1949年春，他离上海去香港，一些前国民党的官员都聚集在那里。其中有曾于1948年去北京和共产党进行和谈的黄绍竑。在香港的这批人物中，黄绍竑、贺耀祖领衔四十四人署名发表声明，宣布效忠共产党并谴责蒋介石。贺耀祖后去北京参加了1949年9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1949年后，他常用的名字是贺贵严。1961年7月16日在北京去世。

关于贺耀祖的元配情况不详。他的继室倪斐君原在重庆当护士。据说在贺耀祖受蒋介石信任和当重庆市长时，她就思想左倾。贺在重庆的显赫地位，国民党保安机关才未对她采取行动。1945年倪和宋庆龄一起在上海工作，1949年后任中国红十字会副秘书长，并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出席和平会议和其它国际会议。

何应钦 字：敬之

何应钦（1890—），蒋介石最亲信的军官之一，1930—1944年任军政部长，1935年签订“何梅协定”屈从日本对华北的要求，1938—1944年任参谋总长，1944—1946年任总司令，1946—1948年任联合国军事顾问委员会中国代表，1950年在台湾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

何应钦的老家原是江西，十八世纪间，他的一支祖先西迁到贵州兴义落户。这个家族以贩牛起家，在清末富裕起来，既有田地又有势力。何应钦的父亲何启民在当地有些声望，代表本村参加县团练。

1900年北京为八国联军所占领时，何应钦去贵阳，1901年进贵州初级陆军学堂。毕业后去武昌，进第三中级陆军学堂，后考中出国留学，1908年由陆军部派往日本，进振武学校，在日军五十九步兵连见习。一年后，他进了士官学校步兵科，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何应钦回国，参加在上海的陈其美司令部。1913年在江苏军队第一师任营长。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又去日本士官学校完成学业。

1916年秋，何应钦自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到贵州，经贵州省长刘显世推荐，任黔军第一师第四步兵团长。1917年7月，任贵州讲武学堂教务长兼该学堂的司令部参谋长。1919年任黔军第二混成旅旅长。1920年，他在贵州历任军警各职，1921年任黔军参谋长。他深知贵州相当落后，乃模仿马志尼青年意大利运动，组织了一个所谓青年贵州会，反对旧势力，使贵州有一个真正的民国政府。许多贵州军政人物反对他的革新工作，1922年夏，不得不逃往云南，唐继尧保护了他，叫他当云南讲武堂教务长。贵州军人派人前去暗杀，他胸部中弹，经昆明的一名法国医生抢救手术得以脱险。他得到云南军队首脑范石生的帮助，离开云南到了上海。

他在上海住了一年多才养好伤，1924年1月去广州，在孙逸仙的大元帅府中当了一名参谋。6月，在黄埔军校任战术少将总教官，从此他和蒋介石就开始了密切的关系。9月初何应钦奉命成立一个教导团，10月12日，任该团团长。次日，蒋介石任何应钦为黄埔军校教导处代处长。

当时黄埔军校有两个教导团，第一教导团由何应钦任团长，第二教导团由何的朋友并士官同学王柏龄任团长。广州大元帅府命令这两个团东征陈炯明。1925年2月1日，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开离黄埔，4月，这两个教导团合编为第一旅，何应钦为旅长。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党的军队，全部改称国民革命军，黄埔学生军编入第一军，由蒋介石任军长。前第一旅改编为第一军的第一师，何应钦任师长。当时国共合作，第一师的党代表是周恩来。1925年9月，国民党第二次东征，蒋介石把他的军队分为三路，分别由何应钦、李济深、程潜指挥。何应钦所部在惠州、海丰的战役中打得很出色。11月底，陈炯明在广东的最后残余军力被消灭。

1926年1月，蒋介石辞去第一军职务，集中力量从事黄埔军校工作。何应钦接任第一军军长，王柏龄接任第一师师长。4月，中山舰事件后，何应钦任

黄埔军校教育长。

1926年7月开始北伐，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潮梅警备司令。9月，北伐军在湖南初战胜利，接着国民革命军进攻长江下游沿海五省的孙传芳，何率军突然出击永定，打败了福建督办周荫人的部队。1926年12月2日攻下福州，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到达闽北。同时，西路的国民革命军攻下南昌。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向孙传芳各据点发动进攻，何应钦向北推进入浙江。1927年3月底上海、南京也都被攻下，孙传芳的残部向北撤走。

4月，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当局决裂，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对立的政府。蒋介石决定继续北伐，分为三路，分别由他本人和李宗仁、何应钦指挥。何应钦由右翼进军，6月初，何应钦到达了鲁南峄县，李宗仁打下了徐州。孙传芳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进行反攻。由于与武汉的政治纠纷的影响，战局逆转，蒋介石下达后撤命令，国民革命军退回长江沿线。8月，蒋介石辞职去日本。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改组为军事委员会，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当时谣传说，李宗仁要和武汉政府的主要军事人物唐生智联合起来消灭蒋介石的支柱何应钦的第一军。何应钦留在南京，但把部队向东开进江苏、浙江。

孙传芳利用这个混乱时机，1927年8月又渡过长江，何应钦和李宗仁联合起来，在龙潭打败了孙传芳，迫使他的残部撤回江北。唐生智也利用这个机会调军东进指向南京，李宗仁调兵迎击。1927年10月，李宗仁击退西来的唐生智部队，何应钦肃清了淮河以南地区，攻下蚌埠，唐生智军后撤。国民党内相互争夺的各派人物，其中包括何应钦，于11月24日在上海蒋介石寓所会商党内统一团结的问题。

1927年12月初，孙传芳和山东督办张宗昌在陇海线上打败冯玉祥后，沿津浦路向南推进，何应钦率第一军北上迎战，12月16日攻下徐州。四日后，何应钦和其他几个国民革命军前线将领发表宣言，公开声明支持蒋介石。1928年1月，蒋介石重掌军政各要职后，任何应钦为浙江省主席。2月中旬，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蒋介石任总司令，何应钦任参谋长。

1928年6月，北京政府被推翻后，改编军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10月，何

应钦任训练总监，一个月后，又被任主持一个筹备全国裁军会议的委员会。会议于1929年1月开会，并未取得具体结果。因为国民党的将领都想保持自己的权力和地盘。

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何应钦被选入中央行政委员会并当上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同年他被任命为海陆空军司令部的参谋总长。1929—1930年间，南京当局蒋介石的地位多次受到威胁。何应钦历任开封、广州、郑州、武汉行营主任。1930年8月10日，任军政部长。

何应钦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消灭农村的共产党势力，率领国民党军队进行所谓剿共。1930年12月的第一次围剿失败了。1931年2月，何任南昌行营主任，指挥湘、赣地区对共产党的征伐。6月，何应钦又遭失败。蒋介石就亲自指挥，何后任剿共军前线指挥。由于反蒋的广州政权向北进军，起了不愉快的牵制作用，剿共战斗激烈而未分胜负。1931年9月沈阳事变发生后，无论是剿共军事或者与广州的争执都暂时停顿了。

1932年，何应钦任中央政治会议特别事务委员会委员。1933年1月，日军进占热河并突破长城防线。何应钦被派去北平协助张学良阻止侵略者的行动。张学良于1933年3月12日辞去军政各职。何被任命为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他和黄郛企图通过政治谈判制止日本前进。主要通过他们的努力，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

这个协定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认为无异于放弃了民族利益。冯玉祥动员抗日同盟军向察哈尔日军据点进攻以示群众的愤怒。黄郛和冯玉祥的老部下宋哲元与冯玉祥进行磋商，何应钦则在平绥路南结集大军对冯施加压力。8月中旬，冯玉祥将察哈尔的军政大权交给了宋哲元，宣布下野，然后何应钦遣散了他的军队。

1933年11月，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少将向何应钦、黄郛提出一份改善华北局势的临时计划。多次谈判，恢复了华北和伪满洲国的邮电通讯和铁路交通。

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五省自治的计划已很明显。1935年6月10日，何应钦和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中将签订了一份何梅协定。据此，中方答

应将于学忠的部队调离河北，撤消北平军事分会的一切党务及政训机构，解散蓝衣社及其它秘密抗日团体，禁止全国的反日及排外活动。7月6日，何应钦签订了一项实现这些内容的文件。

何在北平，除了担任军政部长、北平军事分会委员长职务之外，还是行政院的常驻代表。因此，他日益成为反对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首要对象。何梅协定是秘密签订的，但事实却必然为人所知。1935年秋，学生示威游行和反对华北自治的舆论增加了。但是南京终于11月撤消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不久，华北的主要权力由何应钦转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手中。

在此期间，何应钦仍在南京任军政部长，在加强军力——特别是加强空军——方面做了不少事情。他现在用全力从事加强国防的工作。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给中国形势带来了新的关键因素，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军政要员被张学良、杨虎城拘留，他们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反共、一致抗日。当时何应钦在南京，国民政府命他暂代总司令之职。他主张对此进行讨伐，包括空军轰炸。由于一系列的偶然机会和宋美龄、端纳、宋子文的坚持努力，何未能采取这样的行动。

何应钦的强硬态度也许间接有助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管怎样，1937年7月爆发的中日战争却使他在政治上能够再起。8月，何应钦任第四战区司令，司令部设广州。1938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自此以后，他负责战时的军制、计划和指挥，虽然统帅仍是蒋介石。

尽管国共双方已正式合作抗日，但冲突仍在继续。据说1941年1月发生的新四军事件的主要策划者是何应钦。

1941年，日军袭击珍珠港，美国也投入了战争。史迪威中将来华，他负有双重任务：既作中国、缅甸、印度战区的司令，又充当蒋介石的参谋长。美国官方关于这一战区的军事史中说到：“何应钦的行动使史迪威很快就觉察到，何看出一名作为委员长联合参谋部的美国参谋长的到任，带来了一个权势的争夺中心和对他自己地位的直接挑战。”

何应钦和史迪威之间的冲突很快就发生了。美国对何的看法，如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于1943年8月给罗斯福的信中所述：何代表中国军队中“现存

的一派思想，认为应该在军事上采取‘等着瞧’的政策”。史迪威催逼彻底整顿中国军队毫无能力的指挥机构，着手训练地面部队。很多在中国的美国代表认为国民党人一直将他们的大部分军队用来将中国包围西北的共产党人从来就不积极抗日。

虽然史迪威是中国战区司令蒋介石的盟军参谋长，而何应钦却是参谋总长。后者的地位对蒋介石更为重要。1943年何应钦和史迪威去印度视察中国部队。那批部队是1942年第一次缅甸战役惨败后送去的。此行结果，议定中国部队由美国军官训练，史迪威改进并扩大中国地面部队的希望增加了。1943年9月1日，何应钦提出一个计划，建立训练四十五个师的整训队伍，着手一个装备三十六个师的方案。1944年4月，何应钦得到蒋介石批准，正式同意中国军队在第二次缅甸战役中渡过萨尔温江去作战。

日军自1938年后在中国并无重大军事行动，在此时刻以所谓“一号作战”行动在华中向南进攻，使国民党军遭到惨败。1944年7月3日，史迪威给华盛顿马歇尔将军打报告说，中国的情况是病重需猛药。他要求美国推荐他担任国民党军队的最高指挥职务，何应钦应让出参谋总长一职。9月，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建议，让史迪威“可以不受约束地指挥你的军队”。几天后，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具体建议向中国共产党军队供应武器。10月，史迪威被召回国。

何应钦当了十四年军政部长，经美国政府的强烈要求而于1944年11月去职。12月，蒋介石任何应钦为中国陆军总司令。继史迪威来华的魏特迈中将，制订出一个计划，要求把在昆明东部和南部的部队集中训练，设立指挥部协调防务。魏特迈推荐陈诚执行这一计划。但是蒋介石在1944年12月12日却又任命了何应钦。

早经议定，国民党军队发出的战地行动命令须送交中美联合参谋部批准。1945年5月6日，太平洋战争已近尾声，蒋介石既未通知魏特迈，也未通知各地指挥官，令何应钦进攻敌占区的衡阳。魏特迈抗议，蒋介石辩称，他给何应钦的文件只不过是一项意见，但被僚属误认而以命令形式发出。尽管如此，5月8日，何应钦下令湘西前线发动总攻。这次进攻虽获小胜，但未能攻下衡阳。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何应钦把司令部从昆明迁到湘西芷江。他交

给日方代表一份关于投降步骤的备忘录。9月8日，何在南京设前进指挥部。

9月9日，何应钦代表蒋介石接受日本在华派遣军司令冈村的正式投降。何应钦还做出安排，让日军暂留原地，在国民党军到达之前负责守卫。

内战爆发前，何应钦在国民党军中的最高地位就已有改变，主要是因为他有不少强大的政敌，包括如陈诚、胡宗南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又如陈果夫、陈立夫这样的国民党中央政治机构的关键人物。1946年5月，以何应钦为参谋总长的战时军事委员会改为国防部，白崇禧任第一任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何应钦任重庆行营主任，这当然不能补偿他失去的参谋总长和陆军总司令的重要职位。

1946年10月，何应钦去美国当联合国军事参谋委员会中国代表，又充当中国访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国民政府曾发表公告表扬他对国家的功绩。1948年8月，何奉命回南京。国民党因与共产党内战情况迅速恶化，何应钦继白崇禧任国防部长。国民党军队受到不断挫败后，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辞去总统职务，由李宗仁代理。1949年3月，孙科辞去行政院长，李宗仁请何应钦继任，经与蒋介石商议，何应钦于3月25日在南京就任此职。他在拒绝4月间共产党苛刻的和平条款活动中起很重要的作用。共产党部队渡过长江，攻下南京，5月30日，何应钦辞去行政院长，1949年下半年飞往台湾。

1950年5月，何应钦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他还任国民党中央咨询委员会委员，这个机构是为了准备改组国民党中央机构而建立的。

以后的岁月里，他在道德重整运动中很活跃，他为了这个组织的工作曾多次去日本、欧、美。他写的《八年抗战之经过》，《日本访问讲演选集》，《道德重整运动讲演集》等著作都受到称道。

侯德榜 字：致本

侯德榜(1890—)，第一流的中国化学工程师，天津永利化工公司总工程师(1921—1949年)，总经理(1945—1949年)。1949年后，在北京任重要技术

职务，1958年任化工部副部长。

侯德榜生在福建闽侯，早年在本地上学，后来到上海进闽院铁路学堂。1908年毕业后，在津浦路时当了两年工程督察。

1910年，他考取庚款留学，进清华预备学堂准备去美国留学。他到美国后，1913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市，191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化工学士学位。后又去纽约，在布鲁克林的柏来学院学习制革。1917—1918年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深造。1919年获硕士学位，1921年获博士学位。他有关铁鞣的论文，在《美国制革化学学会学报》上发表。

1921年回国，他在塘沽永利制碱公司任总工程师。该公司原由范旭东创办，他是当时最杰出的工业界开路人之一的范源濂的堂弟。1922年，侯德榜运用苏尔维法使该公司碱厂投产。1933年该公司改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开始生产硫酸铵。他又去美国，筹备在南京附近设计一座化肥厂，并招聘青年工程人员。1935年回国办了一个氮肥厂，准备于1936年投产。中国工程学会鉴于侯德榜的贡献，1935年年会授与特别奖。

1937年，日军占领了天津、南京永利公司的工厂，范旭东决定在华西另建新厂。新厂设在四川五通桥，需要解决一些特殊的工程和设计问题，1938年，侯德榜去德国争取技术援助。但因中、德关系正在恶化，德国工程界未予协助，侯德榜等人乃去美国。他在美国从事研究期间，同时又指导在四川的工程人员进行实验，改进了永利工厂所用的制碱法。永利公司的人员称之为侯氏制碱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侯德榜在化学工程方面的成就赢得了国际声誉。1943年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44年，国民政府因他为战时军事需要设计了一些小型化工厂而授与特别奖。侯德榜再次去美国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他的《碱的制造，特别关于铵法制碱》一书，用英文在1933年由美国化学学会出版，1942年增订再版。他被选为美国化学学会和伦敦化学学会名誉会员。战时，他曾为巴西政府设计了一座制碱厂。1945年印度达旦公司聘他为工程顾问，但因他任务太多，只在1947年去过印度一次。

1945年，范旭东死后，侯德榜成为永利化工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1946

年，他曾去美国和华盛顿的进出口银行磋商在湖南建立新厂的借款。永利是战后唯一得到美国政府贷款的一家中国工业公司。但是，国内军事和政治局势不安定，协定未能履行。1948年，侯德榜成为范旭东纪念奖的第一个获得者，他将此奖金捐赠给上海中国化工学会图书馆。同年，他以国民政府实业部参议的身份去美国，他在国外为中国工程学会年会写了一篇《大战后美国合成氨工业的发展》。

这位中国第一流的化学工程师为私营企业工作了二十五年，当他五十九岁时，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一个新的事业。1950年任全国科学联合会副主席，1958年成立科学技术协会后，仍任此职。他又担任了中国化学学会主席，中国化工学会筹备委员，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常委，1957年任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1958年任化工部副部长。

侯德榜在工商联合会和民主建国会中也很活跃。他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1954—1955年在印度、巴基斯坦召开的科学会议。1957年他率领中国化肥专家代表团访问日本。1955年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委员，1956年、1957年先后参加斯德哥尔摩和哥伦比亚的会议。1956年春他在瑞典开会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意大利、瑞士、法国、比利时。他又是中巴、中伊（伊拉克）友好协会理事。

萧佛成 字：铁桥 别名：

萧佛成（1862—1939），同盟会暹罗分会会长，主办《华暹日报》华文版，并致力于改善华侨境遇。他是1931年广州分裂派的一个领导人。

他生在暹罗曼谷。原籍闽南，他的祖先在明代末年因反清而逃到台湾。后来此家族迁往马六甲，十九世纪初一部分迁居暹罗，在那里经商致富。他早年受过旧式教育。

萧佛成的老师顾成佩（音）曾在太平天国任军职，太平天国失败后逃到暹罗。因此，年轻的萧佛成就成为热诚的民族主义者和改革家，他又取得了律师

资格。1888年他二十七岁时加入了当地的三合会。三合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是一个秘密团体，有些会员常参加暴力行动。虽然如此，该会的本来宗旨依然保存，分会遍及东南亚各地。为了使其成为一个更有战斗力的组织，萧佛成和另一些革命分子成立了光复会。

当时，孙逸仙组织兴中会，这是同盟会的前身。该组织于1899年在香港出版《中国日报》，这是第一份反清的报纸，在东南亚华侨界中日益流行。1905年，萧佛成和《中国日报》的人员建立了联系，准备在曼谷办一份革命报纸。在一位因得罪了两广总督岑春煊而逃亡海外的前广西知县陈敬华(音)的协助下，萧佛成于1906年在曼谷办了一份华文报。该报不久落在康有为所领导的君主立宪派手中，萧佛成和陈敬华及其他共和派于1907年另行创办《华暹日报》，他主编中文版，他女儿主编暹罗文版。该报一直到1942年日军占领暹罗时始停刊。

1908年，孙逸仙、胡汉民等人访问暹罗，暹罗当局禁止孙逸仙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但革命党人仍秘密集会，建立同盟会暹罗分会，萧佛成为分会会长，与胡汉民结下了友谊。萧佛成从此一直效忠孙逸仙，并多次为孙筹款。

1926年，萧佛成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在会上要求政府采取保护海外华侨的有力措施。

1927年8月，萧佛成参加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筹备会，该会由胡汉民主持，萧佛成提议以南京为首都，取消非法的中央党部，取缔武汉政府，清除双重党籍的党员，逮捕叛乱分子，恢复1926年7月规定的总司令的权力，武力镇压叛乱，明令公布施行此纲领。这项提案实际上是以南京政府为合法政府的公开宣言。

萧佛成一度任南京国民党侨务部长。1928年，他返回暹罗，参加因五三济南事件而引起的华侨抵制日货的运动。暹罗政府反对政治活动，对此运动加以取缔。萧佛成使用他的影响，说服暹罗政府仅将几名企图凶杀的破坏者驱逐出境了事。曼谷的华侨对五三事件的受害人捐助了一笔巨款。

1929年，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萧佛成被选入中央监察委员会。他代表国民政府和暹罗政府谈判签订改善暹罗华侨处境的条约。1933年他再次努力，但国民政府已另派他人为代表。

1931年2月，立法院长胡汉民因与蒋介石政见分歧被拘留入狱，4月30日，萧佛成以监察委员的身份，和另三名监察委员古应芬、林森、邓泽如提议弹劾蒋介石，斥责蒋介石“陷害同志以树立个人权势”。

这个提议预示了广州的分裂行动。当时掌握广东军权的陈济棠和汪精卫、孙科、陈友仁、唐绍仪等人都支持这几位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在广州召开特别会议，在广州另行成立国民政府。

一触即发的内战因1931年9月的沈阳事变而得以避免。日本的侵略促成了国民党领导人的团结，广州的分裂运动取消了。国民政府于1931年底改组，萧佛成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由于国民党西南执行总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广东、广西两省仍处于半独立状态。留在广州的1931年分裂运动领导人，除军方的陈济棠、李宗仁之外，还有萧佛成、唐绍仪、邓泽如等人。国民党内若论资排辈，萧佛成、邓泽如都在唐绍仪之上。

1934年、1936年初，邓泽如、胡汉民先后死去，萧佛成是国民党在广州仅存的元老了，但是他没有实权，而且健康也日益衰退。他以奕棋为消遣，经常招待一些职业棋手。

1937年夏中日战争爆发，萧佛成回暹罗老家，1939年6月死在曼谷。

萧同兹

萧同兹（1894——），1932—1950年中央通讯社社长。

萧同兹的出生地是湖南常宁，他幼年时情况不详。1917年毕业于长沙湖南工业学校。1920年，他最先为人所知的活动是参加了湖南工人运动。那时他和黄爱、庞人铨共事，这两个人因与长沙华实棉纺厂的罢工有关，1921年1月被枪决。萧同兹不是劳工组织者，他只做一些宣传工作，如贴标语散传单之类。尽管如此，他也不得不在1921年逃离长沙。

萧同兹到广州后和国民党发生联系。他为北伐作宣传工作。1928年，国民

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他在国民党宣传机构中当了一名秘书。

1932年，萧同兹任中央通讯社社长，该社是1924年4月在广州就成立的，原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一个附属机构。萧任社长之前，该社并无长远工作计划，不过泛泛规定国民党各支部和党员应向中央宣传机构提供新闻报道。国内消息，以私营的大公报国闻通讯社和上海申时通讯社为主要来源，国外新闻的散发则由在华的各国通讯社所控制。

萧同兹把中央通讯社办成了一个有地位的通讯社，他一开始就认识到，要使通讯社的工作有效率就必须取得比较独立的地位。第一步，他把中央通讯社搬出南京中央党部大楼。虽然仍由国民党监管，但他可以放手建立一个采访和发送新闻的机构。他又在全国各重要城市设立分社，以自备的电讯设备建立一个电讯网，并和在华的外国通讯社交换消息。

到1937年，中央通讯社已有十个局，二十二个通讯员，全国有一百五十九家报纸向该社订购消息，每日收进一万五千字和发出二万字的新闻。中央通讯社的成功，使国闻通讯社不得不停办。1936年中日关系危急，他聘请新闻界老手日本问题专家陈博生主持日本分社，这是中央通讯社第一个国外分社。同年，主要通讯员冯有真去柏林报道奥运会消息。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区内的中央通讯社全部被迫封闭。萧同兹把总社迁往重庆，战时进行工作虽很困难，但仍有十八个分社和一批战地记者，后来又设立了摄影部提供有关战事的图片。日本狂炸重庆时，中央通讯社人员在地下室工作。当时的主要外国通讯机构如路透社，合众社已与中央通讯社有协定，联合发布新闻。这一发展反映了该社英语部扩大向国外报社发稿。中央社在远东以外的第一个分社于1940年设在华盛顿。五年之中，又在纽约、伦敦、莫斯科、新德里、加尔各答设立分社。新闻记者同时充当太平洋战区各主要司令部的战地通讯员。

萧在重庆被选为全国新闻联合会主席。他和董显光密切合作。董显光负责接待外国记者团，发表官方消息。1938年，陈博生任中央通讯社总编辑，负责该社许多技术上的工作。

萧同兹任中央通讯社社长一直到1950年，后由曾虚白继任，但萧仍任监事

会主任。1954年他在台北当蒋介石的顾问。从来没有人把萧同兹视为国民党党务活动分子，但从1934年以来他就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

谢 持 字：慧 生

谢持（1876.1.18—1939.4.16），反清革命家，孙逸仙广州政府的官员，曾任第一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他和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发生联系，参加了1930年的所谓扩大会议。

谢持出生于四川富顺的商人家庭。出生三天后就过继给他无子的叔父。谢十二岁前，他的生父和养父同住在一所大宅子里。谢持自幼多灾多病，因此常常中断学业。1898年进江阳书院读了一些维新派的书报。是年冬父亲去世，叔父因丧事所费负债累累，谢持不得不辍学帮助叔父照料店务。1899年应县试，中秀才。

1900年考入宜宾经纬学堂，受业于周善培。毕业后，随周去成都。周善培是四川省的官员，派谢持当上了一名警官学校的体育教官，不久又任四川省教育厅建校监督。1903年夏周善培调广东，谢持跟随前去，不久又回四川。1904年在树人学校当教师。1905年春回富顺，筹建富顺第二小学。谢持和本乡缙绅不和，只呆了几个月就被迫离开富顺。1906年先后在荣县的一个小学和蚕桑学校里教书。1907年2月富顺第二小学又请他去任教，大约在那时他加入了同盟会，担任富顺分会的会长。

1907年6月，周善培被任命为四川商务督办，谢持应他的邀请于9月到成都，作为他的助手任商务局秘书。谢持策划在10月2日起义攻占成都，但计划失败。10月28日，谢持请假回富顺为其母祝寿，当天晚上，有几个同盟会革命党人被捕，谢的朋友向他告警。11月22日他回成都准备营救被捕友伴，但在翌日他自己也不得不亡命。他在泸县朋友家躲藏了好几个月，在此期间他化名为谢慧生。1908年，他离四川去上海。

1909年谢持去重庆，参加了由成都高等学堂和四川师范学堂毕业学生组成

的同盟会小组。谢持在四川处境很危险，同伴坚持他去沿海一带。谢持到上海当了公学公教的教务长。1909年夏，同盟会小组派他去河南、陕西活动，他和其他革命者以牧羊人为掩护在陕西凤翔进行反清活动。

1910年12月，谢持的养母去世，谢持回富顺奔丧，并准备留在四川照顾他的养父，在重庆附近的巴县女校教书。1911年5月，四川爆发了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计划的示威，谢持等策划占取重庆。他们听到新任四川总督端方率湖北新军进四川，谢持等准备在沿江口岸长寿埋伏袭击载武器的船只。这个计划未成，谢持返回重庆。11月22日重庆宣告独立。政府军和革命党人未经流血占领了重庆，谢持被公举为重庆军政府总务厅长。11月27日，成都宣告独立，两市军政府于1912年2月组成四川军政府，任谢持为四川军政府总务厅副厅长，同年年底又被任命为参议。

1913年2月的国会选举中，谢持被选为参议院议员，3月，得悉宋教仁被刺，谢持参加一个策划暗杀袁世凯的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还有：黄复生、赵铁桥、郑雨新（音）、周毓兹（音）。这个计划被袁世凯的特务侦悉，谢持于1913年5月17日被捕。但是查无实据，又有其他参议员营救，谢持免于起诉。他受到生命的威胁，躲进东交民巷使馆区逃命，以后由天津去日本。

谢持在日本协助孙逸仙组织中华革命党，任总务部副部长，部长陈其美经常不在日本，该部工作都由谢持担任。袁世凯死后国会重开，谢持才由日本回国。

1917年6月黎元洪解散国会，谢持离北京去广州。此后他在孙中山领导下于1918—1919年担任广州政府司法部副部长，1919—1920年任内政部副部长，1921—1922年任总统府秘书长。中华革命党改名国民党，1919年10月选为党务部部长。国民党作为一个政治机构软弱无力，1922年孙逸仙准备彻底整顿。孙中山于1922年召开多次党员会议，宣布改组国民党的意图，并和他的追随者讨论修改党章。1923年1月，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正式开始，1月21日谢持被提名为参予制订党的新方针、政策的二十名顾问之一。1924年1月，谢持在改组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五个中央监察委员中的一名。

尽管谢持对孙逸仙的事业忠诚拥护，但是他反对国民党联俄联共的新政

策。早在1924年6月他就表示反对意见，他与另两名监察委员张继、邓泽如联名上书孙逸仙指出李大钊及其他共产党人的活动无疑是要破坏国民党的政治统一。1924年11月谢持在上海，作为孙的随员到北京与段祺瑞及华北当政者进行众所周知的会谈。1925年3月，孙逸仙在北京逝世后，共产党在党内颠覆的问题造成了国民党内部严重分裂。谢持自孙中山丧礼后一直留在上海。8月，他去广州和以胡汉民、邓泽如、伍朝枢、邹鲁为首的国民党内的反共派会商，讨论抵制国民党内共产党势力的扩展，和内部汪精卫左翼集团所控制的广州革命政府。1925年8月21日，国民党内的左派领袖人物廖仲恺在广州被刺。这一事件给汪精卫和共产党人以极好机会来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攻击。谢持、邓泽如、邹鲁被迫离开了广州。

1925年11月，谢持参加了在北京附近举行的西山会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内的反共人物宣称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和汪精卫为首的广州政府。反过来，1926年1月，国民党左派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谢持、邹鲁开除出党。1926年4月1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选出谢持等组成二十五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7年，“清党”后，从11月11日到13日国民党内的一个重要派系，连续在上海举行一系列会议，成立了一个由三个派系中选出正式委员三十二人，临时委员九人的特别委员会，这个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党务。谢持由西山会议派推举参加特别委员会。国民政府在特别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改组。当时南京在李宗仁及其他桂系军人的军事控制之下，他们对西山会议派关系密切，因此谢持得以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这一要职。

但是，这种统一是虚有其表的，武汉汪精卫对此特别不满，不久他的军事支持者唐生智起兵反对南京。唐生智的反叛，很快就被李宗仁平息。在一次庆祝李军胜利的会上发生了两人死亡、数人受伤的事件，西山会议派受到南京各组织的攻击，谢持不得不退出政府，到上海蛰居。

1930年，北方军阀冯玉祥和阎锡山决定反对当时在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政府，他们得到汪精卫的支持。过去汪精卫是西山会议派的政敌。西山会议派的首脑人物如覃振、谢持、邹鲁等抑制宿怨，在北平组成了一个反蒋联盟。这个

政治团体即所谓的扩大会议，1930年7月9日在北平正式成立，用来作为国民党的决策机关以反对南京行使职权的国民党机构。谢持被选入扩大会议的常务委员会。阎、冯联盟很快失败瓦解。9月，扩大会议迁往太原，一个月后也解散了。11月，谢持离开太原，躲在天津日本租界里。

1931年5月，谢持中风卧床三个月，右半身瘫痪。当时南京和广州的一贯对立导致了在广州另行成立一个新政府，谢持虽在天津但也作为广州政府领导人列名于该政府的政务会议。南京、广州的冲突，因日本侵入东北造成的危机而暂时和解。九·一八事变后，谢持立即由天津转到北平。南京、广州双方领导人的和平会议顺利结束后，谢持迁到上海。他在上海再次中风，卧床多年。

中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谢持离上海回四川，1939年4月16日在成都死去。1939年7月29日，国民政府为他举行国葬。

谢洪赉 字：邕 侯

谢洪赉（1873.5.9—1916.9.2），中国基督教作家及宣传家，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出版部主任。在他主持下，中国联合出版社成为全世界基督教青年会中有最广泛的影响的出版事业之一。

他是一个长老会牧师的长子，生在浙江绍兴，下有二弟四妹。他父亲早年加入长老会，由于青年有为而被送到浙江学院学习三年。他在毕业后决定从事传教之前，曾在家乡办了两所小学。他所受的宗教教育是由塞缪尔·都德教士亲授的，据说他抄下了好几册他老师的讲稿。

谢洪赉早年受旧式教育。1892年他十九岁时，进苏州巴芬学院，那是二十年前由美以美会创办的（后与其它学校合并成为东吴大学）。三年后，于1895年毕业，在上海华荣学院教物理、化学（这也是东吴大学的前身之一）。谢洪赉很快就显示出他教学的才能，对学生的智育和德育都同样注意。他和他的许多学生保持终生的友谊。即使在他工作十分繁重时，也要抽出许多时间和他们

通信。

1900年，谢洪赉在教学之外，还兼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译工作。同时他开始为全国基督教青年会编写大、中学校用的读物，还在青年会的夜校任课。1904年，他决定全力投身于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任总干事和出版部主任。此后十二年中，他可能是最杰出的基督教宣传家和作家，并使中国青年会的出版部成为世界基督教青年会影响最广泛的出版事业之一。

谢洪赉认为中国文字需要一种易懂文体，要比那种言简意赅的文言更能雅俗共赏。他主要是向中国学生介绍西方文学和思想。作为一个口头和文字译者，他需要发展一种典雅而又通顺生动的文体。使人设想，他的通俗文体的成就，为陈独秀、胡适等人所提倡的中国新文学运动铺了道路。

1907年谢洪赉患肺病。1909年1月，他去美国科罗拉多山区休养了几个月。1909年10月回国后，他去牯岭疗养。他对结核病的起因、预防、治疗作了全面研究，写了一本通俗读物，叫做：《结核病的性质、预防及治疗》。1910年，他自知已无治愈的希望，所以回到杭州西湖附近的家中以其余年从事他最热爱的工作。他继续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总编辑，在上海有十二名工作人员。他编辑三种杂志，审阅大量书稿文件，其中有不少是他本人写的。

谢洪赉是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部的创办人之一，一位与他接近的同仁说过：“再没有人比谢洪赉更了解基督教青年会了”。作为杭州各教会联合布道委员会的一个首要人物，他为这个委员会制订了一个重要规划。他对教会的热诚，表现在他放弃其他工作多年之后仍积极参加教会活动。

1914年10月，世界学生基督教运动的一位领导人艾迪为中国传教运动来到杭州，谢事先组织了一个研究圣经的重要人物的团体，并为艾迪来访后的活动作了安排。在艾迪主持会议期间，他还写了一些一般性研究进程规划。他临终前不久，有两位杭州知名人士请他协助组织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讨论哲学和道德的各项问题，他便和基督教青年会美国干事巴尼特合作建立了一个双周集会。他的精力虽已日渐衰竭，但还定期和这个团体聚会。他的渊博知识和直率的基督教见解团结了一批官吏、律师、教育家和实业界人士。

谢洪赉毕生辛勤工作，临死前一周，他处于剧烈痛苦和有时神智不清的状

态，他身旁还备有纸笔随时作笔记。他死于1916年9月，年仅四十三岁。他去世时，全国各大城市有二十多处为他举行追悼会。

作为一名作家、编辑和翻译者短短的一生，他始终努力不懈，用中英两种文字，写下了不下二百种英文、中文书籍、小册和文章。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编印过物理、化学、一般科学、生物、地理教科书。他还写了一套由代数至微积分的数学各主要部门的教材。

作为基督教青年会出版部主任，他出版了许多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好书，编了第一部青年会赞美诗集。不过，他的大部份作品是关于基督教信仰的实际应用。与基督教青年会视为同义的“社会服务”一词，就是谢洪赉最先提出来、又经他在任联合出版社编辑时将此词宣传开来。保罗·哈钦逊晚年在美国编纂《基督教世纪》，1918年提到谢洪赉时说：“基督教青年会的特点在中国无人不知，主要靠他的力量……基督教青年会的出版物则给当代中国有识之士以深刻印象，可以说再没有其它（基督教）出版物能与之相比的了”。

人们很自然地信赖谢洪赉的智慧和判断，感激他的同情，向他请教并常常请求帮助。和他的作品的的作用一样伟大，他的更持久的影响可能在于他与人交往方面的“深刻了解、生气勃勃和增强力量”。通过这样的交往，他鼓舞了不少中国人取得显著成就和坚定信仰。

巴尼特在总结谢洪赉给基督教青年会所做的贡献时说：“草创年代在中国倡导人类合作运动，并使该运动具有崇高理想和持久原则，他在这方面的影响之大，再无人能超过了”。

谢洪赉的一个女儿格雷斯蒂·朱曾写过一本《中国烹调艺术》（1962年），并在纽约办过烹调训练班。他的外孙塞缪尔·朱，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写过一本《近代中国的改良家：张謇，1853—1926年》，1965年出版。

谢冰莹 笔名：冰莹

谢冰莹（1903—），作家，女权运动者，以她的《从军日记》而闻名，该

书记录了她在北伐战争中在国民革命军中的生活。

她有兄弟姊妹六人，她最幼，出生在偏僻落后的湖南新化县。她父亲是一个举人，任新化中学校长二十五年以上。由于他善于引经据典，学生们称他为“康熙字典”。他教谢冰莹读旧书和诗词作为开蒙教育。她母亲个性很强，不许子女稍有违抗。据谢自述，她不肯缠足穿耳，是一个有反抗性的孩子。但她的母亲还是给她这样做了，并在她童年时就给她订了亲。后来由于她的强烈反抗，才把脚放了。

谢冰莹违母命，十岁时进了一所旧式男塾。后来，她进了本县的一所女子学校，又到湖南益阳进教会办的信义女子学校。她在1922年5月组织一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学生游行，因此被开除出校。1922年秋，她进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她在这个学校对文学的兴趣得到迅速发展。她自行选读了莫泊桑、左拉、大仲马、小仲马、杜斯妥也夫斯基等欧洲作家的译著，也读了些中国旧小说，特别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她对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的作品也很感兴趣。她写了一篇小说《一瞬间的印象》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

1926年她毕业后，决心从事文学，并逃避父母包办的婚约。听了她的一位长兄的建议，她在1926年到武汉进了国民革命军占领该地后所办的一所军事学校。在受过严格的政治军事训练后，她于1927年参加国民革命军中一个由大约五十名战士组成的女兵团去前线工作。她在军中写了《从军日记》，用冰莹的笔名于1928年发表于《中央日报》，林语堂译成英文同时也在该报上发表。《从军日记》后来译成法、德、俄、日及世界语，引起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这样的文学名流的注意。

女兵团解散后，她回湖南打算解除旧婚约，但她的父母迫使她终于成了亲，婚后她立即离开丈夫逃往上海。她过着穷困日子，企图以卖文为生。她在经济上得到武汉《中央日报》前编辑孙伏园的一些帮助。1928年，又得到她一个哥哥的资助到北京进了女子师范大学学习文学一直到1931年。哥哥的资助中断后，她靠在北京两所中学教课来维持生活。1931年离女子师范大学后又回上海，写成了两部作品：《青年王国材》、《青年书信》。预支的稿费使她能于

1931年正在日军攻占沈阳那一月去日本作短期旅行。1932年1月，日军又进袭上海，谢冰莹从日本回国，积极动员妇女支援战争，以后又回长沙，写完她自传体的作品《一个女兵的自传》第一部。

1935年谢冰莹第二次去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西方文学。当她和一家日本出版社商定出版她的全集时，她于4月12日被逮捕，入狱三周。她回国后去桂林休养。同年秋，她在南宁中学教书，一学期后因病辞职。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发生，谢冰莹继续从事写作和战时工作。1937年，她在湖南组织一个妇女战地服务队。12月去重庆，任《新民报》文学副刊主编。1937—1938年，她对战争初期的情况写了不少作品。1938年春，她作为武汉的第五战区司令部的战地通讯员去徐州。秋天，回到重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

1940年谢冰莹的《叛逆的女性：一个女兵的日记》，由林语堂的两个女儿艾达和安农译成英文，纽约戴约翰公司出版。1940—1943年，谢冰莹在西安主编《黄河》月刊。以后她回四川，战争年代她一直在成都教书。

1945年日本投降后她去汉口，主编《和平日报》的文学副刊。以后去北平，在师范大学教书，并任《文艺与生活》编辑。1948年崔奇把她1928年的作品，译成英文《一个中国女性的自传》在伦敦出版。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她去台湾，在台北女子师范学校教书，她的《我怎样写作》于1964年在台北出版。

林语堂在《叛逆的女性：一个女兵的日记》英译本序言中指出：谢写出了中国社会动荡之际的亲身经历而成名。她坦率的爱国精神，对腐败政治的坚强斗争，对穷困和压迫不屈不挠的斗争，对中国社会传统歧视妇女的反抗，是五四运动后新中国的社会理想主义的典型。她的作品是解放了的中国妇女参加社会革命的重要文学记录。

谢婉莹 笔名：冰心

谢婉莹（1900.10.5—），诗人，散文家，短篇小说的作者，以冰心之名为人所知。

谢婉莹福建闽侯人，她出身在福建的一个富裕家庭。她父亲谢葆璋是海军官员。谢婉莹幼龄才几个月时，她母亲携同她去上海，那时，她父亲在上海任职。1903年，全家迁往烟台，谢葆璋在那里主办水师学堂。

谢冰莹幼年时在山东海滨度过，她在那里受到童年教育和大自然的美景给她的最初印象。她大部份时间都在家里，孤独无侣。家里的大人给她讲故事，教她读书，使她对中国古典文学有了热爱。她十岁时，她的堂舅充当她的老师。她读中国文学和古文，经常参加她父亲友辈的诗会。她在早年就开始写小说和韵文。辛亥革命时，她随父母回到福建祖父家里。她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了几个月，用了不少时间读了她祖父的藏书。

1913年，谢葆璋携家到北京，那年她未上学，在家里阅读她母亲常读的《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她从当代杂志文学栏中看到词这种体裁加深了她对诗的兴趣。她常利用她所阅读的书给放学回家的三个弟弟读讲故事，并用旧式体裁写过几篇小说，但未写完就住笔了。

1914年，谢婉莹进了美国公理会办的一所教会学校，贝满女子中学。后来她和母亲都成了基督教徒。该校的考试和课程都很严，因此她很少有时间阅读中国文学书籍了。

1918年她毕业后，进北京女子汇文大学，该校后来合并为燕京大学。她虽然个性娴静，但也还参加了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些学生活动，任本校女院学生会秘书，又被选为北京学生会宣传部主任。她的表兄刘芳园主编北京《晨报》文学副刊。那时，谢婉莹才正式开始用白话写作，有一篇文章得到该副刊的发表。她表兄不断给她鼓励，送给她一些如《新青年》、《新潮》、《改造》等新杂志。她从这些杂志以及当代的其它杂志中读到托尔斯泰、太戈尔、罗素、杜威等人作品的译文，她发现将严肃的哲理放进小说里是可以做到的。于是她又开始写小说了。

不久，她的短篇小说《两个家庭》，用冰心的笔名在文学副刊上发表。在这次成功的鼓舞下，她除了写短篇小说外，还写诗歌和散文，这些作品大都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冰心参加了1921年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社，她的一些早期的作品发表在《短篇小说杂志》上。二十年代初期，她虽然还是燕京大学

的一个学生，但已成了中国女作家的先驱者之一。她有两本诗集：《繁星》和《春水》，于1923年出版。这些抒情的、不押韵的、词藻优美的诗成为当时短诗的风尚。《春水》后来由她在燕京英语系的朋友包贵思译成英文，1929年在北京出版。她的《繁星》是仿太戈尔《飞鸟集》的笔法写的。1923年，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超人》，这显示了她青年时代作品中的高峰。她以清新出众的笔调，以温柔和同情的心情写出中国儿童的寂寞和中国青年的苦闷。

谢不久就收到当时受她感动和钦慕她的人的大量来信。她流畅的英语引起了来北京的一个美国访问者的注意。亨利·史汀生的妹妹、坎黛斯·史汀生想在中国物色一位有才能的青年妇女，送去韦尔斯利大学进行深造。谢婉莹于1923年在燕京获得学士学位后，8月，从上海趁杰克逊总统号邮船去美国。她进了韦尔斯利大学后，但因患肺病，在马萨诸塞州山区的一个疗养院治疗了六个月。在此期间，她写成了《致小读者》的一部份在《晨报》上连续刊载，全书在1926年出版。在这些书信中，谢婉莹显示了她那写作儿童文艺和描绘景色的才能。后来她回韦尔斯利大学，1926年获得硕士学位。

1926年夏，她回国后在燕京教文学，经常回上海探亲。1929年6月，谢在北京与在美国结识的吴文藻结婚。吴文藻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婚后不久，她久病的母亲去世，她回上海料理后事后，写了一篇散文《南归》，以怀念她的亡母。

谢婉莹继续在燕京教书，因为忙于操持家务，只翻译了一本吉勃兰的《先知》，1931年出版。她还写了几篇以成年人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成就不太大。1933年，吴文藻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1936年，谢婉莹和她丈夫一起去美国，代表燕京参加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庆祝会。以后又访问欧洲经苏联回国。1937年3月他们回到北平才一个星期，中日战争就爆发了。战争发生后，他们去华西，1938年8月到昆明，吴文藻为云南大学创办了社会学系。1940年到重庆，吴文藻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任职，谢婉莹断断续续地又写了一本《续寄小读者》。1943年，她以“南史”新笔名发表了一本散文集《关于女人》，用随笔的形式，描写了一些卓越的妇女。在战争期间，她是国民参政会的代表，经常和韦尔斯利大学的校友宋美龄有来

往。1946年春，她回北京住过一个短期即去东京。那时吴文藻是中国驻日代表团顾问。她每周在东京大学讲中国文学，也从事一些写作，她在韦尔斯利东京校友会中很活跃。

1951年底，谢和她丈夫回国。在他们抵达北京之前，他们的许多朋友都不知此事。谢婉莹当了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委员，并任对外文化协会和全国妇联常委，1954年、1959年，先后被选为福建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3年她是以丁西林为团长的中印友好协会访印代表团的团员之一。以后数年中，她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新德里、洛桑、东京、开罗、塔什干、莫斯科。1958年春，她参加由许涤新为团长的代表团去意大利、英国。她的活动很多，没有什么创作时间，但在五十年代出版了儿童小说《淘气的暑假日记》，和《印度童话集》。1964年在北京出版了她1959—1963年所写的散文《拾穗小札》。

谢在二十年代初期在国内享有盛名，她擅长描写母爱、青少年的欢乐和苦闷、大自然的美景。她后来的写作受西方文学和基督教的影响，使她的文学作品带有某种启蒙主义和摹拟神秘主义的色彩。因此，在三十年代中，她的作品被认为是逃避现实落后于时代。1932—1933年，她的最佳作品由北新书局选印为《冰心全集》三卷。又经巴金增订编选在1943年由开明书店在桂林出版，1947年再版。李希同收集了一些论冰心作品的文章，编成《论冰心》一书于1932年由北新书局出版。

谢婉莹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出生于1935年和1936年。她的儿子吴宗荪（音）生于1931年1月，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

熊佛西 别名：熊福熙

熊佛西（1900—1965.10.26），剧作家、教育家、批评家。首创“大众戏剧”以教育农民。

熊佛西生于江西丰城。辛亥革命时，他父亲携带他去汉口，他在那里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在学生时代他就显示了对戏剧的兴趣，常在学校的演出中担任

导演，扮演角色，并写过两个剧本于1919年出版。1919年到北京进燕京大学专修文学和教育。1921年，他与陈大白、茅盾、欧阳予倩组织了一个“民众戏剧社”。192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

此后，他去美国人研究院。1923—1926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戏剧，获得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美术学院戏剧系主任。他还在燕京讲课，在北京艺术学院戏剧系教书。1930年主编《戏剧与文艺》半月刊，发表剧本和关于话剧的文章和剧本。

1932年，熊佛西当了定县全国民众教育改进会所属的农村剧团团长。民教会的创办人是晏阳初，聘请熊佛西用话剧来教育华北民众。为此，这位剧作家前赴农村与农民一起生活，以便创作民众所能理解的戏剧。熊佛西因此而出名。根据他亲自的经验，写了一本《戏剧大众化的试验》（1937年）。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同民众教育改进会去汉口，以后又去长沙。该会被封后，熊佛西和他的剧团改称为“农民抗日剧团”去成都，给广大观众多次演出。由于他们的成功，省政府当局于1942年开办了省立四川戏剧学院，由熊佛西任院长。重庆当局，请他主持三民主义青年团主办的中央青年戏剧社。但熊佛西那时写了一本有关袁世凯的剧本却被禁演。日益严厉的审查制度使熊佛西很苦恼。他去桂林办了两种战时文学刊物《现代文学》、《文学创造》，写了一些长、短篇小说和游记。他的第一本小说《铁锚》于1946年出版，接着又写了一本《铁花》。1946年熊佛西回华东，当了上海戏剧实验学校校长。

1949年，熊佛西是参加全国文艺联合会成立大会的代表之一。1949年以后，他一直在这个团体中居重要地位，1953年、1960年两次当选全国文联委员。他是全国戏剧家协会常委，1949—1954年，任华东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1955年在上海任中央戏剧院华东分院院长。他又代表全国文联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65年10月25日在上海去世。

熊佛西以大众戏剧的剧作家而知名，这是与一般的文艺戏剧有所区别的，后者则以洪深、田汉为代表。在他的上演作品中，熊佛西经常试用西方手法和注重舞台效果。他长于喜剧、常带用一些讽刺手法满足未受过教育的群众的爱

好。熊佛西的不少剧本最先在《晨报》文学副刊、《东方杂志》和《戏剧与文学》上发表。1930—1932年由商务印书馆编印为四卷出版。他还出版了关于戏剧的短文《佛西论剧》和关于戏剧理论的《戏剧原理》。

他和叶子结婚，她是国立戏剧学院的毕业生，在成都省立四川戏剧学院工作，那时，熊佛西是该院院长。

熊希龄 字：秉三

熊希龄（1870—1942），政府官员，1913—1914年曾任所谓“名流内阁”总理，他在1914年几乎退出了社会活动。他后来以办理慈善事业知名。

熊希龄，湖南凤凰县人，其父任总兵武职。他读书颖悟，二十四岁时中进士。他娶本县知县朱其懿的妹妹朱其慧，朱其懿对他很赏识，在那时就称他为“湖南神童”。熊希龄的妻子也很有才干，对她丈夫的事业极有帮助。

1894年熊在翰林院任职三年，从此进入了北京政界。他多次上书反对甲午战争后与日本媾和，因此被撤职回到湖南。他在南学会和时务学堂和维新派领袖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共事。百日维新失败后，熊希龄被罢黜，永禁录用，但不久得到继任湖南巡抚的端方和赵尔巽的赏识，因此熊希龄又登上仕途，任江苏道台。

1905年，熊希龄随同他的恩主端方去欧美考察宪政。此行对清政府的改革虽无收获，但对熊希龄来说，却开拓了他的仕进之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为清廷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的载泽所赏识，派他任奉天财政使、盐运使。这些都是生财有道的职务，使熊希龄熟知财政内幕。

熊希龄虽然与清廷公私方面都有联系，但民国一成立后，他的政治地位不但能保持住并有所提高，1912年3月，在进步党唐绍仪的内阁中任财政总长。三个月后唐绍仪辞职，他随同辞职，立刻又被任为热河都统。热河行宫珍宝被盗，这是一件终生与熊希龄有关的丑闻。虽然一般认为熊希龄犯有共谋之罪，但此案始终未破，官方对熊希龄亦未采取行动。当袁世凯需要任命一位能干而

又顺从的总理时，此事本身给袁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人相信，熊的卷入，不管其真相究竟如何，使他在数月后取得了国务总理的职位。1913年夏末，袁世凯将其注意力转向压制国民党并解散国会，那时进步党于宋教仁被刺及国民党分裂后在国会中占有控制席位。熊希龄一向倾向于改良思想，又是进步党首领人物，并且是反袁中心的湖南人，于是成为国务总理一职的当然人选。袁世凯于7月末向国会推荐，7月31日得到两院通过，熊即就职。

熊希龄的被任命，有点出于袁世凯的意料，他认为他推荐的第一人选也许不会得到同意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中间派全都反对袁世凯物色的第二号人选，北洋派的徐世昌，所以和进步党合作支持熊希龄。国会的同意，也使熊希龄感到意外，所以他迟疑不敢接受，后经梁启超的一再催促于8月28日才来北京。

进步党要求一个清一色的进步党内阁，袁世凯则坚持所有重要阁员须由他自己挑选，因此内阁拖延了约两个星期才组成。但熊希龄决定尽他所能组成一个最好的内阁，首先是以非进步党人的梁启超为财政总长。熊希龄认为袁世凯的那个名单“第二流人才”居多。几经协商，熊希龄于9月11日组成了一个他所说的“名流内阁”。梁启超任司法总长，张謇任农商总长，孙宝琦任外交总长，朱启钤任内政总长。熊希龄任总理兼财政总长。

“名流内阁”的组成，不仅标志着熊希龄政治生活中的顶峰，而且也是民国初期责任内阁制的结束。熊希龄能言善道，他给当代人的印象是诚心诚意的维护议会制。他提出取消厘金，实行所得税，统一币制、平衡国家预算等财政改革。但是，11月4日，袁世凯下了一道有熊希龄签署的命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它在国会中的议席。结果，有四百三十八名直接或间接与国民党有关的议员被取消资格。11月5日，两院都不足法定人数，1914年1月10日，国会解散。此事发生前不久，熊希龄曾写过两封长信答复两院留下来的代表的质询，他说袁世凯强行解散国会是由于事态紧急，因此不能受正常议会程序的约束，熊希龄的“名流内阁”并未因同意解散国会而得到好处。经常的财政困难、湖南北洋军队的分裂和大一统计划受人嘲讽，此内阁于1914年2月以梁启超等人的辞职而倒台。

熊希龄放弃总理之职后，任全国煤油督办兼水利局总裁。1915年，袁世凯委任他当湘西宣慰使，希望他的声望能为袁世凯的帝制争得支持。1917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熊任平政院长。1919年，他和张謇、蔡元培等人促进上海和谈，结果是全盘失败。也许是由于1919年上海和谈以及他1913—1914年任内阁总理时曾设想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失败经验，熊希龄在二十年代里致力于联省自治运动，熊希龄最后的一次重要政治职务，是出席1932年在洛阳召开的为了应付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的全国国难会议。他还参加一个上海代表团去敦促张学良抵抗日军的侵略。

1914年后，熊希龄在中国政治上不再有什么重要性了。他的政治地位虽日见衰退，但作为慈善家、救济家的声誉日益增高。1917年他以主持河北大水灾后的救济事宜而享有盛名。1918年设立了收养孤儿的慈幼院，该院一度曾由著名天主教徒英敛之主持。这个孤儿院在北京西山，很有名望。熊希龄后来参加不少慈善组织，1929年任全国赈务委员会理事。他的慈善事业既对公众也对个人。譬如他在1931年出款为他的旧上司载泽办理丧葬，并抚恤他的家庭。

1935年，他鳏居数年后又和毛彦文结婚。她是金陵大学青年美貌的毕业生，后来在慈幼院协助他工作。熊希龄和一名年龄只有他一半的女子结婚，这件事当时引起不少议论，熊对此毫不在意，甚至还应新娘之请，剃去了蓄留了二十年的胡须。第二次婚姻和第一次婚姻一样美满。1937年，他从上海迁居香港，1942年，日军占领香港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寡妻于1950年后住在台湾。

熊希龄的元配有三个孩子。他儿子自幼瘫痪，早死。长女是林居（音）的妻子，是有名的教育家，在台北任台湾女子师范学院院长。第三个女儿熊露西，战前在北京很出名，1949年后仍在国内。

他的亲戚朱经农写过一篇熊希龄的传记，在1947年1月号《东方杂志》上发表。

熊克武 字：锦帆

熊克武（1881——），反满革命家，四川军界前辈，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的少数现役军人之一。他后任中央监察委员，政府委员。1950—1954年他在北京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熊克武四川井研县人，他的家庭和幼年情况不详。早年在四川上学，后去日本进士官学校，加入同盟会，参加其活动。

1906年，他在日本完成军事学业后，1907年初回四川，那一年全国各地发生反满事件，熊曾在四川叙州领导过一次反满起义，失败后逃走。据称他曾参加1911年的广州起义，即由黄兴领导的3月29日起义。

1912年民国成立，熊克武回四川统率驻防重庆的一个师。1913年8月，他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他计划率军沿江而下，与从湖南北上的革命军会合。但因袁军处于优势，熊克武军于9月初在重庆被击败。

熊克武是在二次革命后去日本流亡的一人。当时孙逸仙制订一个改组国民党的计划，要求党员宣誓服从党的领袖。熊克武和许多党员坚决反对这个决定。1914年欧战爆发，熊克武和其他领导人组织了一个“欧事研究会”。

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明显，不少在国外的革命首领回到各自的家乡发动武装起义。1915年10月，熊克武离日本。他到上海后，又去香港偕同李烈钧去云南，与唐继尧、蔡锷联合再进行一次新的反袁运动。1916年，反袁军由云南出发，熊克武随同蔡锷的军队进入四川。他重整在叙州的旧部五千多人。川军师长刘存厚倒向革命方面，袁世凯军失败，四川督军陈宦宣布独立以求停战。

反袁运动很快结束，1916年6月袁死于北京。四川地方军改编为五个师，熊克武任第一师师长，驻重庆，任镇守使。1917年，川军与云贵军多次发生冲突，川军虽自称获胜，但并未能将云贵军逐出四川。熊在冲突中保持中立，由于他的坐镇，重庆得以免战祸。

北京的北方政府和广州的军政府都争取川军首领的支持，因为四川资源丰富，地位重要。刘存厚于1917年拥有川军一个师的兵力，支持北方政府，北方政府任他为四川督军。北方政府虽然也任命熊克武为川边镇守使，但他仍效忠南方政府。1918年，他驱逐了刘存厚而任四川督军。

熊克武希望给他本省带来安定。但唐继尧却想控制四川作为他称霸西南计

划中的一部分。唐控制了云贵两省，并在四川驻有军队。四川民众对云南军的侵入极为憎怨。1920年5月，熊克武率领四川各军队首领要求云贵军队撤走。战争爆发，云贵军终于撤离四川。1920年12月，川军首领宣布四川独立自主，12月31日，熊克武实现他在率领川军驱逐云贵军时所作的诺言，辞去四川督军职务。

在一次善后会议上，刘湘被选为川军的总司令，及全省行政长官。刘湘重申四川的自治，拒绝北方政府的命令或委派官吏。1921年刘湘采取行动反对熊克武，熊逃出四川。刘湘接着就在四川建立他个人的最高权威，结果引起了四川省不断的内战。

在熊克武1921年离川到1923年回川这一段时间里，关于他的活动情况不详。1923年5月，他率军占领成都。6月，孙逸仙任命他为四川省讨贼军总司令。当时，杨森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在四川掌权。10月，熊克武占重庆，但在12月中旬又被杨森夺回。1924年2月，杨森追击熊克武将他逐出成都。刘湘和杨森联合驱逐熊克武，熊被迫率部撤到贵州。

熊克武因为支持国民政府，受到国民党的奖励。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熊为当选为二十四名中央执行委员的极少数的军人之一。孙逸仙准备进行他延搁已久的北伐，几个省的革命军队正在广州集中。熊克武准备把他的军队从贵州经湖南调到广州。当1925年他的军队到湖南时，湖南省长赵恒惕令他立刻撤离湖南。熊克武又为他的有分歧意见的队伍所困扰，而和他一起从四川出来的贺龙又脱离了他。

熊克武带着川军残部到达广州。他于1925年10月3日到达，立即为蒋介石逮捕，说他与仍在粤东的陈炯明合作。熊被囚于虎门要塞，他的部队解散。熊被监禁达二年之久。

1927年9月，熊克武被选为四十七名国民政府委员之一。1931年，胡汉民被蒋介石监禁时，熊克武在广州参加了由广州领导人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成立了一个反南京的政府。南京、广州的纠纷解决后，1932年熊克武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虽继续担任政府委员，但是实际上并未参加政治活动，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上海。

1934年后,他在香港也有了一个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被选为中央监委,这表示他已被列为国民党元老了。抗战期间,熊克武住在四川。1945年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再次当选为中央监委。1946年他是出席南京国民大会的一名代表。

1949年12月,中国共产党席卷大部分中国向四川进军,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公开声明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这是西南地区的主要政机构,他任此职一直到1954年该机构撤消为止。他原来不是政协委员,但被任为第一届全国委员。1954年和1958年他两次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12月,被选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熊式辉 字:天翼

熊式辉(1894——),在北伐战争时是蒋介石部下的一名军官。1931—1941年任江西省主席,1942—1943年任访美军事代表团团长。1945—1947年任东北行营主任。去台湾之前,他曾在香港、澳门、曼谷居住,1954年去台湾。

熊式辉生在江西安义县的一个农村,他家七个孩子,熊式辉行六。他父亲在军界很活跃,在本乡团练中当教官。熊式辉早年在本村私塾上学。1908年,他父亲把他送到江西陆军小学,1911年春,转入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大约在此时,他秘密加入了同盟会。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熊式辉加入了革命军,冯国璋打败了革命军,熊式辉于12月回南京。他后来在江苏都督程德全部下任参谋。

1913年春,熊辞职去北方,进清河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后又进保定军官学校二期,1915年夏毕业。12月,蔡锷等人起兵反对袁世凯,熊式辉到李烈钧第二军第四师三十八团当主任参谋。后来在国民党军队中不少有名的军官,如张治中、朱培德、王均,都出身于第四师。

1920年春,熊式辉、朱培德和第四师的一些军官,拥护李烈钧从李根源手中夺取在广东的滇军的控制权。此举未能成功,熊式辉去东京,1920年进日本

士官学校学习。1924年毕业后回广州，孙逸仙正在那里试图巩固革命据点。熊式辉在滇军军官学校当主任教官，该校属朱培德的第三军管辖。

1926年6月，北伐誓师后，派熊式辉去劝说赣军第四师师长赖世璜归顺革命军。赖是他的朋友，他们在8月初在瑞金会面。他通过赖世璜经常得到孙传芳的作战方案。他把这些情报经由何应钦转给蒋介石。8月中旬，赖世璜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军长，熊式辉任该军党代表。

1926年9月，第十四军开始进攻江西督办邓如琢，9月6日攻占赣州，在广州的李济琛、何应钦令赖守卫赣州，熊式辉则率领两个团北去与第二军第五师会合，向北推进支持了国民革命军对南昌的包围。熊式辉的部队从赣南及时赶到，参加了这次战役。南昌于1926年11月8日攻克。

11月底，国民革命军成立了江西省政府委员会，熊式辉任省政府委员。同时，何应钦进军福建，11月攻占漳州、泉州，赖世璜奉命调往该线。12月初，何应钦攻占福州，赖世璜第十四军又调往赣东，准备进攻浙江。熊式辉任第十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该军党代表。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巩固了沪宁地区的控制后，熊式辉部驻防江阴。5月，第十四军作为何应钦所指挥的一部分，继续向北进军，熊式辉师渡江北上准备进攻山东。但武汉政府的唐生智进攻南京的消息使白崇禧下令全面撤退。熊式辉于1927年8月撤到扬州，担任江阴、无锡守卫。

1927年8月底，直鲁联军和国民革命军在龙潭激战，第十四军奉令从江阴出发，切断敌军后路，赖世璜贻误戎机，国民革命军虽然在龙潭一战中获胜，赖世璜以玩忽职守，于12月31日被枪决。第十四军改编为第十三军，熊式辉任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该师改称为第三十七师。

1928年1月，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白崇禧，正在开始肃清唐生智在湖南残部的战斗，熊式辉在上海代理淞沪警备司令。1928年初制订出北伐最后阶段方案时，熊式辉的第三十七师派作蒋介石第一集团军的预备队。1928年4月1日，熊式辉将淞沪警备部队交由钱大钧指挥。

国民革命军进军山东时，日军阻其北上，发生了1928年5月的济南事件。蒋介石派熊式辉、罗家伦与日方会商以求和平解决。日方以这两人的官阶太低

为借口拒不接见，乃由何成浚主持谈判，熊式辉回南京。1928年中，北伐战争胜利结束，10月，熊式辉再任淞沪警备司令。

在1929年部队重新部署时，熊式辉任第八军军长，该军不久又整编为第五师。1930年5月，国民党军开始了所谓“剿匪”，进袭农村中的红军，熊式辉任苏、浙、皖地区的指挥。12月，蒋介石召他去南昌谘询，飞机在离上海时失事，熊式辉脚部受伤，数月后才伤愈。1931年6月，他终于到了南昌，蒋介石任他为战地司令部参谋长。他以此职务参加了1931年对共产党的围剿。

1931年12月，熊式辉任江西省政府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在瑞金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以江西中、南部为根据地。熊式辉负责管理江西的民政、教育和治安，并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主任，1933年5月，兼任南昌行营主任。1933年和1934年间，熊式辉和杨永泰是南昌行营最有权势的人。杨永泰由熊式辉向蒋介石推荐为行营秘书长，行营是党、政、军大权中心，其权力不仅及于江西，并包括河南、湖北、安徽。熊、杨积极推行新生活运动。这两人被称为政学系台柱，该系还有一些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在国民政府中影响很大的高级官员。

国民党的“围剿”使共产党于1934年秋撤出赣南根据地，熊式辉在江西得有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他与南京国民党最高当局一直保持良好关系，1935年11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熊式辉向蒋介石建议，把在4月从苏联回来的儿子蒋经国派到江西到他手下工作，蒋介石同意后，1938年1月，蒋经国去南昌。日军沿长江流域推进后，熊式辉于1939年春把省政府迁到泰和。

熊式辉在家乡当了十年左右的省主席，1941年12月美国参战后才调任新职。熊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1942年3月，任访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在他的任命发表后不久，他公开警告参战各盟国勿轻视日本的军事力量，并预言日本将进攻苏联。然后，他飞往华盛顿，他在那里争取美国尽可能的大量援助。

中国在华盛顿的军事代表团没有资格出席战争初期战略会议绝密的内部各项会议，美国也不能满足中国所要求的军事物资数量。1942年七月，中日战争五周年之际，熊式辉在纽约作了一次演说，埋怨美国未能信守对中国的诺言，

声称自珍珠港事变后，盟军的一系列失利，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最严重的危机”，他又说，中国仍希望美国能给以大量援助。他警告说，倘若中国被战败，那日本可以长期作战达百年之久。中国对以欧洲战场为主的战略方针表示不满，1942年底，熊式辉及代表团被召回重庆。1942年12月31日，熊在离美之前，会见了罗斯福总统。1943年4月回到中国，途中曾在伦敦停留，声称是为了了解战局。

1943年8月，熊担任战时和战后建设的中央设计委员会秘书长。1945年夏，他随同宋子文去莫斯科谈判，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5年8月31日，熊式辉又被授以新任。国民政府宣称，恢复东北统治，准备成立军委会东北行营，以熊式辉为主任，不久又兼任行营政务委员会主席。熊之所以被任这个显然是远东力量争夺的关键最高军政要职，这可能与他和蒋介石及何应钦的亲密关系有很大关系。张嘉璈负责东北的经济，蒋经国任东北特别外交专员。还有一大批熊式辉的人在东北担任各项职务。

熊式辉到长春就职，那里是满洲国的首都，曾改称为新京。其他国民党官员也在那里聚集，计划重新确立国民党在该地区的统治。熊首先与1945年进入东北的苏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取得联系。熊式辉对马林诺夫斯基说，美国海军准备运输国民党军队到大连。10月6日，苏联驻重庆大使通知国民党外交部说明苏联政府反对此项计划。熊式辉和马林诺夫斯基对此发生了争执，并就另选一处供国民党军队登陆之南满港这一问题作过多次无成效的努力。熊式辉于是要求使用东北大都市的飞机场设备，由美国军用飞机运输国民党军队和文职官员。马林诺夫斯基又加以反对。1945年10月及11月初，中国共产党军队自日本投降后迅速从华北调入满洲，占领了长春飞机场及长春。

中国共产党在长春成立了地方政府，在国民党总部所在的南满铁路局大楼监禁了约五百名长春的国民党官员。马林诺夫斯基的部队对受包围的国民党军并未加以协助。1945年11月9日，熊式辉飞往南京，报告东北的紧急局势。国民政府下令长春国民党官员撤到北平，他们在11月17日飞离长春。蒋经国和其他少数官员稍作停留，以保持和马林诺夫斯基司令部的联系。

1946—1947年，东北是国、共双方的主要战场。国民党军队开头虽取得一

些胜利，1947年5、6月间，林彪率领的共产党部队发动反攻，取得了主动权。7月，南京国民政府发布总动员令。8月底，蒋介石被迫改组东北的军政机构，调参谋总长陈诚为东北行营主任和政务委员。1947年秋，熊式辉在南京担任了战略顾问这样一个闲职。

1949年，国民党势力在大陆崩溃后，熊式辉并未随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去台湾。他在香港、澳门居留了一些时间。他认为小小的葡萄牙属地澳门会象在第二次大战时那样得免于战火。他安然在那里居住，并与该地的一些葡萄牙官员交往。五十年代初的一次边界事件，使熊受到震惊而认识到澳门也不是象他所想的那样一个安全退隐之地，于是他迁往曼谷。他在那里据说经营纺织业，经济上蒙受极大损失。1954年，他迁往台湾，在台中过隐居生活。

熊十力

熊十力（1885——），哲学家，如他最主要的著作《新唯识论》所表明的那样，熊的体系综合了陆、王理学和大乘佛教唯识派的思想。

熊十力湖北黄冈人，兄弟六人，行三，只有他和他的大哥读过一点书。幼年时，母亲去世，父亲熊启祥是一名笃守程朱理学的穷儒生。熊十力童年时为邻家放牛。他十岁时，患肺病的父亲为生计所迫设馆招收学生，因此熊十力学会了读书写字。他记忆力极强，一天之内就能背诵《三字经》。以后他父亲教他读儒家的经书。约在1896年，他父亲去世。临死前熊父对熊十力说，由于他体弱多病，命里注定不能上学读书，最好还是去学裁缝。熊十力对他父亲发誓一定要排除万难继续读书。他的哥哥熊中孚上学到十五岁，下地干活时常带着书阅读，熊十力就仿效他哥哥的样子。他的正规学习，只是跟塾师吴某读了几个月书。他从邻县的举人那里借了一些有关科学和时务的书来读。他还读了一些当时维亲派的文章和条陈以及王夫之、顾炎武的著作，这些人的爱国精神使他们的著作在清朝倒台前一二十年中流传甚广。

1902年，熊十力十八岁时，和其他的同县两个青年——王翰和何祖新——

来到武昌，想从政治上找出路。王、何二人加入了“科学补习会”这个革命团体，熊十力则去投军。王翰因行刺度支大臣铁良失败，在河南彰德自杀。当年，熊十力和何祖新又参加了另一个革命团体。这个团体以武昌圣公会阅览室为聚会地点。熊十力进了一个陆军特别学校，1906年他帮助组织十个军事学习小组，掩护其反清活动。熊十力在军队中的煽动活动引起了驻防军统制张彪的注意，乃逃离武昌。他回到家乡，见到他的兄弟辈生活极端贫困。他们听说南浔铁路将即开工，此路的中段德安县有荒地可以申请，弟兄几人决定去垦荒，试试他们的运气。

辛亥革命爆发，黄冈被革命军占领，熊十力在当地军政府中任参谋。袁世凯于1912年任临时大总统，开始对湖北国民党员进行迫害，熊十力暂时退出政界。袁世凯死后，熊十力在随后的段祺瑞的北京政府和孙逸仙的广州政府的斗争中加入南军，并参加了1917—1918年广西军队向湖南进军。此后他住在广州，决心从事学术研究。那时，他的长兄和两个幼弟都相继贫病而死。他想从佛教里找寻安慰，随欧阳竟无学佛一年多，欧阳是中国佛教协会和南京内典学院的创始人。他研究大乘佛教的唯识论。但他不久就对佛家思想感到不满，开始想要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

1922年，熊十力受聘去北京大学教书，讲授他的“新唯识论”，成为梁漱溟、林载平的好友。三十年代初，熊十力患病去杭州养病，1935年病愈回北京大学。

1938年春，中日战争爆发，熊十力去四川璧山。1939年夏，他受聘到乐山复兴书院讲学。在一次空袭中，他的文稿被毁，本人受伤。他因病缩短了聘期，1939年秋回璧山。不久，去北涪住在他朋友梁漱溟所办的勉仁书院。

1944年，他得到居正、陶希圣、陶钧之助，在北涪办了一个中国哲学研究所，居正任董事长，熊十力任所长。该所所址是北涪区长所捐赠。居正的儿子居浩然是该所唯一的学生。熊十力写成了《读经释要》。1945年，他在黄海化工研究协会短期讲学，以后回到湖北。1948年，他在浙江大学任教一学期。他在1949年春去广州，年底又回湖北。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在北京大学教书。1956年，熊十力出版《原儒》两卷，论述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

熊十力的主要著作《新唯识论》是1923年用文言文写的。经过多次修订，在1932年由个人出版。1938年春初，经钱学熙、韩郁文协助，改写成白话文，分三卷在1940、1941、1944年出版。熊十力的论点，认为实在的不断变化是由于“原物”的“开”与“合”。当其“合”，则显出了原物的本象，可以暂称之为心；所谓心，是“原有心”的一部分，其各种现象即是心、意、识等。熊十力的著作综合了易经、陆、王理学和大乘唯识论的成份。

熊十力的书信、讲稿、言论由他的朋友和学生选编为四卷，在1935年和1947年出版。《十力语要》包括了熊十力关于历史、政治、人物等各方面的论述，续编在1949年出版。熊十力的其它作品还有《佛家名相通释》等著作。

熊十力的哲学思想，反映了1949年以前近代中国的两种重要思想趋向：佛家唯心论学说和理学的恢复及新释。即使在新的共产主义正统思想下，熊十力也不肯改变他的哲学思想。他有关儒家的重要著作于1956年出版，其中甚至连一句赞扬马列主义的话也没有提到。

徐 谦 字：季龙 西名：乔治

徐谦（1871.6.26—1940.9.26），学者，法学家，1907年参预司法改良工作，1926—1927年武汉政府中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徐谦原籍安徽歙县，出生在江西南昌。他有一个兄弟名徐逊，字辅仁（音）。徐谦四岁丧父，他母亲在艰难困苦中把两个儿子抚育成人。徐一方面准备应科举，一方面教馆维持家庭生活。1902年去南京应试中举人，1904年中进士，殿试列为二甲第八名。他去北京进译学馆学习一年，1905年译学馆与京师大学堂合并成为进士馆，徐谦在该馆学法律和政治。进士馆即后来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前身。

1907年，徐谦任翰林院编修，后任清政府法部参事，主持制订法律，并拟订司法制度改革条例，经清政府批准施行。条例规定四级法院制，起诉程序，法律费用之规定，民事、刑事案件，起诉书格式，和检察官的任用，为中国的

司法独立打下了基础。

1908年任京师地方审判厅厅长。一年之中，他处理了一千多件积案，这大部分是由于官吏索贿而积压下来的。徐谦的果断措施博得公众赞誉，即任命为京师高等审判厅检察长。1910年，他和许世英代表中国去华盛顿出席改良监狱的第八届国际会议。他们去美国途中，也到莫斯科、柏林、罗马、巴黎、伦敦考察外国的司法制度。

1911年武昌起义后徐谦回国。他立即辞职，要求清室退位。他和他兄弟协助在天津组织“国民共进会”，主张在中国成立联邦共和国，立法、司法集中于中央，行政则分散于地方。这个计划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到1917年，联邦制度才得到一些政界、知识界的支持；徐谦的《共和联邦折中制商榷书》，后由戴季陶重印载入其《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一书中。

尽管徐谦主张民国共和，清政府为了企图苟延残喘，仍于1911年底任命徐谦为大理院院长，徐加以拒绝。1912年3月，徐在民国第一任唐绍仪内阁中任司法次长。1912年唐绍仪因与袁世凯对总统在宪法规定中职权意见不合而辞职，徐谦亦随同辞职。1912年8月，国民共进会和其他党派与同盟会合并而成为国民党，徐被选为该党议员。他又去上海投奔孙逸仙，那时孙任全国铁路总办。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徐谦留在上海当了三年律师。

徐逊见其兄自二次革命失败后灰心丧气，劝他人基督教以求得安慰。徐谦曾发誓说，他祷告袁世凯之死，如一旦实现，他就加入基督教。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徐谦入基督教圣公会。此后，他强调他之所以皈依基督教是为了救中国。

1916年徐谦回北京，再任司法次长。当时北京政府由内阁总理段祺瑞控制，段和总统黎元洪的关系很不融洽，他们两人对中国参加欧战问题有巨大分歧。1917年5月，黎元洪解除段祺瑞总理职务，支持段祺瑞的北洋军阀迫黎元洪于5月29日解散国会。徐谦劝阻黎元洪不要颁布这个解散令，并请代总理王正廷不要在解散国会命令上副署。黎拒不听从，徐谦辞去阁员职务去上海。

以前徐谦在北京时，基督教、天主教组织了一个宗教自由总会，争取在宪法中载入信教自由的条文。该会选徐谦为会长，基督教与天主教分别以诚静

怡、马良为首，后来以孙绳武为首的伊斯兰教徒也加入了，佛教和道教组织也都声明支持。宗教团体这次前所未有的团结，终于在宪法中载入了信教自由的条文。1918年，美国教会发起，中、外基督教徒在牯岭联合开会，徐谦提议建立基督教救国协会。提议通过，选徐谦负责领导基督徒救国运动。

自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加强了他在华北的政治地位，宣称要召开临时参议会制订宪法，成立新国会。孙逸仙斥责他违反宪法，于1917年9月在广州组成军政府自任大元帅，以徐谦为其秘书长。

1918年春，大元帅府取消，广州政府由七总裁负责。孙逸仙拒绝加入，派徐谦作代表，本人则于5月去上海。徐谦的使命是帮助维持陈炯明的部队，这是广东支持孙逸仙唯一的武力，以及在关于宪法的问题上反对和北京政府妥协。1918年9月，广州政府任命徐谦为司法部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徐谦、邹鲁、林森提议孙逸仙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孙拒绝此意见，因为他认为欧洲列强只承认北京政府，而他不能当这个政府的发言人。1919年1月，徐谦去上海会见孙逸仙，孙同意让徐谦、陈友仁以非官方的观察员身份出席巴黎和会。由于不同意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置，徐是反对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人之一。

徐谦回国后未到广州，因岑春煊在那里掌权。他去北方当京津天主教的《益世报》主编，1920年5月辞职。9月，冯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由湖南入豫南，孙逸仙派徐谦、钮永建去汉口和冯玉祥会商。据冯玉祥称，此次会见使他很赞成孙逸仙的主张，此后，徐谦经常充当孙、冯之间的中介人。1920年11月，岑春煊被逐出广州政府，徐谦才回广州，再任司法部长。1921年5月，军政府解散，孙逸仙任广州政府临时大总统，徐谦任最高法院院长。

1922年8月，陈炯明叛变，孙逸仙被迫离广州去上海，派徐谦到河南去见吴佩孚，可能是为了与吴取得政治上的和解，那时吴佩孚是北方军界的显赫人物。此行使徐谦被任为北京政府王宠惠的所谓“好人内阁”中的司法总长。但在总统黎元洪逮捕财政总长罗文翰后，王宠惠和徐谦在1922年都辞职了。

1923年1月，孙逸仙回广州，2月底，派徐谦、胡汉民、汪精卫、孙洪伊去上海筹备和平统一中国的问题，结果失败。徐谦于1923年夏回广州，在岭南大

学教中国文学。

1924年徐谦到上海创办《评议日报》和法政大学。9月，吴佩孚、张作霖之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在紧急关头，吴佩孚的部下冯玉祥倒戈，从前线调回部队，于10月23、24日占领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聘徐谦到北京当顾问。据一些人说，此次事变乃由徐谦鼓动，徐谦在北京的正式职务是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校长。

徐谦在北京积极支持孙逸仙联共主张，促使国共之间和中苏之间维持友好关系。从1924年10月到1926年4月间，北京在冯玉祥控制之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活动发展很快。1925年“五卅”事件后，上海英警枪杀中国学生，反帝运动席卷全国。徐谦趁此机会，在北京国民军司令部中成立一个政治处，对冯玉祥的部下传播国民党的主张。1925年7月，徐任国民党北京分部主任，并被选为广州政府十六人政府委员之一。北京政府任他为中俄大学校长，该大学是与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合并而成，又任中俄庚款委员会主席。1926年1月，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徐谦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在256票中以224票获选。

3月8日的大沽口事件和3月18日北京有四十多人被杀害的示威游行，段祺瑞下令逮捕四名主要国民党人物：徐谦、李石曾、顾孟余、易培基，和共产党首领李大钊，说他们是3月18日示威游行的策划者并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徐谦得到国民军京畿卫戍司令鹿钟麟的保护，据张一麟说，徐谦恰在张作霖军进北京之前去张家口了。他应冯玉祥之请去库伦，冯玉祥自3月底就已在那里了。又说，徐谦与陈友仁、顾孟余、苏联顾问鲍罗庭等人，早已于4月3日经张家口到库伦了。不管怎样，徐谦与冯玉祥留在库伦，而鲍罗庭则经海参威去广州。据冯玉祥自述，他和徐谦详谈后，决定参加国民党。

冯、徐到了莫斯科，并与许多俄国领导人会见。徐谦听说北伐已开始，便于1926年7月15日离莫斯科。他回到广州，正式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和司法部长的职务。冯玉祥于8月中旬离开莫斯科，他到绥远后，宣布参加北伐。徐充当了冯从国民政府中取得国民军的军费的中介人。

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10月攻下武昌，11月攻下南昌。当时蒋介石任国民革

命军总司令，建议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长江流域。1926年11月28日，徐谦、宋庆龄、鲍罗庭离广州去南昌和蒋介石商谈此问题。徐谦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国民党左翼分子，国民党那时仍实行联共。他们与蒋介石在南昌商议后，徐谦等人去汉口，1926年12月13日，国民党左翼人物举行会议。徐谦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合会议的主席，这是武汉中央政府成立前最高的党政机构。

联合会议使国民党左、右翼的分裂加据。武昌、南昌双方经过长期争执后，1927年3月10日到17日在汉口召开第二届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徐谦、汪精卫（缺席）、谭延闿、孙科、宋子文被选为二十八名政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徐谦又被选入国民党政治会议九人常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十五人主席团。会议后，在武汉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总部和国民政府。

这时候，徐谦的权势达到高峰。但是，武汉并不能控制全部的国民党的活动，无论从军事上和财政上说都没有蒋介石的势力大。共产党在武汉的内部事务中也是一个分裂的因素。4月初，汪精卫从欧洲回国，与陈独秀在上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国共合作，然后汪到了武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他控制的地区里实行清共，徐谦与武汉政府的另一些成员被列入共产党员或其同路人“通缉”的名单之中。

徐谦之所以在武汉居于重要地位，部分是由于他与冯玉祥的亲密关系。冯玉祥在国民党两派之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冯军控制豫北。自1927年6月10日到13日，一个武汉代表团、其中包括徐谦和国民党军政首领、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与冯玉祥在郑州会谈。武汉首领们决定从河南撤走部队，并任冯玉祥为河南省主席以换取冯的支持。

徐谦未随代表团回武汉。他表面上说是因身任国民党开封政治会议分会委员而留在河南，但显然是对武汉当时情况感到不满，并为那里的社会秩序恶化向冯玉祥诉苦，徐对冯玉祥支持蒋介石的决定可能是有影响的。1927年7月8日，冯玉祥在他控制的区域里清共，并清除了从武汉派去的政治工作人员，一周后，汪精卫和武汉政府与共产党破裂，为国民党内部和解提供了先决条件。

徐谦同时受到国民党、共产党的反对，两者都责备他出卖了它们。1927年

9月徐谦去上海，11月17日他公开声明退出政治活动。他在上海居留了一段时间后，迁往香港，定居九龙。

1933年，陈铭枢等国民党首要人物反对蒋介石，劝徐谦参加他们在福建成立政府的计划。1933年11月10日，徐谦参加了在福州的会议，该会否认了国民政府的权力而建立一个所谓人民政府，徐被选为政府委员。11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通电，认为徐谦和黄琪翔是这次活动的魁首。1934年1月，福建政府垮台，徐谦又回到香港。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发生后，徐谦到南京，在国防委员会担任了一个闲职。1939年10月，他飞往香港接受手术治疗，1940年9月26日死在香港。

徐谦的著作有：《诗词学》、《刑法丛编》、《笔法谈微》、《劳资合一》。他的诗集《徐季龙先生遗诗》，乃他的寡妻于1943年私人刊印的。徐谦还以书法和勤于写信而闻名

徐谦曾结过两次婚。原妻俞氏，山东籍，死于1920年，继室沈仪彬、浙江绍兴人。徐谦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

徐志摩 原名：徐樨森 字：志摩 又申 别名：徐章垻
笔名：南湖 诗哲

徐志摩（1896—1931.11.19），诗人。他对诗在形式、节奏、主题方面的试验和他的文章，扩大了中国对西方诗歌的理解及认识，发挥了现代中国语言的潜力。

徐志摩浙江硖石人，他父亲徐新龢（音）是有地位的银行家，是著名的实业家张謇的朋友。幼年受旧式教育后，去上海进西式学堂。1916年秋进北京大学。他那时的抱负是想做中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甚至一度起了汉密尔顿这个外国名字。

1918年夏毕业后，他去美国深造。在旅途中，他给他父母写了一篇古体长篇誓言，要毕生效力于祖国的幸福。他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学经济学与社会学，后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他感到美国的生活对他的性

格不合，于1920年去英国。

徐志摩在英国进了剑桥大学，这对他有很大影响。他从斯温伯恩的作品中吸取了头韵节奏印象主义的风格。他又从布卢姆伯里派取得诗歌形象使用的想法。他还会见了曼斯菲尔等人。不久他就开始写诗，决定从事文学。

徐于1922年10月回国到北京。他用白话写诗、写文章。由于他的旧学很有根基，深受梁启超的赏识。他结识了当时不少文化界名人。1924年，他在北京大学教文学。那一年太戈尔访华，这使徐志摩在文学上又有新的发展。徐志摩作为这个印度杰出诗人和哲学家的翻译，陪同他到全国各地讲演，并去日本作短期访问。他将泰戈尔的语言译成汉语，其自然优雅的艺术技巧博得了赞赏。

1925年3月，徐志摩再次出国，取道苏联去德国，然后游历意大利和法国，拜谒了不少著名文人的墓地。他还在伦敦住了些时候，与英国名诗人、名小说家哈代有过一次短暂会晤。

他在欧洲过了五个月回国后，就进入了他的诗创作的最盛期。他在年方三十出头时，他在文坛上已有能在新诗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地位。徐派的诗人试图按现代西方的文学标准，而并不以中国的传统为标准进行写作。他们的目的是要综合白话诗和西方诗的形式，发展中国新诗的风格。徐志摩、闻一多、朱湘的这种创新，是自觉地试图运用西方韵律、格律的例子。这种做法标志着与中国旧诗风格彻底决裂，保守的评论者认为这是异端左道。

徐志摩还以当编辑、当教师来影响中国文学界。1925年10月，他在北京任《晨报》文学副刊编辑。《晨报》副刊在五四运动后是华北主要的文学论坛。徐志摩邀请文化界主要人物，如张东荪、赵元任、陈衡哲、郭沫若、梁启超、闻一多、翁文灏等写诗文小说，因此该报文学副刊声誉更增高了。他在副刊中开辟定期诗歌与戏剧专栏扩大副刊影响。他还担任该报另一个副刊《诗刊》主编，由1926年4月1日创刊至6月10日停刊。当时，他和文学界一些1926年在北京《新月社》的人物来往密切，如胡适、梁实秋、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其中有不少人曾在英美留过学。另一些是与《晨报》副刊有联系的诗人。

1927年初北伐军进到长江流域时，徐志摩离北京去上海，先后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大夏大学教英语。1928年春，徐志摩、胡适、邵洵美在

上海创办新月书店，第二年，出版《新月月刊》，这是“新月社”的文学刊物，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欧文学，提倡对文学的美学欣赏。三名编辑是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

1928年秋，他和王闻伯（音）去欧洲作短期旅行，1929年回国，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英语，同时仍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又在上海的一家主要出版社中华书局任编辑。1930年辞去中央大学职务，应北京大学教务长胡适之请去该校任教。1931年初，徐是创办中国第一份专门谈论新诗的独立刊物的团体中的一名主要人物。这个刊物名为《诗刊》，和以前《晨报》诗刊副刊并非一事。

1931年间，徐志摩经常乘飞机往返于北平、上海之间，他以趁坐飞机为乐。但那时中国的航空旅行还是有风险的。1931年11月19日，他由上海飞往北平，飞机遇雾，在山东济南附近坠毁，全机人员死亡。

徐志摩遗有诗集四本：1925年《志摩的诗》，1927年《翡冷翠的一夜》，1931年的《猛虎集》，1932年出版的《云游》。他还遗有文集四本：1926年的《落叶集》，1927年的《巴黎的麟爪》，1928年的《自剖集》，1931年的《秋》。他也是一名翻译能手，其主要的译作有：1923年出版的《饥饿》，1927年出版的曼斯菲尔短篇小说，伏尔泰的《诚朴》，斯蒂潘的《女佣的女儿》。徐志摩的一些诗，由赵元任谱成歌曲，在上海演唱成功，最著名的是《咏海》。

徐志摩结过两次婚。他的原妻张幼仪，是张君勱、张嘉璈的妹妹，1915年于硃石结婚，有两个儿子徐毕达和徐汝生（音）。徐志摩在剑桥时，认为追求心灵世界的自由是人生最高目的，1922年8月，他给妻子写信说要离婚。1924年夏，他遇见了陆小曼，这是北京的一位才貌双全的社交界人物，一个高级军官的夫人。他们经过一段狂热的恋爱史，1925年徐志摩去欧洲和她一度离别。她和她丈夫离了婚。徐志摩和陆小曼于1926年结婚，他们的婚事名噪一时，因为婚礼时，梁启超公开谴责徐志摩。陆小曼本人能文能画，他们合作写了一本五幕剧《卞昆冈》，这个剧本的气氛、人物性格和对话为当时评论家所赞赏。徐、陆往来信札在徐死后十六年——1947年——发表在《志摩日记》中。1965年4月2日，陆小曼死于上海，年六十四岁。

徐志摩被当代人公认为是运用中国语言方面第一个最有成就的诗人。他在

体裁、格律和主题的试验上都有深远影响。他的诗和论诗的文章，提高了对西方诗的理解和对中国语言潜在力量的认识。他巧妙地运用北京语、硃石方言和英语，使其作品具有清新的独特风格。徐志摩认为，诗必须追求韵律上音乐的美的词藻上绘画的美，风格上建筑的美，他致力于此，在他的诗作中，相当成功地达到了这些目标。

许崇智 字：汝为

许崇智（1887.10.26—1965.1.25），陈炯明的主要助手，协助孙逸仙在广东建军，是孙逸仙1923年广东军队的总司令。他在1925年达到他政治上的最高峰，任州军政府军事部长，广东省长。1945年后，居住在香港。

许崇智原籍广东番禺，生在广州。他父母的情况不详。他的祖父许应驥是个顽固派，反对康有为的维新思想，1893—1903年任闽浙总督。

许崇智在广州受旧式教育后，去日本进士官学校，毕业于第二期。1907年回国，任福州新军第十协参谋，福建省军事学堂总教官，后升为闽军第二十协协统。

武昌起义后，许崇智领导福州革命运动宣布福建独立，任福建革命军司令，原统制孙道仁任督军。1912年初，率领一军由福建北上，到上海时，得悉清室退位，民国成立，乃率部回福建，改编为第十四师。1912年国民党成立，他就参加了。

1913年，民国革命派进行了反袁的二次革命。国民党系各都督所控制的各省在李烈钧带头下宣布独立。7月，许崇智劝闽督孙道仁响应革命军，但二次革命经数周即被扑灭，许崇智逃到日本。

1914年，孙逸仙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宣誓对他效忠。孙逸仙的一些亲信，尤其是黄兴等人，由于不同意此项要求，反对国民党改组。但许崇智是孙的热烈支持者，当1914年7月8日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许任军事部长，邓铿为副部长。

1915年8月，孙逸仙派许崇智去南洋推动国民党的团结，并对抗陈炯明的反孙活动。许崇智之行显然取得了些成功，6月他回到东京向孙逸仙汇报。接着，他又去马来亚为反袁运动筹款。

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已公开暴露，不少在日本的革命首领返国，各回本省领导反袁活动。陈炯明、许智崇等人回广东。反袁斗争以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而告结束。

1917年，孙逸仙开展了所谓护法运动。1917年8月，残缺不全的国会在广州开会，成立以孙逸仙为首的军政府。许智崇任孙逸仙大本营副官长。鉴于以陆荣廷为首的桂军势力，孙逸仙决定建立自己的军力，在广东省长朱庆澜的帮助下，他建立了一个军，以陈炯明为司令，许智崇是他的副手。为了避免与桂军发生公开冲突，1917年12月孙逸仙把新编部队调到福建。陈炯明、许智崇在漳州建立据点，进行训练。1918年9月，粤军分为两个军，陈炯明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许智崇任第二军军长。

1920年8月，孙逸仙引退到上海，令陈炯明、许崇智回师广东，驱逐盘踞在广州的桂系军阀。此举获胜后，孙逸仙回到广州。1921年残存国会选孙逸仙为临时大总统，他于5月5日就职。许智崇奉孙逸仙之命，率第二军进广西攻占桂林，孙逸仙在桂林成立大本营，并计划通过湖南北上。

1922年初，孙逸仙改变计划，决定经江西北上，把大本营迁到韶关，令许崇智率第二军进江西。陈炯明反对孙逸仙的北伐计划，不听调动，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公开反叛，袭击孙逸仙的广州总统府。孙逸仙避往永丰军舰。已进入江西的许崇智第二军及其部队受命回师反击陈炯明，但在8月为陈炯明击败于粤东。许崇智于是率军进福建。孙逸仙引退去上海，下令任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许崇智扩建为三个军，以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自任第二军军长，李福林率领第三军。

1922年12月，孙逸仙得到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的帮助。1923年2月，孙逸仙下令许崇智回师广东，攻占汕头地区，滇、桂军逼近广州，粤军许多部队起而响应，把陈炯明逐出了广州，但仍占有广州与汕头之间的东江地区，在惠州设立司令部。此时，孙逸仙任许崇智代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

孙逸仙回广州，重掌南方政府权力，并计划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许崇智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那时只有五名正式委员，五名候补委员。许崇智并任国民党总部军事部长。他还在孙逸仙的政府中任职，当程潜被派往湖南家乡筹建军队时，他代理陆军总长。

1924年底，孙逸仙去北京与北方当局商讨国内重大问题，把广州事务全权委托给胡汉民。1925年3月，孙逸仙在北京逝世。当时广州最紧迫的问题是受到杨希闵的滇军和刘震寰的桂军公开反叛的威胁。胡汉民当机立断，他和许崇智及黄埔军校校长、兼广州警备司令蒋介石商量后，决定用武力对付乱军。5月，许崇智军、又有黄埔军校学员的帮助，两周内就扑灭了叛乱。

1925年夏，许崇智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达到了顶峰。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许崇智被选入十六人的政府委员会和五人的常务委员会，其他四名常务委员是胡汉民、廖仲恺、谭延闿、汪精卫。许崇智又任军政部长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又是广东省政府主席。

1925年8月，廖仲恺被暗杀后，广州又出现了新的危机。首先，主要人物胡汉民就被牵涉了进去，他的堂兄弟被疑是暗杀案的主谋者。接着，逮捕了更多的嫌疑犯，其中还有一些粤军的高级军官。作为部队的最高司令官，许崇智自然未能开脱责任。1925年9月20日，蒋介石派陈铭枢乘轮护送许崇智到上海。

1925年11月，一批持有反共观点的国民党老党员在北京西山开会。许崇智当时并未出席，但当西山会议的首脑将其活动中心移到上海后，许崇智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他们在上海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大会。随后，宁、汉国民党一起反共，国民党分裂的各派又暂时统一起来。许崇智是代表西山会议派的。以后，他受命去欧美“考察党务”，回国后，住在上海。1929年12月12日，南京当局下令通缉许崇智及其他西山会议派首领，如居正、谢持、邹鲁等人。通缉的原因从未说明，但国内人士一般都认为这些人物是国民党内部的各派，在1928—1929年间，反对南京中央当局的活动负有责任。这些人物中，只有居正遭到逮捕而被监禁。

1931年蒋介石逮捕胡汉民后，一个分裂政府在广州成立，许崇智参加了南

方联盟。9月，日本侵入东北使这个分裂活动告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了内部纷争，许崇智选入中央监察委员会，任监察院副院长。他的这一地位在1935年11月南京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得到确认。不过他仍住在上海，未参加党政重要活动。

1937年中日战争发生后，1940年在南京成立汪伪政府。许崇智离上海去香港前往重庆，杜月笙在许崇智、蒋介石之间作了调解。战争期间，他一直住在重庆，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又选入中央监委。

1945年日本战败后，许崇智定居香港，在香港的前广东军人在见面时称他为“老总”。直到他临死前几天，许崇智身体一直很好，常常打麻将消遣。他死于1965年1月25日，年七十八岁。他有六个儿子，他临死时，五个儿子都在香港。许还有女儿六人，都已成婚。

徐新六 字：振飞

徐新六（1890—1938.8），银行家，他运用西方的银行经营方法，把老式的上海浙江兴业银行改变为上海三大商业银行之一。徐任该行总经理，并帮助创办了泰山保险公司。

徐新六是一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高级职员之卓越旧学者的儿子，出生在杭州的一个富裕家庭，原籍浙江余杭。他自幼颖悟，十一岁即有文名。他在杭州养正学校毕业后，去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六年，该校后来改成交通大学。

徐新六获得浙江省公费去欧洲留学。1908年他到英国后，在伯明翰大学学冶金四年，1912年获科学学士学位。又在曼彻斯特市的维多利亚大学学经济学，1913年获文学硕士学位。以后又去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学国家财政。

1914年回国，经高等文官考试录取后，分配到财政部工作。同时他还在北京大学任教。1917年夏，梁启超任财政总长，徐新六是他的助理。当时梁致力于币制改革，但公众舆论反对，乃于1917年11月辞职。徐新六亦随之离职而进了中国银行，任金库部副主任，后又任中国银行北京支行协理。一度任汉口汉

冶萍公司总会计。

梁启超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再度出山，他以巴黎和会非正式代表身份，遍游欧洲各地，了解西方情势。徐新六被邀作为随员，其他还有张君勱、丁文江、蒋方震等人。一行人到法国时，徐新六被任命为巴黎和会赔款委员的中国代表。

徐新六由欧洲回国后，开始他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的长期工作，该行原由浙江铁路公司于1907年创办，总行设在杭州。1912年民国成立后，铁路公司收归国有，而银行则改为私营。1918年该行资金由二十五万元增加为一百万元，原大清银行总裁叶景暎任经理，为了和受过西方训练用现代方法经营业务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这些现代化银行竞争，这两家银行都有受过西方训练的人经营，浙江兴业银行聘徐新六为董事会秘书。徐于1923—1925年任该行副总经理，1925年任该行总经理直到1938年他死去。

徐新六对兴业银行进行了重要改革，雇用新人以训练原有职工，采用新的经营方式发展银行业务。徐新六主张精简机构提高效率，而不主张剧烈的改变。1929年前后，成立了独立的储蓄部，拥有单独资金，对储户负无限责任。一年后，又设立房地产信托部，也同样拥有单独资金。1932年，兴业银行和美商斯达莱公司合作，开办泰山保险公司，资金一百万元，经营人寿、水火、灾害等保险行业。1931年时，浙江兴业银行资金已增至四百万元，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成为上海三大商业银行。徐新六同时充任上海市银行，《时事新报》、《大陆报》的董事。

徐新六在上海的多年经历中还积极从事公众事务。他特别关心公共租界内中国人的利益。上海市工部局，原由英美人员把持，管理公共租界，徐新六代表中国纳税人协会，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参加了上海工部局的工作。当工部局设有中国人席位时，徐新六即由纳税人会议推举充任。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十年，一贯致力于保护中国市民的权益、并赞助上海中外人士的合作。1936年，工部局任命他为图书馆委员会主席，他是工部局担任主席的第一个中国人。

多年来，国民政府常邀他出任有关财政的职务，都被他谢绝，但政府

当局有所谘询时，他就提出他的看法。1938年夏，日军集中军力进攻武汉，争取外援成为当时的重要问题。战争第一年中来自友好政府最重要的对华援助是苏联，给予贷款，派出“志愿军”，还有美国采取收购白银来加以援助。1938年7月底，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告知中国说，他虽不能作出任何许诺，但如派陈光甫来华盛顿了解一下取得美国援助的可能性对中国可能有些好处。徐新六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国民政府考虑到陈光甫身体不好，准备以徐新六为首席代表。那时他正在香港，被召去重庆备财政部长孔祥熙的紧急谘询。徐新六于1938年8月24日乘香港到桂林中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同机还有另一名银行家胡筠。但这次班机为日军用飞机击坠，始终未能达到目的地。国民政府给他以阵亡烈士的称号。《泰晤士报》赞扬他是“一个伟大的君子”，中国政府的财政顾问杨格称他“品学高超，赤心爱国”。

许广平 字：漱园

许广平（1907— ），鲁迅夫人。1936年鲁迅去世后，她收集编订鲁迅未曾发表过的著作，并撰写有关鲁迅的文章。1949年后，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许多委员会的委员和代表团的代表。

许广平的家庭和幼年情况不详，只知她是广东番禺人。她在广州初级师范毕业后当过教员。为了升学和逃避包办婚姻，她离开广州到了北京。

1923年，她进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主修文学。当时，鲁迅在该校和北京大学教书。1925年3月，许广平写信给鲁迅请求指导，此后就开始了经常的通信，以后编印出版为《两地书》。学生时代许广平的注意力在文学和政治。她在鲁迅主编的《莽原》杂志上投稿，她是该校学生会主席。1925年5月，她领导驱逐校长的学生运动，结果被迫停学。鲁迅也参预了这次运动，因此被免去了他在教育部的职务。

许广平自北京女高师毕业后，1926年5月离北京去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教书，还负责训育，由于闹学潮，六个月后就辞职了。后来，鲁迅任广州中山大学中

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许广平成为他的助手并与他同居。1927年4月，鲁迅因抗议国民党迫害中山大学左派学生，于1927年4月辞职，他们在广州住了数月，9月27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海婴。

1927年10月，他们一家三口离广州迁居上海。他们的生活是不安定的，1930年后，鲁迅的左倾活动和对国民党的敌视，使他经常有被捕的危险。许广平经常陪伴着他，这无疑给了他以护庇和慰藉。

1936年鲁迅去世后，许仍在上海，开始编订鲁迅未发表的著作，并撰写回忆文章。1937年，中日战争发生后，他和郑振铎组织了一个“复社”鼓吹抗日运动。1941年12月15日她被日军逮捕监禁了两月。在整个日本占领上海期间，她一直在上海。

战争结束后，许广平任《民主》周刊编辑，国大代表。她在妇女组织中很活跃，任“上海妇女联谊会”主席、“中国妇女联盟”上海分会主席。

1949年，许广平在中央人民政府历任各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民主妇联副主席，对外友协理事，民主促进会常委，但并无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迹象。她还充当过多次代表团团长或团员出国访问，1948年，1953年两次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纪念；1955年去日内瓦出席国际民主妇联第六次理事会；1956年去长崎、东京出席禁止核弹的第二次世界会议；1958年在瑞典出席裁军和国际合作会议；1958年去塔什干出席亚非作家会议。

许广平对中国文坛的主要贡献是她编订鲁迅的著作和撰写有关鲁迅的作品。她所编辑的主要出版物中有《鲁迅书简》，最初于1946年出版。她在1957年北京出版的《鲁迅全集》工作中，也作出了贡献。

徐 谟 字：叔谟

徐谟（1893—1956.6.28），法律学家，政治学家。1932—1941年在制订和执行中国对外政策起过重要作用，1946年后直到去世之前，任职国际法庭。

徐谟出生在江苏吴县的一个中产家庭，早年由父亲教育在家读书，他父亲

是一名塾师后在本地一所中学任教。1912年他进北洋大学，是该校自王宠惠以后在英国文学及英文写作上最有才华的一名学生。他擅长用英语、中文作演讲而颇有声誉。他学习中西法律，1916年获得北洋大学法学士学位。

毕业后回江苏，在扬州中学教英语。1919年政府举行的外交官考试他名列第一。他被派在驻美使馆中见习，1921—1922年任中国代表团秘书，出席华盛顿会议。他又在华盛顿大学学法律课程，1922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正廷很器重他。

1922年回国，任南开大学法律和政治学教授，开政治学、比较宪法及国际法等课程，1925—1926年任该校文学院院长。1926年任天津律师协会会员、《益世报》主编，这是天津的一份很有影响的天主教会所办的报纸，徐谟常在上面发表有关国际事务的专论。

1926年末，徐谟辞去南开大学职务去上海挂牌当律师。1927年1月，在司法独立要求的压力下上海公共租界设立了临时法庭。徐谟由于他的专业训练和精通英、美法律及法学，被聘为法官。他热情地接受了这一任命，认为上海临时法庭的成立，是中国重申司法独立、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第一步。1927年任江苏松江地方审判厅厅长。

1928年春，南京成为政治中心，外交事务方面出现了新的机会，徐谟由他在北洋大学前一班同学金问泗介绍，进外交部当参事。1928年春，王正廷任外交部长，请徐谟当他的主要助理，六个月期间，徐协助王和许多国家签订了十二项关税协定。1929年1月到1932年1月，徐谟任欧美司司长，1929年一度任废除上海治外法权的特别外交专员。他还协助王正廷取得收回威海卫和与法国达成关于东京湾的协议，与日本签订一项关税新协定，与希腊、波兰、捷克签订了商务条约。

1931年9月，日本侵占东北，1932年1月日本又进犯上海，中国的外交中心转移到对付日本的威胁。1931年下半年，徐谟代理亚洲司司长，1932年1月，任外交部事务次长，6月继郭泰祺而任政务次长。从1932年起至1941年，徐谟在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稳定和实行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1941年，经徐谟要求出任澳大利亚大使衔公使，一直到战争结束。尽管就他

的资望和经历而论，他是有资格担任更高职务的。澳大利亚的人士认为他是一位雄辩演说家，墨尔本大学授以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战争渐近结束，作为中国最有经验的外交人员之一，徐被约去担任制订战后规划工作。1945年初，他参加了法律委员会工作，4月9日到21日在华盛顿开会，筹备国际法庭草案。在旧金山讨论国际组织的联合国大会上，徐谟作为联合国宪章起草委员会处理国际纠纷部分的中国代表，曾起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1945—1946年他任驻土耳其大使。

1946年2月6日，第一轮票选他被选为十三人国际法庭的一员。他在海牙任职三年，第二届会议再次当选连任九年。1956年6月28日因心脏病死在荷兰。

徐悲鸿

徐悲鸿（1895.7.19—1953.9.26），艺术家，以精通中西画法，和对奔马的细致观察而享有盛名。

徐悲鸿，江苏宜兴人，兄弟姊妹六人，他居长，有二弟三妹。他父亲徐达章，是一位乡村教师，又是一名教画的匠人。徐悲鸿幼年就学画，十七岁时，他在本县几所学校教绘画，以其收入补给家用。1914年，他父亲去世，这位青年艺术家去上海。起初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一度曾不得不重回家乡，不久又回上海设法出售他的绘画。1916年，他的作品稍受重视，就在这时，他开始学习法语。

1917年，他在日本学习了九个月，后在北京师范学院新设的美术系获得了一个职位。1919年，经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教育部给公费去法国留学。他先在巴黎儒利安学院，后来进入贝斯纳主持的美术学院。

徐悲鸿得到法国当代肖像画名家波佛莱很大鼓励和指导。他在巴黎的最初两年，曾在法国美术家画廊和国立美术学会展出他的个人作品，但只售出了一幅画，得到一千法郎，当时国内局势混乱，政府拖欠拨给国外留学生的公费，徐悲鸿的经济情况拮据困难。

1921年他去柏林，在那里住了两年，到1923年又回到巴黎。1925年回国，归国途中曾去马来亚。1926年第二次去欧洲，1927年秋回上海。

1927年，徐悲鸿在南京中央大学新设美术系当教授，又在田汉为提倡欧化新戏剧而成立的南国美术学院艺术系担任主任。这所学院具有当时上海流行的艺术家派头，徐总是留着长发、打着大花领带、仿效巴黎拉丁区的打扮。1929年任北京大学美术系主任，秋天，辞去此职又去南京任系主任。不久他不再穿西服而改穿中式长衫，这种外表的变化，和他在绘画上向新的、主要是中国风格的发展是一致的。他不用调色板和油彩而使用中国毛笔。他的绘画将中国毛笔水墨画的无拘束风格和西方的人体解剖知识和学院体融合到一起。由于徐悲鸿的带领，南京成为中国新美术发扬光大的中心。

1931年，徐悲鸿的作品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极为成功的展出，现代中国美术作品第一次在该城市展出。1933年5月，他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应邀参加在巴黎国立外国流派博物馆举行的近代中国画展。11月，柏林美术家协会请他去展出他的作品。他带着现代中国绘画去法兰克福特、布鲁塞尔、米兰等地。1934年初，他应邀携带作品去莫斯科、列宁格勒。当年夏天回国。

1935年，徐悲鸿去桂林筹办广西省立美术学院，后来由他的学生张安智（音）任校长。1937年，徐悲鸿的作品在广州、香港、长沙展出。中日战争发生后，中央大学美术系迁往战时首都重庆。1938年，徐悲鸿去印尼、马来亚旅行，并在新加坡展出他的作品，展览会收入用作救灾捐款。1939年，他应泰戈尔邀请去印度，1940年他的作品在桑恰却坦和加尔各答展出。翌年，又在吉隆坡、槟榔屿展出，卖画所得均用于国内灾款。

1942年，徐悲鸿回到重庆，任中央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1944年患重病，此后他的身体健康始终未能复元。1946年回北平，任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48年冬，国民党当局逃往南方，他拒未同行，仍任该校校长直到1953年去世。他不得不在美术上符合共产主义的形式，而且，他的作品符合新的标准是并不难的。他仍任原校校长，但已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同时任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政协代表。那时徐悲鸿已是一个病人，1951年中风结束了他的艺术生命。他死后被誉为近代中国伟大艺术家之一，他的寓所改为纪念馆。

徐悲鸿结过三次婚，前两次都离婚。他有四个孩子，两个由第二位夫人所生，另两个是他第三位夫人所生。

徐悲鸿能以高超的技术运用各种工具，用多种风格绘画广泛的题材。他的作品，包括有用严格的西洋学院派手法的肖像画和风景画、人物、动物习作、大幅故事题材画，以及以传统中国画风格画的花鸟习作。他对欧洲油画和绘法写实技巧的掌握，当时其他中国画家没有能及得上他。这种技巧的掌握，最有代表性的是1930—1933年在南京创作的人物原大绘画。其中之一是：《田横五百壮士》，刻绘了二十几个人物悲痛地谛听着一位刚下马的使者所宣布的消息。这一群听众中的中心人物就是作者的自画像。这幅画的布局是最好的学院派传统，素描是扎实的，透视解剖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对欧洲赏鉴者来说，这与本世纪初欧洲各艺术学校中所画的成千上百幅故事油画没有多大区别。另一幅画《等候我们的解放者》也是如此，画的是一头水牛在林间吃草的风景中的一群乡民。这幅画集中表现了人体课上所设计的配合，画的是中国人，似乎只是为了突出所要取得的效果。这种方法的进一步运用还可以在一幅时间晚得多名为《愚公移山》的1940年的神话作品中看出。在这幅画中，作者再次试图将西方巨幅故事画和中国画法和题材结合起来，这是徐悲鸿毕生努力以求的。

徐悲鸿对西方学院体不遗余力的探讨，对他那一代的美术有最重大贡献的国画影响甚深。中外美术界中，常常把徐悲鸿的名字和他所画的很有气势的奔马联想在一起。徐悲鸿画的马在概念上完全是中国式的，但反映出西方生动自然主义的强烈影响。他在1939年所作的一组淡彩写生的马说明了他的中国画是熟练的掌握了欧洲绘画的透视和解剖原理。马的形象，在他早期西洋故事画中也常出现。在这种完整的中国风格的作品中，徐悲鸿用中国绘画工具，把欧洲现实主义派可画的傲步而行式引颈狂啸的动物，刻画出了细腻的神韵。

树木花鸟也是徐悲鸿喜爱的题材。虽然这些画许多都是完全东方式的，但还是可以看出西方自然主义对它们的间接影响。1935年他画的《黑猪》、1940年所画的《鹰》显示出徐直接继承了过去一些大师的手法，但在他的一些树木鸟兽作品中，他使用了一种崭新的构图方法，将一种新的表现因素与传统的文人画家的不羁的朴实相结合。他的一些最成功的作品是肖像画，如1940年所作

的《甘地》的铅笔肖像，1942年的妇女头像粉笔画，1943年作的两幅他的夫人的工笔画像，这些画都有力地证明了他肖像画方面的技巧。

徐悲鸿的画集有：《徐悲鸿画范》，1939年上海出版，《徐悲鸿画选集》，1954年北京出版，《徐悲鸿的彩墨画》，1956年北京出版，《徐悲鸿油画》，1960年北京出版。

徐世昌 字：菊人 号：东海

徐世昌（1855.10.23—1939.6.6），袁世凯的亲信，1918年是唯一出身文官的总统。1922年退休后，致力著述与文化事业。

徐世昌的出身和早年生活不详。他的祖先在天津登有户籍，但他家几代都在河南当小官吏。徐世昌可能出生在河南，在那里度过他的幼年生活。家境虽属贫困，但曾受旧式教育，他一度在河南一名县官的家塾中教馆，就在此时他结识了袁世凯，成了终生至友。由于袁世凯的资助他才能赴京应试，1882年中举人，1886年中进士，1889年任翰林院编修。

他在京师官场随波逐流任职十年后，1896年因母丧回河南。那时袁世凯在直隶小站负责训练新建陆军。徐世昌虽系文职出身，却成为袁世凯新军中的主要幕僚，于是开始了与北洋军事集团的密切关系。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在保定成立一个练兵中心，由徐世昌负责文案处。两年后，清政府建立一个编练陆军机构，徐世昌以中将衔任高级行政军官。1904年任兵部侍郎，1905年任见习军机，署理兵部尚书。

1905年7月，徐世昌与端方、载泽、绍英、戴鸿慈被派为考察西洋宪政的五大臣之一。9月21日，他们出发时在车站遇吴樾用炸弹行刺，吴樾身死，两名大臣受伤。行期展缓，徐世昌另派新职，任邮传部尚书，年底，任军机大臣。

1906年12月，徐世昌以特别使命被派去东北，清廷鉴于义和团运动后的俄国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北的军队对中国可能发生威胁。徐世昌的使命是考察情势并提出采取何种措施以增强该地区的中国方面的力量的建议。徐世昌建议

改组东北的军政机构和实行其它广泛的改革。他拟订了一些遏制日、俄在东北势力的方案：鼓励汉族移民定居于前满族禁地，兴建铁路和中国自办企业以与日、俄竞争；准许日、俄以外的其他国家对东北的投资。1907年4月20日，清政府谕令东北全面改制，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废将军改为巡抚，均受东三省总督节制。徐世昌任总督，唐绍仪任奉天巡抚，朱家宝任吉林巡抚，程德全任黑龙江巡抚。

徐世昌着手开始执行他奏折中所提出的各项措施。1911年公布的《东三省政略》详载了他的行政措施，书中包括有关他所关注的各方面的公文奏折，如边务、蒙古事务、外交、军事、民政、财政、商业及东北省务会议的决议。徐世昌有几个亲信文职官员，后来都成为民国时期的显要人物：钱能训、1913年、1917—1919年任内务总长，1918—1919年任国务总理；周树模、1909年任黑龙江巡抚，袁世凯时任平政院院长；朱启铃、1912年在袁世凯政府中任交通总长，1914—1916年任内务总长。

1909年初宣统皇帝溥仪即位，袁世凯被罢黜，锡良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召回京。虽然他与袁世凯有多年密切关系，但仍为清廷所信任。当清朝末年皇族寻求在政府各部门中重申其直接控制权时，徐在京师政界仍担任一些要职。1909年，徐世昌被任为邮传部尚书，津浦铁路督办。翌年升为大学士并重任军机处大臣。1911年5月，在北京新召开的国会日益增长的压力下，清廷宣布成立内阁代替军机处。以庆亲王为首的内阁完全是满族亲贵所控制的。徐世昌作为两名副首相之一，是重要的汉族阁员。

在此期间，徐世昌仍与北洋派同人保持联系，并经常与袁世凯书信往来。1911年武昌起义，徐世昌劝摄政王召回被迫去职的袁世凯，袁世凯通过徐世昌提出六个复职的条件。在帮助袁世凯成为实际上北京的统治者，并完成清室退位的安排后，徐世昌辞职以示其尽忠于清王朝的姿态。他退隐青岛，经他主政时旧属的协助，编了一部《退耕室政书》，1914年出版，这里收集了他1904—1911年间的公文、函电。

1914年，袁世凯终于把徐世昌请到北京政府中任职。袁世凯解散了国会，并将内阁改为“政事堂”。袁世凯设国务卿一职为这个机构之长，劝他的老朋

友来担任这职务（1914年5月1日）。徐世昌享有袁世凯属下首席总长的声望，但并无实权。1915年，袁世凯帝制计划已为人所共知，徐世昌引退回到他河南水竹村庄园。袁世凯准备于1915年后期登帝位，尊徐世昌为“嵩山四友”之一（其他三人为张謇、赵尔巽、李经羲）。他们享有特殊尊荣，可以不把袁视为君王而视为朋友。徐世昌虽经多方劝诱，但直到1916年4月因西南诸省起兵反抗，袁世凯同意放弃称帝计划时才出山。徐此时又出任国务卿，但未能在袁世凯和南方首领间取得和解，到职仅一个月即辞职而由段祺瑞继任。1916年6月5日，袁世凯临死前一日，请徐世昌到北京作最后诀别，徐以袁世凯至友的身份，协助料理袁世凯的家事。

1916年11月，徐世昌到北京，在总理段祺瑞和总统黎元洪之间进行调解。1917年夏的复辟运动期间，又出现了段祺瑞和冯国璋之间的纷争，徐世昌对各方无所偏袒。由于他当调解人的声名和他在政治上的中立立场，他被认为是一个不偏不倚的政界元老。1918年段辞去内阁总理，冯辞去总统之职，不少人希望徐世昌出任总统，认为他能解决北洋派各系和南北政府之间的分歧。拥段的皖系极力主张选徐世昌为总统，认为这样可以抵销冯国璋的势力，而不致影响他们掌握的实权。1918年9月4日，徐继冯国璋而为总统，10月10日就职。

徐世昌通过他旧日的亲信、如新任内阁总理钱能训、交通总长曹汝霖、和名义上的皖系首领王揖唐，在北京政府内起一定程度的作用，但是，不久他就发现他在执行南北和解的政策上无能为力，实际上，他不过是段祺瑞及拥段派的一名傀儡而已。他希望在1919年初上海召开的和平会议上达成协议的努力为段祺瑞等人拒绝南方政府“旧国会”在北京恢复的要求而受到阻挠。南方首领又认为他的总统职位乃由不合法的“新国会”所选出，不予承认。这样，他的调解人的地位大受损伤。

不久，徐世昌又遇到了群众反对凡尔赛和约条款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于日本。徐世昌认为中国应在和约上签字。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他又下令逮捕袭击曹汝霖及亲日官僚的学生，并公开称赞这些官吏尽心为国。只是在极端勉强的情况下，他延搁到6月才发出指示取消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命令，并接受曹汝霖等人的辞职。由于这些措施，徐世昌引起了南方政府和全国学生及青年

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怒。

势力强大的北洋派旧人不断侵犯他本来不大的权力，使徐世昌在行使职权上无能为力。为了改善他的处境，他使用了袁世凯从前采用的利用这派去反对另一派的手法。于是当段祺瑞和皖系掌权时，徐世昌支持段祺瑞的另一名部属靳云鹏任总理以限制段的第一红人徐树铮的权势。同时他与张作霖及直系首领密谋打破皖系对北京的垄断。1920年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后，徐世昌企图在张作霖和直系曹锟、吴佩孚的裂隙中，取得最多的政治利益。

徐世昌虽精于政治权术，但终于无法缩小军阀的势力。1922年，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后，徐世昌成为取得胜利而野心勃勃的直系军阀的绊脚石，他们要求他辞职。1922年6月2日他走下了总统宝座，几日后，由直系指定人选黎元洪继任。徐世昌离北京去天津，在那里优游林下。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后，日本特工人员找北洋派人物劝他们参加伪满傀儡政权，徐是他们的对象之一，他加以拒绝。从1931年到1939年6月他死之前，日方几次设法争取他的合作，始终为时所拒。

徐世昌毕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强烈兴趣，他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的赞助人和事业家。他早年虽大部是在河南，但他以河北人自居。由于中国传统的、强烈的祖籍观念，他谋求宣扬他本省的文化遗产，编印许多过去本地学者的文集，1915年出版《大清畿辅书征》，这是一本清代河北学者的著述书目。他对清初的两名实用哲学家颜元、李塨有特殊兴趣。关于此二人，徐编有他们的遗著《颜、李遗书》及摘引其中的重要章节为《颜李语要》。他编写这两人及其门徒的事迹的《颜、李师承记》。1919年他当大总统时，下令把颜、李配飨文庙。1920年成立“四存学会”提倡颜、李学说并编印其著述。

徐世昌主持编订清代其它文哲著作，其最主要的有《清儒学案》（一直到1940年才出版），其中有一千六百九十名清代学者的传记。这部书，可以与清初黄宗羲的《宋儒学案》、《明儒学案》媲美。他对白话文全然不重视，他在他的总统府内成立了一个晚晴簃诗社（晚晴簃是他任总统时的书斋名）这是一个研讨和写作旧诗的团体。该社的一项重要作品是编了一本清人诗集，名为《晚晴簃诗荟》，1929年在天津出版。

徐世昌的诗文已出版了几种集子，最早的是1914年天津出版《退耕堂集》，1920年出版《水竹村人诗集》，1928年出版《水竹村人集》，1928—1929年在《艺林旬刊》上发表的诗，合编为《归云楼题画诗》，这刊物还登载了一些徐世昌的绘画，大都是山水画。

徐世昌虽从事政治，但他却笃信道教，由于他在财力上的支持，白云观的明版《道藏》由商务印书馆在1923—1926年重印。他对欧战后中国的经济和教育探讨，写了一篇《欧战之后中国经济与教育》，以徐世昌的名义于1920年发表（此文译成法文，1922年在巴黎发表）。此文简略地谈了战后中国的抱负，作为一篇政策声明，则是既无力又不符实际的。后来了解到，这是黄郛代徐世昌执笔写成的。在此之前，巴黎大学赠与他名誉文学博士的学位。

徐世昌结婚两次，都是河南官僚家的女儿。他有一个女儿，因无子，所以过继他兄弟徐世光的儿子徐绪志为子。徐世光曾在袁世凯山东任巡抚时任济南道尹。徐世昌的另一个兄弟叫徐世章，曾任津浦铁路管理局局长，1920—1922年任交通次长，1922年任币制局总裁。

许世英 字：隽人

许世英（1872—1964.10.13），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其最主要职务是1925年12月至1926年3月任内阁总理，1936年2月至1938年1月任驻日大使。他在赈灾工作中也很知名。

许世英出生在安徽至德，他在本族子弟的书塾读书，是十名幼童中年龄最小的一人。十二岁时，他父亲送他去望江县从丁文绪（音）受业，受教十二年，成为精通旧学的学者，中举人、拔贡。1897年他以七品小京官在刑部任职。

1898年许世英到北京任职时，恰在百日维新前几天，他在刘光第手下管理刑部浙江司案卷，二人建立了友谊。百日维新运动以慈禧对光绪发动政变而告结束，刘光第乃维新派中的六君子之一被处死刑。许世英虽然被提升掌管直隶司案卷，但他不愿在刑部任事。1900年他离北京去四川，四川布政使周馥是他

父亲的朋友，许世英希望能在四川做一个县官。他所乘的帆船在长江急流中沉没，险遭灭顶，7月才到达成都。他知道虽然他可以在四川当上一名县官，但义和团运动正在蓬勃展开，去北京会有更好的机遇。他听从别人劝告，又长途跋涉回到北京。

他到汉口时，得悉八国联军已逼近北京，慈禧、光绪已逃出北京，乃回安徽原籍。一个月后，他收到电报说刑部急需人才，催他即去西安，10月，他到达西安。他除原经管的直隶案卷外，又增管了四川的案卷，约有四千宗未结积案。在1902年清廷回京之前，许世英清理积案的能力已为人所称道，1902年升为六品官。

1903年，许世英应进士试未中，仍在刑部任职。1905年10月警务处成立，许世英任该处行政部门高级助理，同时仍负责刑部重大案卷。1906年底升为四品官。

1907年4月，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聘许世英去东北筹建司法机构，任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负责制订司法机构计划。1908年秋，任厅长。他在沈阳和日本领事广田弘毅、副领事有田八郎结认。他们与许之间的友谊对中日间的关系很为重要。

1910年，许世英随同徐谦去欧美考察司法及监狱，参加了在华盛顿召开的监狱改革的第八届国际会议。代表团于1911年春回国，11月，许世英任山西提法使，这时山西巡抚是张锡銮。几个月后，又改任布政使。许世英与张锡銮联名吁请清廷退位建立民国。1912年民国成立，张锡銮任直隶都督，经张推荐，5月任许世英为大理院院长，7月，陆征祥内阁时任司法总长，章宗祥接任大理院长。

许世英、徐谦、陈篆、陈锦涛组织了一个“国民共进会”，这是武昌起义后出现的许多小政党之一。1912年8月，“国民共进会”和其他两个小党与同盟会合并而组成国民党。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的党徒刺杀，许世英拒绝国民党在上海设立特别法庭审判的要求，认为当地法院有权审理。宋案是一件政治事件而不是一个司法案件。一名被指控的凶手应桂馨越狱后于1914年1月被暗杀。

1913年9月，进步党梁启超继许世英为司法总长，进步党在二次革命时是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的。许世英任奉天省民政长，1914年1月4日，命许世英在新成立的“政事堂”任职，这是代替1月10日被解散的国会的。许世英协助草拟新宪法后，5月8日出任福建省巡按使。

1916年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于6月30日组阁，任许世英为内务总长，7月12日，又由孙洪伊接任，许世英改任交通总长。1917年因津浦路采购车辆受贿案而被迫辞职，曾由法院提审，宣告无罪。1918年任华意银行经理。

1921年9月，许世英又任公职，为安徽省长及赈灾督办等职，因群起反对而辞职。1922年11月，任汪大燮内阁的司法总长，许世英到京之前，汪内阁即已倒台。1923年3月任航空署督办，11月曹锟当选为总统时被免职。翌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代表段祺瑞与孙逸仙商谈孙和北方的段祺瑞、张作霖各派组织三角联盟共同反对在北京的曹锟、吴佩孚。1924年10月4日，他和孙逸仙在韶关会面取得了一个临时协定。许世英回天津不久，冯玉祥发动反对吴佩孚的政变，占领北京，逐走总统曹锟。段祺瑞由天津出山，领导新成立的临时政府。11月2日，孙逸仙宣布应邀去北京参加有关新政府事宜的谈判。11月24日，已成为段祺瑞机要策士的许世英任段政府的秘书长。12月4日，孙逸仙到天津时，段内阁制订了准备召开善后会议的工作原则，这是孙所不能接受的，孙也宣布了一个段所不能接受的国民党的“最低纲领”。12月4日，善后会议筹备委员会秘书长许世英和叶恭绰到天津和孙逸仙会商，但未能达成协议。12月31日，孙逸仙离津到北京。善后会议于1925年2月1日召开，许世英任秘书长，但孙逸仙和国民党人拒绝参加。3月12日，孙逸仙在北京逝世。

1925年12月26日，段祺瑞任许世英为内阁总理。许世英的倾向国民党以国民党人于右任为内务总长，王正廷为外交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贾德耀为陆军总长。许世英罗致国民党支持段祺瑞，草拟一电文请段签字，电文声明他将于1926年1月16日将职权交给于右任。此电未发出，段祺瑞的一些支持人起而反对许世英，许世英逃往使馆区躲避，于右任也未就内务总长之职了。

当时，冯玉祥在张作霖的强大兵力下后退，段在北京的权位亦动摇了。许又复职，但又于1926年2月15日提出辞呈，段准其请假并以贾德耀为代总理。

8月4日，段准许世英及其内阁辞职，一个月后，段政权也垮台了。

许世英不久去上海，组织苏浙皖联合会反对孙传芳，主张地方自治。为了安全起见，该会总部设在上海公共租界内。1927年1月初，孙传芳下令通缉许世英等人，并请租界当局对他们的活动加以制止。许世英逃往香港，8月，孙传芳失败后许又回上海。

1928年春，国民政府任许世英为直鲁灾委员赈会委员长这样一个不太高的职位，1930年任全国赈灾委员会委员长兼全国财政委员会主席。赈灾事务，尤其是1931年的长江水灾，使许世英在此后五年中忙忙碌碌，各地奔走。1932年，他组织了一个上海战区难民救济会，救济“一、二八”中日冲突中受灾的难民。

1936年2月，国民政府试图解决华北问题，任许世英为驻日大使。1936年4月有田八郎继广田弘毅为日本外务大臣，广田成为总理大臣。在中日谈判中，许世英只不过起了次要作用。他与有田、广田重叙三十年前在沈阳的旧交。11月，德、日签订反共协定，有田对许世英表示欢迎中国参加。许世英受南京之命加以谢绝。12月西安事变后，南京的对日政策改为强硬抵抗。1937年3月，外交部长王宠惠召许世英回国会商。芦沟桥事变引起了中日战争时，许世英还在和王宠惠商量改善中日关系。许世英立刻去东京访问广田，希望保全中国利权解决华北事件。广田要求国民政府不要介入，日本的侵略并未停止。8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许世英对广田说明此举“纯系和平措施”，并表明“日方尚能同意，亦可签订同样性质的条约”。

虽未宣战，但亦无和平希望。国联的干预，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许世英在东京的活动，全属无效。1938年1月，许世英被召回。他到武汉后，预言中国必能获胜。6月，许世英参加国民参政会，国民政府成立此会是为了号召援助抗日斗争。许世英任全国赈灾委员会代委员长，空袭救护委员会主席，1944年12月，正式任全国赈灾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由于年事渐高，要求免去驻日大使一职，他既未要求也未被任要职。1945年2月，许被授以国民政府高等顾问的头衔。

1947年4月到1949年8月，许世英任国民政府委员，蒙藏事务委员会委员

长。1950年夏去台湾，任总统府高等顾问。1955年8月孙立人所部发生谭闻谍活动，许世英被派参加该案调查委员会。他在台湾过着平静生活，1969年10月13日死在台北，年九十一岁。

许世英的妻子是沈懿青（音）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徐树铮

字：又铮

徐树铮（1880.11.4—1925.12.30），历任北京政府的重要职务，段祺瑞身边权力最大的代理人，1912—1920年间，是安福系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918年后向外蒙扩张汉族势力引起了蒙族对汉族的反抗，他的活动又引起了1920年直皖战争。1925年12月，在廊坊遇刺身死。

他兄弟姊妹七人，他最幼，生在江苏萧县。他父亲许钟情（音）是一名拔贡，教村塾。徐树铮是个有天赋的学生，1889年去徐州读书。他进县校读书，1892年中秀才，四年后得有秀才膏火资助。

1901年，徐树铮去济南，向山东巡抚袁世凯上书，陈述军国大事。袁世凯虽未接见并委派职务，但此举并非全无收获，他得到段祺瑞的赏识。同年底，他当了段祺瑞的幕僚。1905年他得到段祺瑞的帮助，以公费生去日本，准备投考士官学校，1908年考入进士官学校第七期步兵科。1909年毕业回国，在段祺瑞第六师任职。1911年，段任第一军军长，徐任其参谋长。

民国成立后，段祺瑞在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中任陆军总长，徐任该部军马司司长，1912年9月，任陆军部局长，并负责处理总务司事宜。他以“段祺瑞的灵魂”而闻名，1914年5月他任陆军次长。段祺瑞决定反对袁世凯称帝，于1915年5月31日辞职。段去职后，支持段的徐树铮以虚报购买外国军火费用而被检举，6月26日解职，但他仍在北京，办了一个成达中学。1915年12月，蔡锷、唐继尧起兵反袁，徐树铮曾写信给袁世凯，劝他放弃称帝计划。

1916年4月，袁世凯任段祺瑞为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段推荐徐树铮任内阁秘书长，袁却用了自己的亲信王式通，而以徐树铮为副秘书长。6月袁世凯

死后，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再次推荐其亲信人物徐树铮为内阁秘书长，黎元洪不同意，后经徐世昌的调解才答应了段祺瑞的要求。

北洋势力分裂为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徐树铮力求扩大内阁总理的权力并夺取总统的职权。他在内阁会议上有发言和发号施令的权力。不久他就与力图增强黎元洪、抑止段祺瑞势力的内务总长孙洪伊发生了冲突。徐世昌被请出来调解，1916年11月，在徐世昌的建议下两人一齐去职。

徐树铮的权势并未因其去职而有所削减，他在段祺瑞1917年3月宣布与德断交的活动中起重要作用。中国是否应反对德国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问题，影响到段祺瑞于5月间的去职。张勋复辟事件后，1917年7月2日，黎元洪下令复段祺瑞总理职，并兼任陆军总长。黎还令冯国璋执行总统职务。8月，徐树铮任陆军次长，中国对德宣战。徐树铮又是1917—1918年西原借款的主要策动人，这笔借款大概是用来建立一支模范军队。直系和皖系的对抗日益加剧，迫使段祺瑞和徐树铮在11月辞职。

徐树铮为了恢复他主子的势力，去沈阳从张作霖处取得奉方贷款和关内奉军副司令的头衔。他设司令部于天津附近的军粮城，并开始对冯国璋施加政治压力。1918年3月7日，他和王揖唐组成了一个安福俱乐部控制国会。3月23日，冯国璋再次任命段祺瑞为内阁总理。

冯国璋和段祺瑞因对处理孙逸仙的广州政府问题意见不同而发生冲突。冯国璋主张进行谈判，段祺瑞和徐树铮则认为用武力是更好的解决办法。1918年5月，徐树铮率领奉军三个师进入湖南，但张作霖则不肯让徐树铮把奉军当作他的直属部队，下令把三个师调回东北。6月中旬，徐诱捕杀害了反对他的前陕西督军陆建章。此举是有反响的，因为陆是冯玉祥的姻叔。北京政府于2月间下令解除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职务。段祺瑞恢复了冯玉祥的原职，并任命为常德镇守使。冯玉祥对杀陆案和他的任命未作表示。7月底，徐树铮扣用奉军军饷，再次触怒张作霖，张撤消徐树铮的关内奉军副司令头衔。

为了准备对德作战成立参战处，段祺瑞任督办。1918年9月，徐树铮继靳云鹏为副督办。10月，徐世昌任总统，段祺瑞辞去内阁总理，但仍任参战处督办，徐树铮任该处参谋长。11月，徐树铮以少将衔去日本，名为参观日军秋

操，据传此行真正目的在与日方高级官员讨论有关两国在东北密切合作的问题，1918年12月中旬回国。

徐树铮后来将注意力放在坚持中国在东北和内蒙的统治权上。经段祺瑞示意，1919年4月徐树铮提出“筹边”计划，6月24日，总统府下令撤消“参战处”另立“筹边办事处”，由段祺瑞任总办，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库伦都护使陈毅受权继续与蒙族谈判，徐树铮只负责军事。10月底，徐树铮到达库伦，撤消原由中俄协定于1913年确定、又于1915年重申的蒙族自治。徐树铮置库伦都护使于不顾，直接向蒙古政府提出要求。徐树铮遭到蒙族反对，他以逮捕蒙族大臣及呼图克图喇嘛相威胁。蒙古王公大臣被迫签字废除自治。1919年11月22日，徐树铮宣布取消蒙古自治，两天后，他到了北京，应他的要求，取消了库伦都护使。12月1日由他任善后总办，翌日任命为特使，掌握任免大权。他于12月7日又回到库伦。

徐树铮开始巩固其在外蒙的个人统治，遣散蒙族军队，将政府权力转到他的机构中，并将他自己的人安插在重要岗位上，。他把防边军军费负担加在蒙族人身上，又向日本借了两笔巨款用以开发该地区，其中一笔用来建筑张家口到恰克图的铁路。1920年2月，他到北京正式就任该铁路的总办后又回库伦。

徐树铮侵夺了张作霖认为理所当然属于他势力范围的权力和地域，这使张作霖十分恼怒。1920年3月，张作霖通知段祺瑞，倘若徐树铮及其安福系的方针不加敛迹，张作霖将中断与段的联合。4月，张作霖和曹锟的直系联合反对段祺瑞和安福系。6月17日，徐树铮回北京，曹锟、张作霖、李纯提出要求解除徐树铮职务，7月4日，段祺瑞同意徐去职。7月6日，段祺瑞宣布建立定国军，5日后当徐世昌受段祺瑞一派的压力，公开谴责曹锟，解除吴佩孚第三师师长时，局势又告破裂。张作霖、曹锟及其同盟者认为这是段派对直系公开宣战。张作霖调奉军南下，直军由保定北上，徐树铮在东线作战顺利，但是定国军段芝贵所部于7月17日在保定附近被击败，段祺瑞因未能完成任务，自请免职。7月19日，徐世昌下令直、皖两军停战，褫夺徐树铮的一切名号和职位，并于7月29日发出通缉令。徐树铮躲进北京日本使馆，一直到11月中旬才去上海。安福俱乐部由政府通令解散。

徐树铮对蒙古的政策，也引起了蒙族反对北京汉人政府，他们与斯顿波公爵及其白俄军合作，1921年3月，在库伦成立了蒙古临时国民政府。6月6日，红军和蒙军进占库伦，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1921年12月到1922年2月，徐树铮代表段祺瑞在广州商谈皖系与孙逸仙派联合反对在北京掌权的直系。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代表孙逸仙参加谈判。张作霖派李少白去桂林商谈与孙逸仙的联盟问题后，可能由于张对徐有反感，故改由周善培代替徐树铮。

1922年秋，徐树铮在许崇智协助下与王永泉联合反对福建督军李厚基。他宣称将成立一个临时军政府，并于10月2日限李厚基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福州。10月12日，李被迫逃到停泊该地的军舰上躲避。六天之后，徐树铮自任建国军政制置府统领，并任王永泉为绥抚。由于闽人拒绝支持此新政权，又改任王为总司令，并以林森为临时省长。尽管如此，徐树铮终未能得到民众拥护。北京政府派萨镇冰主持福建军务，11月2日，徐树铮逃往上海。

1923年秋初徐树铮又去日本，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又回上海。他企图以公共租界为活动基点，并掌握浙江督军卢永祥的残部。10月，租界当局以违反租界章程的罪名，用英轮载装将他驱逐出境，并告以该轮到伦敦之前不准他离船。英船到香港时，英方当局获知冯玉祥北京政变，乃将徐树铮释出，并告以可留在国内，但徐却决定去欧洲，12月底到巴黎。1925年1月4日，段祺瑞为北京政府临时执政，任徐树铮为特派员，考察欧美、日本的政治。他在欧洲访问了八个国家，然后去美国、日本，年底回国，12月23日回到北京。五日后，徐正式晋见段祺瑞，但未有任新的任命。

1925年12月29日，徐树铮离北京去上海，翌日，火车经过廊坊，该地由冯玉祥国民军的部队驻守，徐树铮被抓出车厢加以枪杀。据称此事是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所为，他通电称此举系为父报仇。徐树铮遗有两妻和四子二女。他的长妻生于1878年，1956年死在中国大陆。他的继室沈定兰（音），1913年与徐树铮结婚。他的一个女儿徐英（音）与语言学家李方桂结婚。

1921年徐树铮著有《建国诠真》，他的儿子徐道邻，于1962年编印了《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



定 价 0.9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第九辑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五分册)

作者=(美)包华德主编 沈自敏译

页数=142

SS号=11004757

DX号=

出版日期=1980年03月

出版社=中华书局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达赖喇嘛（十三世）
德王
范源濂
费孝通
冯承钧
冯至
冯国璋
丰子恺
冯自由
冯友兰
冯玉祥
傅斯年
傅增湘
傅作义
韩复榘
何成浚
何键
贺衷寒
何香凝
何东
贺耀祖
何应钦
侯德榜
萧佛成
萧同兹
谢持
谢洪赉
谢冰莹
谢婉莹
熊佛西
熊希龄
熊克武
熊式辉
熊十力
徐谦
徐志摩
许崇智
徐新六
许广平
徐谟
徐悲鸿
徐世昌
许世英
徐树铮

目录
封底